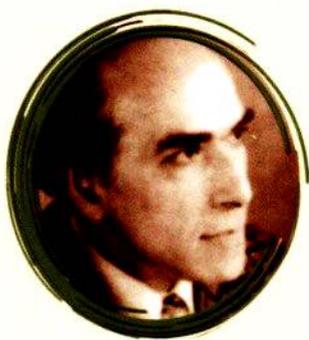


精 神 分 析 经 典 系 列 丛 书

弗兰克尔精神分析译丛

道德的基础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英] 乔治·弗兰克尔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

弗兰克尔精神分析译丛

道德的基础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乔治·弗兰克尔用他的博学、超群的智慧以及清楚的说明，为人性之谜提供了一个理解之道，其重要性可以和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媲美。他所提出的事实，是给整个人类的一份重要礼物。从采用深层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道德哲学，到令人可信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道德科学，他的成就……超越了从以前的哲学和客观科学中所获得的知识。

——彼得·兰德博士 (Dr. Peter Randell)

MRC 心理学系

所有关心下一代的心理健康和福利的人们，都会发现这本书是无价的。弗兰克尔博士对理性道德的迫切需求做出了最早的贡献，这种理性道德将引导社会安全地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如果另外一场大灾难能够避免的话，“人性将最终产生”。

——玛道克斯博士 (Dr. C.G.Maddox)

《精神疗法评论》(*Psychotherapy Review*)

对弗兰克尔著作的赞誉

弗兰克尔对幼儿原始驱力——力比多做了重新定义，他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力比多归结为性冲动，而是归结于先天的对爱的需要……弗兰克尔认为，人类爱与被爱的本能，在受到阻碍的时候会转变为侵犯和破坏性动机。任务就是找出……原始的爱是如何转化为侵犯的；然后，弗兰克尔就试图去解放爱，而不是解放侵犯。同时，弗兰克尔也发展了分析社会行为的精神维度的各种策略。

——埃里希·西格尔教授 (Prof. Erich Segal)

《时代文学补遗》(*The Time Literary Supplement*)

ISBN 978-7-80173-341-2



9 787801 733412 >

定价：29.00元



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弗兰克尔精神分析译丛

主 编：沈德灿 副主编：石绍华 林春

道德的基础

FOUNDATIONS OF MORALITY

——关于道德概念的起源和目的的研究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rigin and Purpose of Moral Concepts

[英] 乔治·弗兰克尔 (George Frankl) 著

王雪梅 译

石绍华 沈德灿 译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道德的基础 / [英] 弗兰克尔著, 王雪梅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7. 1

(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 沈德灿主编)

ISBN 978 - 7 - 80173 - 341 - 2

I. 道… II. ①弗…②王… III. 道德—研究 IV.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5494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 01 - 2003 - 5355

道德的基础

- 著 者 [英] 乔治·弗兰克尔
译 者 王雪梅
译 审 石绍华 沈德灿
责任编辑 江 红 陈杰平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北京蓝空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6 开
15.625 印张 19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80173 - 341 - 2
定 价 29.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总编室: (010) 64270995 传真: (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 (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010) 84257656

E - 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 //www. sinoread. com

《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

主 编：沈德灿

副主编：郭念锋 虞积生 张建新

编委会

主 任：张贵来

副主任：林 春 罗跃嘉 罗 劲 李乃庄 许 明

委 员：石绍华 江 红 陈杰平 沈芝莲 武国城

姜长青 潘玉进 李 祚 韩布新 王文忠

韩丽瑾 侯玉淘 骆桂明 吴志平 杜 娟

丛书策划：李乃庄 江 红 陈杰平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的精神分析运动领域流派纷呈，大师辈出。其中许多学者勤于笔耕，留下了丰富的著述。这些经典的文献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也是后学了解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研习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的最佳切入点。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组织翻译出版的这套《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精选了十多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的代表性著作，将会分集陆续推出。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为我国心理学、精神医学、心理咨询领域的专业人员，以及社会各方面的人士学习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提供第一手的素材，也为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有所助益。在此，我们谨向为翻译和审订此书付出辛勤劳动和贡献的专家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此类著作学术性较强，有些论点我们并不完全苟同，为了保持原著学术观点的系统性，我们尽量不作删改，供读者思考分析。

本丛书由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验室审订，并被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专家推荐为心理咨询师继续教育的补充读物。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年3月

弗兰克尔精神分析译丛

中文版译序

作为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治疗和人文运动之一，弗洛伊德所倡导的精神分析学，把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从传统的意识和行为层面引到了人的早期经验和潜意识*层面，为人类了解自己、认识自身提供了一条崭新的途径。尽管许多结论及其采用的深层的分析技术都还存在着不足与争议，但精神分析理论对二十世纪的科学、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与时俱进的。以至于在今天，任何关于人的理解如果缺乏对潜意识的考察都会显得过于肤浅。这大概就是精神分析运动虽然广被诟病、历经风雨却仍然方兴未艾、生生不息的一个重要原因。

弗兰克尔的精神分析理论是精神分析运动的最新进展之

* “潜意识”一词英文为“unconscious”，通常译为无意识，指意识不到、觉察不到的一种心理，是相对于conscious所指意识到、觉察到的另一种意识心理而言的。

现代心理学历来以意识心理为研究对象，而不理会意识不到的无意识心理。对于知觉不到、意识不到、不在意的无意识心理的研究，在弗洛伊德的影响下，并由于认知心理学的兴起，如今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unconscious在弗洛伊德的研究体系里是一个中心概念，特指受到意识压抑而处于不断抵抗的一种冲动欲望，它潜存于人心，构成人心的底基部分，驱动着个体的思想和行为发展。它所指已远远超出通常含义的意识不到、觉察不到，故对unconscious一词在弗洛伊德学说的术语里，以译作“潜意识”为更贴切。

本译丛直接关乎弗洛伊德的理论主张，故一概将unconscious术语译为潜意识。对国内已出版的著作或译作，有在涉及弗洛伊德主张时潜意识与无意识不加区分者，甚至把一般含义的“无意识”与弗洛伊德研究体系的“无意识”（即“潜意识”）在行文时混用或通用的，由于涉及与原著文或原译文引用有关，而不便在本译丛中予以更正或一一指出，特此作如上说明，供读者自行辨别与参考。

一。我们这次译介了他的几本著作：《心灵考古》、《文明：乌托邦与悲剧》、《未知的自我》、《探索潜意识》、《健全社会的蓝图》、《道德的基础》和《性革命的失败》等，这差不多是他关于精神分析的著作的全部。在这些著作里，弗兰克尔广征博引，用他高度的智慧和清晰的笔触向我们展示了有关人性、人性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宏大画卷。弗兰克尔继承了弗洛伊德和赖希等精神分析运动先驱的学术遗产，但又超越了他们。他提出了颇有说服力的关于人的潜意识的起源、潜意识和早期挫败经验对人的行为和精神生活的影响的理论观点，发展了比较系统的、颇具独创性的深层分析技术。非常可贵的是，弗兰克尔的兴趣显然不只局限在从心理学和精神治疗的层面探讨人类的深层心理及行为表现，他更注重对整个人性的了解，对人性与社会关系的解释。他建立诊所，帮助形形色色的求助者解决心理冲突，使他们获得新生；他更希望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认识社会和指导社会革命，促进建立一个免于冲突和毁灭的、理性和健全的人间乐园。当弗兰克尔如此热情地表达自己向往于人类社会的美好远景时，看来难免有点空泛与抽象，但从一个悲天悯人的心理治疗家的眼光来这样看世界、社会与人际关系，似乎又是完全可以理解与令人钦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弗兰克尔是一个实践性的研究者，他的研究取向，让我们想起了勒温所倡导的，但却长期被主流心理学界忽视的“行动研究”的学术传统。心理学研究的根本目的是帮助人类认识自身，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正如勒温的名言“好理论，最实际”，难道不是吗？

乔治·弗兰克尔生于维也纳，并在那里学习了哲学和精神分析。纳粹对于奥地利的入侵迫使他移居国外，最后他定居在伦敦，并在那里从事了四十多年的精神分析工作。作为一个精神治疗师，他的工作被认为是对精神分析疗法和人类对于潜意识认识的一个很大的突破，为精神分析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

弗兰克尔学识广博，他对精神分析、哲学、史前文化学和建筑心理学都有深入的研究。正因为如此，翻译他的著作是一件颇有难度但又引人兴趣的事情。从2003年立项，到2004年底翻译大致完成，我们的译者、译审和编辑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为了弄懂一个考古学的术语，我们的译者冒着酷暑跑到周口店请教考古专家；为了确定一段译文，我们的译者和译审在网络上热烈讨论，彻夜不眠。我们的编译组同时也是一个学习小组，我们翻译了弗兰克尔的著作，而弗兰克尔也给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激动的精神世界，在翻译结束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发现，我们的收获真不小！

即使这样，但当我们经过一个艰难的历程，把这套译丛呈奉到敬爱的读者面前的时候，我们还是忐忑不安，因为比起作者广博且深厚的学术造诣，以及原书所展示的文化内涵，我们的水平和理解肯定还有不到位的地方；当然，作者认识事物的立场和观点，我们也不能完全苟同。好在还有亲爱的读者，我们寄希望于你们指出翻译中的纰漏和错误；好在还有来日，本译丛的再版将为我们改正过失抹去遗憾，提供某种可能。我们期盼，也相信，将弗兰克尔关于精神分析的著作郑重地引进介绍给国内读者，对于我们每个人了解自身一定会有帮助，对于投身或重视我国心理咨询、心理治疗与心理健康教育事业的人将会有一定的启发与助益。

值此中译本问世之际，愿向一切为拯救与修补人们心灵而默默奉献的劳作者致以最为真挚的问候与敬意！

沈德灿

2005年元旦

写于北京大学西二旗智苑小区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文明的终结?	(3)
1. 觉醒与预感的呼声	(3)
2. 一个幻想的破灭——出于愤怒而非敬意	(8)
3. 被压抑的欲望突破了防线	(13)
4. 艺术的退行性解体	(26)
第二章 哲学的颠覆者	(31)
1. 维特根斯坦和语词分析	(31)
2. 维也纳学派	(40)
3. 背景：启蒙运动的哲学	(45)
4. 维也纳学派的难题：理论与实践分离	(54)
5. 逻辑实证主义在英美走向语言分析	(58)
6. 语言之塔：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	(63)
第三章 意识和道德的物质基础	(77)
1. 本能的真空	(77)
2. 脑的结构和功能	(82)
3. 古老的脑区	(86)
4. 下丘脑：激素与体内平衡	(90)
5. 意识和智力	(93)
6. 道德的神经元	(97)
第四章 意识和道德的起源	(101)
1. 一门精神分析的人类学	(101)

ii 道德的基础

2. 工具制造和智力	(102)
3. 工具制造和文明的起源	(104)
4. 从原始人到人的进化	(107)
5. 图腾、鬼魂和精灵	(112)
6. 狩猎者和留守者	(114)
7. 原始公社	(118)
8. 神话、上帝和道德	(120)
9. 拜神和赎罪仪式	(121)
10. 母权制：智人的原始文化	(129)
11. 洞穴神殿的艺术与文化	(133)
12. 母权制的危机：女神变成女巫	(137)
第五章 上帝诞生于人的心灵	(140)
1. 对母权制的反抗和农业的起源	(140)
2. 父权制的出现	(143)
3. 国王的神性	(147)
4. 俄狄浦斯情结文化：父权制的偏执狂	(149)
5. 一神论的产生	(152)
6. 哲学的诞生	(154)
第六章 理性道德之路	(161)
1. 一些基本问题	(161)
2. 道德的需要	(164)
3. 康德的认识范畴	(168)
先验分析和先验综合	(172)
4. 认识范畴和道德范畴的相当之处	(173)
绝对诫命	(177)
5. 重建上帝	(178)
6. 死神的起源	(181)
第七章 理想社会之路	(188)
1. 道德目标的座右铭	(188)

2. 工作是一种创造	(190)
3. 培训和教育	(193)
4. 机器的人性化和人的去人性化	(195)
参考书目	(199)
索 引	(207)
《弗兰克尔精神分析译丛》简介	(223)

前 言

我们逐渐认识到人类面临着道德危机。承认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我们想要确定自己能够分清黑白，辨别对错，但面对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开始动摇了。

二十世纪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确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对茫茫宇宙深处的时空探索，对地球上的生命起源的追溯皆硕果累累；而对人类心灵深处的研究，尽管在开始有些进展，结果却令人失望。我们为什么如此行事？我们的价值观和目标是什么？在这方面，我们远没有过去的人那般肯定。作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和科学普及的受益者，我们知道先人的道德观是非理性的，是出于宗教信仰的引导，对神的崇拜，对帝王的赞颂，是受到心理需要的激发。理性和科学的态度使我们摈弃了前人的世界观，我们认为这些观念导致了人类无休止的战争、压迫和偏见，成千上万的人因此陷入贫困。但是我们尚未澄清我们的价值观和目的，让我们怀着坚定的信心和安全感为此献身。我们已经颠覆了旧的信念，却没有创造出新的目标来代替它。 p1 *

我们在哲学、心理学和社会研究各学派中所奉行的，我们自认为的理性批判，推翻了我们人类自然本性的任何确信感。当我们用鸽子和大白鼠来研究人类的反射作用和行为时，我们甚至说不清自己和高等动物有哪些区别。我们还没有找到

* 此为英文原著页码。下同。——中文译审者注

2 道德的基础

理性上站得住脚的意义和意图来定义人性。尽管人们长期以来陷入人性的冲突，对人性的非理性追求，但是人性还在孕育之中。

二十世纪自开端便注定了科学将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将最终证明人类作为生物进化的最高级形态，在生理、心理和文化上存在的意义，短暂的乐观心态之后，我们便经历了民族、宗教以及种族仇恨的重新爆发，暴行和流血以从未有过的残忍程度在空前的范围内演绎着。我们不得不承认，科学同时也可以成为狂热与偏见的帮凶；科学技术的进步增强了人的破坏力。期望变成了失望，伴随而来的是怀疑，是否还有任何东西可以相信，我们凝视着一个道德真空——欺骗的产物。二十世纪最终成了启蒙运动的试验场，暴露了它的失败。

见证了人们的激情、信仰与希望的破灭，我们的理性领袖们经常清晰地表达出大多数人的失望和看破红尘的感觉。

第一章 文明的终结?

1. 觉醒与预感的呼声

预言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嬉皮士时期新的精神病学的 R. D. 莱恩 (R. D. Laing) 曾说：“在这个书籍如洪水泛滥，争相吸引人们眼球的年代，多出一本又有什么意义？现如今写书的人真该被枪毙。”此时的莱恩正处于忧虑困惑的晚年。这话没能阻止我和其他人写书，因为总想为改善这个世界做点什么。非但如此，我们还要向这个世界阐述我们的观点，尽管如今很难让人们相信还有什么真实的、可靠的。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Ludwig Wittgenstein)，堪称最具影响的哲学观念评论家，当他在晚年开始专注于心理学时，曾语出惊人：“研究精神现象的科学如何进行？答案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精神活动进行观察。如何观察？答案是：以内省的方式观察。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观察自己的精神活动，那他观察的过程就会改变这些活动并产生新的精神活动，这是不该发生的。也就是说观察者不可改变被观察者。如此一来，对精神现象的研究便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不可能观察别人的心理活动，也不可能观察自己的。那我们的研究处于何种境地？答案是：我们身处一团迷雾，无助而又困惑。

其实早在 1813 年，黑格尔 (Hegel) 就曾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4 道德的基础

p3 题：“一些法律或契约旨在多变的形势下提供稳定的基础和确定性，但当这些法律本身也随世事变化而改变时，什么能为这多变的世界提供稳定的基础呢？”黑格尔就这令人不安的问题给出了一个使人安心的解答：“即使基本契约和法律随世事变化，其过程也是相当长的，一年，甚至一个人的一生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需要补充的是，这些变化所引起的困惑感没有被充分的意识到。尽管如此，这句话也准确地道出了我们今天的形势：政局更替、社会变革、我们的世界观也发生着根本转变，其速度之快，使我们在心智上感到无所适从。仿佛一夜之间，一切事物都变得不确定，我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变成了空中楼阁。

没有什么是可靠的，也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变革的大潮席卷之下没有不变的实质。早期的一些“宏大的理论体系”如今都遭到了质疑。像黑格尔和马克思（Marx），他们的一些用以阐明主宰社会变革规律的思想，竟在思想底蕴和社会的角度均被视作为极权主义专政开解的托词；他们的理论没有被用来寻求社会冲突的综合和解决，反成了激化冲突和灾难的根源。现在，我们“知道”未来受偶然事件的支配，对此我们既不可能预见，也无法控制。

p4 作家威尔斯（Wells, H. G.）曾对未来比任何人都充满希望，宣扬他身处的时代将硕果累累。但他亲历了自己的乌托邦瓦解，眼看人类的精神已到了穷途末路。经历了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后，他表现出彻底的觉醒，并为人类的将来感到绝望。1945年，他写道：“当人们不再对现状抱有尚感满意的错觉，而能够面对那些困扰笔者和人类的问题时，他们会发觉现实是极其冷酷无情的。一种不祥之感侵入了他们的生活。即使那些对此视而不见的人们，也会时不时地突然流露出某种疑惑，某种无常感，他们感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生活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了。”在威尔斯漫长而才华横溢的一生中，他尽其所

能去探索发展的趋势，即螺旋上升，到达生命的新阶段。然而他对眼前的现实考察的越多，他就越看不清发展趋势集中在什么方向。变化无规律可循，他越深入地评价发展进程，其间的分歧就越大。迄今为止事物都遵循着某种逻辑联系，就像我们熟知的天体一样，在神奇的引力的作用下聚合在一起。如今，仿佛这种力量消失了，所有的东西都以加速度四处逃窜，没有任何模式可循，因此，所有这类的尝试都将是徒劳的。

在威尔斯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已深信这是个绝境，我们既出不去，绕不过，也穿不过去——这就是终点。他于1945年撰写了《黔驴技穷》(*The 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次年便与世长辞。

另有一位作家，发现他对欧洲文明价值毕生的钟爱和宣扬被无情地粉碎，在大彻大悟之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就是奥地利的心理现实主义大师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他于1942年的自杀可以看作是西方文明自杀的缩影，对文明的渴望被汹涌的暴行永久摧毁的世界末日。

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于1941年的书中写道：“我们这些六十岁的人，理应还有一段路要走，但还有什么我们没见过，没经历，没遭受的呢？我们仿佛在吃力地阅读一个目录，上面密密麻麻记满了所有你能想像得到的灾难，迄今我们还没有读到最后一页。我经历了人类的两次最大的战争，站在两个不同的前线，一次是支持德国，一次是反对德国。战争之前，我看到个人自由的最高程度和形式，后来，自由跌入几百年以来的最低谷。我曾经声名显赫也遭受过鄙视，有过自由也曾被束缚，经历过富有与贫穷。革命和饥荒、通货膨胀和恐怖行动、瘟疫和逃难，这些都仿佛启示录(Apocalypse)中的战马一般在我的一生中呼啸。我目睹了大众意识形态的发展与蔓延——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德国的纳粹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最具灾难性的是严重毒害了欧洲文明之花的民族主义。我被迫

6 道德的基础

成为一个无可奈何的目击者，目睹着人性已堕落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被反人道主义有目的有计划地引导至我们原以为摒弃很久了野蛮状态。

“千百年之后，兽性未曾离我们远去。我们一次次地目睹不宣而战、集中营、迫害、聚众抢劫、对手无寸铁的城市进行轰炸，已经有五十代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兽行，我们希望以后的人们永远不使它再发生……在那一时期，我经常与弗洛伊德（Freud）论及对希特勒（Hitler）独裁和战争的极度憎恶。从人道主义者的角度出发，弗洛伊德对这种兽性的爆发感到十分震惊；但同时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又认为这是自然的。他总是被批评为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曾否认文明凌驾于本能之上；但他认为人类灵魂中原始野蛮的破坏性本能是根深蒂固、无法消除的这一观点，不幸被证实了。”

茨威格在自杀的前一天写下了这样的遗言：“一个人过了六十岁以后，他需要非凡的力量重新开始。我的力量在我常年的流离失所中消耗殆尽。所以我觉得不如在适当的时候体面地结束生命，我的这一生，唯脑力劳动意味着世界上最纯粹的快乐和最崇高的人身自由。

“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敬！愿他们能有幸看到漫漫长夜后的黎明！我，实在没有耐心了，先去了。”

以上的例子足以证明伟大思想家们的觉醒，他们认为人类已经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智慧与理解方面的巨大潜能，以赛亚（Isaiah）、耶稣（Jesus）、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和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在近代有莎士比亚（Shakespeare）、伏尔泰（Voltaire）、歌德（Goethe）、斯宾诺莎（Spinoza）、康德（Kant）、叔本华（Schopenhauer）、伽利略（Galileo）、牛顿（Newton）、达尔文（Darwin）、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Einstein）等就是这种潜能的代表，他们的思想得到了后人的继承。我们必须承认，文明

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饰面，根本不能遏制住野蛮行为的定期发作，而只能任由其挫败道德与理性的愿望。我们物种固有的野性已不再被意识所掩盖。科学并非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将人类从非理性中解救出来的工具，反倒成了非理性的帮凶。弓箭“改进”成为机枪，现如今，核武器的破坏力，在利用宇宙能量为人类的侵略和愚蠢服务方面，已经达到了极致。核物理上的重大发现，既能确保我们轻易地给敌人以重创，也可以将这个星球的整个生物圈毁掉，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理智本身在引导我们摆脱人性的黑暗面时显得过于苍白无力。这就不难解释，对启蒙运动的失望，为何会滋生出一种怀疑一切的思想体系，并被划归于后现代主义的门下，因为启蒙运动的结束实际上就是信仰的终结。那些自认为是启蒙运动的倡导者们，除了人的理智之外，不承认任何道德和精神的权威。然而他们现在对“理智”所下的结论，借用罗杰·斯克鲁顿（Roger Scruton）评论约翰·格雷（John Grey）的《启蒙之觉醒》（*Enlightenment's Wake*）“不能填补信仰的真空，故毫无意义”。

p6

我们对不再确定怎样评价事物并做出反应，如何辨别对错。要命的是，哲学家们告知我们，道德观并非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没有认知的意义，因此任何事都是相对的。

“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这是大多数人的本能反应。两次大战带来的创伤，对奥斯威辛难以言尽的恐惧，在世界和欧洲大陆许多地方不断发生持续的自杀性的纵欲狂欢，以及对公民生命的摧残，这些无不让我们感受到文明的价值只不过是一层虚饰，往往不能保护我们免遭野蛮的侵害。看来我们已经无法憧憬未来了；非但如此，未来还会让我们油然而生一种恐惧和忧虑的感觉。这种文明，尤其是启蒙运动所倡导了二百多年的道德和知识结构，引起的不仅仅是失望，更多的是愤怒。我们要抨击集体主义的超我，这种父亲人物许诺我们那么多，却

p7

什么也做不到。知识分子提出哲学体系用来攻击启蒙运动认知和道德观念；后现代主义、后构造主义、诠释学和解构主义亦联合起来彻底声讨我们对“现实”的定义。他们的语言极为晦涩，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想要表达什么。解构主义更为甚之，只知一味打击人们求知的信心。解构主义认知的兴趣或不如说是意图，在于引导我们相信知识无足轻重。它一直试图让我们认为不同的工作只不过是一些冗长无聊的游戏。换句话说，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甚至知觉，因为我们不可相信我们对文明的看法，而恰恰是我们的文明决定了我们的判断。

2. 一个幻想的破灭——出于愤怒而非敬意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数在战壕中惨死的冤魂，令人毛骨悚然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凡是那些经历过、听说过的人都会问：“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哪里？”在这里我们也要质问：“让野蛮和残忍摧残了我们的文明并且还要持续下去的理由是什么？道德在哪里？”我们所期待的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合作时代在哪里？国家主义的和宗教的狂热将让位于启蒙运动的理性和人文的完美理想，会用容忍和相互理解来解决矛盾和利害冲突。我们期待二十世纪伴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我们对宇宙和生命的认识，对人类起源和发展的认识将会有质的飞跃。应有一种新的观念让我们从过去的迷茫中走出来，让那些使人类分裂为互相仇视、互不信任，互相对抗的国家和宗教的成见成为过去。社会人类学和社会科学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国家的等级制度，以及君王、僧侣和统治者的权威从何而来；心理学会让我们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从属性，我们为何容忍从属的冲动。理智会成为法则，而在它的指引下，科学会使人类受益匪浅。

只需短短的几十年，仇恨和暴力的残余就可克服。这个信念日久天长获得了宗教的力量。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信奉着马克

思的预言或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坚持不懈地为劳苦大众寻找着通往美好生活的大道。

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方式产生科学技术，使商品生产极大丰富，远远超过了前人的想像。新的交通和通讯方式，如铁路、汽车、轮船和飞机，电报、电话和无线电不仅能使我们轻松地将足迹通向远方，而且使得商品可以依据需求分配到每个人的手中。一个繁荣的新世纪将展现在我们面前，马尔萨斯（Malthus）的理论也将被击破，依据他的理论：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会导致人口的倍增，因而使剥夺的水平和供应的匮乏基本保持持续，因此发展是不可能的。我们曾认为有了新机器，科学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生产会轻易地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全体繁荣的梦想将付诸实施，商品匮乏时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这样的学说导致下层阶级的穷困成为不可避免）不再需要，新的政治和经济概念将产生。大多数人类所遭受的苦役将被一个机器的世界所代替，机器将为人类服务，教育的普及使工人掌握了现代化技术，因而可以发挥自己的潜力，做一个理性的自由人；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将使他们能够参与社会的决策过程。

p9

社会主义将创造政治和经济条件，以结束自古以来机器拥有者和为他们服务的工人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阶级划分，生产工具共同拥有将产生一个新社会，富有创造性的人们不再受等级统治的奴役，而是创造出自由的人享受的新的社会秩序和环境。

为什么我们会对权威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敬畏，对自由存在恐惧？为什么我们不相信自己和本能？是哪些不理智的驱力促使国家之间发动最残忍的战争？这些都是心理分析要研究的东西。引用弗洛伊德的一句话：“我认为对人类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化发展是否能成功地控制因人类攻击本能和自

10 道德的基础

我毁灭本能引起的共同生活的错乱，以及在什么范围内能控制。在这个关系中，也许我们所处的阶段值得我们特别关注。人类征服自然力量的能力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现在能轻易地互相杀戮，直到消灭最后一个人。我们很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会经常不安、沮丧和恐惧。可以这样认为：两个‘神圣力量’中的一个——永恒的爱神爱洛斯（Eros）会尽力与他同样不朽的对手保持力量均衡。” [《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爱神爱洛斯，肯定生命的力量，爱和同情的化身，自从远古被释放后，最终会战胜死神萨纳托斯，那个否定生命的驱力，指向个人和社会的攻击性、虐待狂的化身，毁灭和自我毁灭的欲望。这也许是个短暂的过程，也许需要漫长的等待。

p10 但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启蒙运动的宣言，在二十世纪我们希望找到些什么，理性的、科学的、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还是心理分析的承诺？觉醒带着痛楚。没有人会忘记两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主义的专制，恐怖的纳粹主义，完全背离了欧洲文明；战争间歇的那些年经济衰退，无数的人失业，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不得不产生怀疑；不要说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衰败，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量人口也陷入贫困的深渊。再一次我们经历了由国家主义、种族和宗教狂热引发的恐怖活动的骚扰。此时此刻战火连天，随之而来的是令人发指的残忍和饥荒，生灵涂炭。而神奇的现代科技同时也提供了产品来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结果到底如何呢？生态环境开始被破坏，空气、海洋和河流被污染；人类和动物赖以生存的原材料面临枯竭；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变暖和臭氧层的破坏。

促成我们觉醒，引起我们预感的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例如，一直被认为维护我们生命健康的医学，由于干涉了人类生态的均衡和自然选择，造成了人口的爆炸，也成为了一柄双刃剑。发达的医学使成千上万的婴儿出生，而他们，由于人口的

压力造成的环境灾难和自然资源的枯竭，在许多地区成为饥荒的牺牲品。不仅是人类，无数的动物物种也面临着死亡和灭绝。看起来马尔萨斯是对的，我们又一次成为他的规则的牺牲品。

启蒙运动文化，这个理智和科学的神明，背叛了它自己，也背叛了我们对它的信仰，我们开始仇视它，决定要证明它是荒谬的，一文不值的。它嘲弄了我们的希望，因此我们也要挑衅它的规则、蔑视它的权威。一群犬儒主义的信徒出现了，他们的信仰就是拒绝所有的信仰，他们要报复让他们失望的神明。在愤怒中我们将这个神明撕得粉碎，只承认互不相连的碎片留在世界上，不再认为这个世界上能有哪个文明能让我们知道存在的方向和意义。我们只倾向于认为事物都是偶然的。物理学上的混沌宇宙观念开始侵入到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社会服从随机事件，没有可辨别的方式和内涵。

p11

因此我们把自己从过去和将来中孤立起来。我们只看眼前，因为过去充满了恐怖背叛和羞辱，而将来又使我们惊慌迷茫。很多儿童不再相信教育，因为他们看不到将来需要知识，许多女人认为怀孕太麻烦，会阻碍即时行乐或事业的成功，这些都已见怪不怪了。在孩子们眼中父母是背叛了我们的旧世界的代表，他们不再受尊敬，不再是年轻一代的楷模；宗教和意识形态不再鼓舞年轻人的心灵，被看成是搅乱了历史的垃圾堆上的废物。但如果更高的视野——世界的精神意义——不再指导我们，不再鼓舞我们的心灵，心灵中更多原始的方面就有机会浮出水面。我们过去曾经压抑原始的、攻击-性欲驱力和自我(ego)^[1]中心的欲望，并试图将它们升华到一个文明允许的形式；而现在我们摈弃了文明，成为这些原始欲望的奴隶。

[1] ego 和 self 译成汉语都是“自我”，为了区别，代表 ego 的“自我”用黑体标注。下同。——中文译审者注

12 道德的基础

p12 我们心灵中原始的部分进入意识，支配意识，我们为所欲为，没有负罪感，也没感到良心不安。如此我们可以说被压抑的欲望不仅仅在个人，而且在整个社会都突破了防线。由于文化的整合作用消失，社会生活被撕裂为无数此时此地的体验，这种体验是贪婪的，缺乏对他人的同情——每个人都像在一艘沉船中——在短暂的世界中疯狂地寻找满足。

启蒙运动文化不再给我们一种文化应该给予的安全感和道德引导，我们变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没有一个通用的概念作参考来引导我们的判断，事情的对与错、黑与白，无论从感情上或是理性上我们都不敢确定。雪莱（Shelley）曾说过，我们都是“专家”，追求我们特定的利益，不去考虑过去与将来，那些历史教给我们的价值观，那些传统和习俗，那些使我们的国家成为现在这样的人：统治者、冒险家、征服者和商人；也没有从那些照亮我们的精神世界，宣扬自由、公正和平等的伟大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真正的立法者那里受到多少启示。

但现在莎士比亚、拜伦（Byron）、雪莱、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和其他人类精神上的英雄却被斥为有高于他人的优越感，有悖于种族的平等，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而他们被逐出教育课程。通过激光唱盘演奏出的贝多芬或莫扎特的情调音乐精选，不见得就比非洲或印度，中国的汉族或藏族的音乐高出一等。同样的，对未来的信仰，那些能够给我们希望和成就，能给我们存在意义的信仰已从眼前消失，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自我中心和愤世嫉俗的世界，这个世界只有眼前的欢愉和“成功”，我们与他人、与自然界隔离，我们剪断了与文化连接的纽带，而文化旨在代表人性和生命。

在《否定之辩证》（*Negative Dialectic*）一书中，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宣称：经历了奥斯威辛后，他的形而上学的观点被粉碎了，已经发生的一切与形而上学和很多观

念产生了矛盾：“在奥斯威辛之后，我们的文化被证明彻底失败了。”

但当我们着眼于“眼前”，不能用更高的境界激励我们自己时，我们心灵中那些原始的“低级”方面（这些方面一直受到我们自己的监督，能量被我们升华，为我们文化的道德愿望服务）浮出水面，占据了我们的意识。我们所说的“被压抑的欲望突破防线”，获得了一种反文化的文化形式，它是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的目标将被看作是正当的，我们追求这样的目标将被看作是一种执著。

p13

3. 被压抑的欲望突破了防线

“贪婪是好事”

被压抑的欲望突破防线有多种形式，其中有三种为我们所熟识：贪欲的释放、自私自利，以及虐待狂。它们从道德束缚下挣脱出来，形成了一套新的道德规范，在这种体系下，人们以权力地位为追求目标。

用精神分析的话来说：自我受到对抗甚至消灭超我欲望的驱使，会与本我的原始驱力结成同盟，从而支配自我的功能。弗洛伊德期望自我将取代本我，而我们却发现本我取代了自我。传统上，对我方的超我的攻击会被遏制住，并向外投射，指向外部超我，即敌方的神和统治者。例如，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偏执妄想和集体的荒诞虚构将最终导致战争，而在现今，这种攻击却直指我方的超我，即自己的文化。

引用赫伯特·马库泽（Herbert Marcuse）的说法，这一过程可以被称作退行的去升华作用（regressive desublimation），或者简单地说是倒退的寻求本我，把我们自己认同于本我，即低级本能。我们可以列出三种具体表现：自恋从文化约束中挣

p14 脱出来，而文化约束强调无私地为共同的目标服务；贪欲占据了支配地位，以及更原始的虐待狂 - 破坏性攻击。第一种：自恋，其自我满足的主要方式便是只关心自我，爱自己。自我倒退为原始的自恋的自我，通常会表现为自私自利和自大。为了得到世人的瞩目和赞美，不停地追求身份地位。这样的人期望得到别人和自己什么样的尊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世界推崇什么样的价值观。在我们的社会里，追求权利是主要的目标。

贪欲是口腔吸纳驱力的一种表达。一旦这种驱力体验到被剥夺和被拒绝，就会转化为掠夺和攻击驱力，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称之为口唇 - 撕咬（oral - cannibalistic）驱力。它表现为不顾一切地追求商品的获取和占有。财富意味着这种驱力的成功，意味着他们有能力不断填充欲壑，并扫清路上的一切障碍。利益动机提供了诱因、满足感以及合理的解释，于是对物质财富疯狂追求变成了一种美德，并为自恋的需要赢得尊敬和被世人赏识。贪欲将世界看作是一个可任其侵害和掠夺的东西，而无须顾及她的感受和需要，将其称之为口唇 - 撕咬毫不夸张。这种结合了虐待狂的攻击在攻击行为中得到快感，全无对被受害者的同情。

在此我们需要回顾一下西方的传统文化。在超我的道德约束下，经受着口唇 - 攻击的欲望驱动的个体不得不将欲望压抑，并通过神经症的症状将其排解。而在一个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文化中，超我已经被摒弃，攻击和口唇 - 撕咬驱力在社会行为中得以表现，而且若是为了追求利益，还会被看作是美德。因此只要是服务于利益动机，人们尽可以心安理得地去污染河海，毁坏森林，毒害大地，戕害生灵。人们对环境的肆意蹂躏是缘于人们将自然环境去个性化了，也就是说，丝毫不承认它有感觉或完全否定万物有灵论。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在我们称之为替代作用或次升华作用下，一些个体与他们的公司或金融

机构产生认同，这些组织追求着不同的商业目标。

p15

这些组织扮演了饕餮之兽的角色（而他们无疑也将成为受害者，如果我们继续认同他们，那最终得到报应的将是整个人类）。他们用科技武装自身，掠夺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和动物；他们吞噬着利润的同时也大口吐出废物污染着地球。他们不仅向自然发动进攻，还在大规模的猎食竞争中相互攻击，他们通过财务接管、兼并和其他金融手段相互吞食，无情地抢夺优势地位。领导或从属于这些组织的个体，在侵略和成功中获得了替代性的快感，与组织的力量认同，而且没忘记用获得的财富中饱私囊。这些公司成了他们的利齿，他们的嘴和胃囊，他们代表了公司，公司也代表了他们。

大型商业组织为了操控市场可谓不惜血本，殚精竭虑，他们需要高超的推销艺术使公众相信，他们的商品不仅是称心的，而且是必备的。这美其名曰：“为市场服务。”

格奥尔格·西美尔（Georg Simmel）在他的《货币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oney*, 1912年出版）一书中，揭示了金钱极具讽刺性的一面：它有能力使非商品的东西转变成商品。“让资本主义社会日益深陷玩世不恭的、堕落的罪魁祸首是购买力。金钱被重视的程度越深，真、善、美、荣誉、才能、健康的思想就越市场化，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就越嘲弄、轻佻、玩世不恭。它们的价值被看作与路边小摊叫卖的杂货没什么区别。将高尚的价值转化为肮脏的交易，货币的这一讽刺性的功能被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有东西都是可卖的，事物的价值也就都取决于它的适销性了，换句话说，任何东西如果不能在市场中产生利润，都将是一文不值的。金钱的力量，诱使那些有天分的人、受尊敬的人和富有创造性的人为了自己的劳动得到认可和报偿，进入市场贩卖自己。当这种诱惑大行其道，当那些甘受其引诱的人认为“腐败”的说法只不过是出于嫉妒，实为一种假道学的做

p16

作时，就形成了一股文化思潮，此时人们会把它看作是既成的普遍法则，而宁愿随波逐流。事实上，我们看到了所谓真善美的高尚情操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仅仅是自我陶醉而已。“市场取决于最普遍的大众品味和需求，而广告业几乎可以驾轻就熟地操纵它们。”

这些本我的实践者们用一个人类心理学的观点为他们自己开脱，这个概念可以总结为一句话：“人性本如此……”

“贪婪是好事”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是华尔街的著名证券商伊凡·博耶斯基（Ivan Boesky）。似乎每天都有关于有权有势的人们的收入、暴利之类的新闻，或是其他被视为不名誉的丑事或社团丑闻的事例。我们可能还会争辩说，这些放纵的行为仍属极少数，他们的丑闻被过多地公开。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所谓少数正在不断扩大，并有取代全国的企业文化的危险。在英国，已经有太多的企业经理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标准。十五年来，有这样一个怪现象，经理人的薪水越高，他们想要的就越多。薪水越多，他们得到的特殊津贴也越高——绩效奖金，股票期权，以及养老金计划。其中股票期权最为可观。无论单个的公司业绩如何，只要处在股票大市的上涨行情，它的股票必定会跟着涨，哪怕一点小小的涨幅都会带来巨额的收益。

结果，通常的情况是，即使经理人的养老金难以让他们维继早已习惯的上层生活，在他们临近退休的几年间，他们的收入会戏剧性地补足这个缺口，怀揣实实在在的数百万的养老金，他们足以安享晚年了。

我们被带回到了自我。经理人看着他们经营的规模，他们工作的时间，他们肩负的责任和赚取的利润，认为他们应得这样的报酬。

英国的商业已经被淹没在委婉的说辞中了。企业再造、集中、缩小规模、重组，还有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说法，都被用来掩盖很是煞风景的现实。而这里所谓的重组，往往意味着不断有公司倒闭，为早已有几百万之众的失业大军再增加一些被解雇的人员。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这些本应为公司垮台负责的经理人们，却在实际的利润背后享用着巨额红利，这实在是道德败坏。[安东尼·希尔顿 (Anthony Hilton)，《旗帜晚报》(Evening Standard) 经济新闻编辑，1996年4月3日]

* * * * *

本年度，英国国内累计投标和交易额将达一千亿英镑，把跨国贸易计算在内的话，这个数字将加倍。从所有交易中平均抽取5%的手续费，也有一百亿之巨。几千个董事和股东直接地，其他二十万名在伦敦商业区工作的人间接地瓜分了这笔钱。例如通过最近对国民威斯特银行 (NatWest) 的竞价收购，以及支付风险顾问的费用等方式，仅苏格兰皇家银行 (Royal Bank of Scotland) 和苏格兰银行 (Bank of Scotland) 两家所支付的费用便在五亿英镑以上，这笔钱最终落到了三家投资银行的不到两千名的职员手中。这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横财。

高级投资银行家、律师和其他顾问拿到手的红利会突破三百万英镑，另外的一千人每人也能拿到一百万，伦敦商业区的其余职员也可获利几千英镑。有估计说，到1999年圣诞节，申报奖金的总额将超过十亿英镑，这还可能低估了大多数公司的盈利能力。

每隔半年左右，总会有那么一阵，一些新闻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上层人士的收入上，以提醒这个国家贫富差异已到了极不平衡的状态了。现状的拥护者们反复着同一

p18

个论调：不能与市场作对，我们必须遵循它铁定的规律，如果我们采取强制措施或征收税款，这些英国的经理人就会离开英国，伦敦商业区的生意也会离开英国。我们既然没有谴责身价百万的足球明星，又何苦为难这些投资银行家？伦敦商业区是一个私营企业的财富制造机；在它的努力下，工作和财富流遍整个伦敦。让我们现实一点吧，别再对那些努力工作，三十多岁便身价几百万的人吹毛求疵了。[威尔·赫顿 (Will Hutton)：《免税，这是真正的红利——布莱尔和布朗决定保护伦敦商业区数十亿英镑厚利的特权》—《观察者》(It's tax-free. That's the real bonus - Blair and Brown are determined to defend the City's privileges in a multi-billion pound bonanza—The Observer), 1999年12月12日]

难以置信的是，这些身居要职的人们，下令关闭分支机构、解雇成千上万人的同时，笑纳着巨额的薪水和红利，他们在公众中没有表达出丝毫的过意不去或是良心不安。而本我的实践者们又拿出一个人类心理学的观点为他们自己开脱，简而言之：“生命是肮脏的、野蛮的同时也是短暂的，人要设法生活得最好，就必须扫清自然界的障碍，自然界遵循达尔文的适者生存法则。”而这里的适者指的是那些尽可能多赚钱的人，他们享用着财富和权力所带来的利益。这是生活中的好事，表明有能力获得这样生活的人是优秀的。

犯罪与暴力

然而这只表现了当今形势的一个侧面。在另一部分人群中，攻击过程更加令人侧目。他们没有像大公司的职员、律师、会计、公关专家、广告从业人员那样合法地享受赚钱给他们带来的刺激和满足。这些没有与商业“怪兽”产生认同的人，以个人攻击和暴力反叛的方式表达他们对超我以及传统行

为规范的蔑视。这些人对未来没有憧憬和期望，而未来呈现给他们的也是毫无意义、不值一文的，他们便向未来发难。由于他们见不到任何未来承诺，因此也就没理由压制他们的愤怒和蔑视，没有必要压抑本我的原始欲望。

p19

老一辈的工人阶级曾梦想过改变社会形态，无论是通过民主方式还是革命斗争，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局内人，共同为开创美好的明天而参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运动。他们的愤怒和进攻有合理的道德目标作支撑，并清晰地表达出来以被世人接受。他们清楚，知识分子、哲学家和科学家都站在他们这一边。但在当今，他们为社会公平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做的政治斗争的理论和道德基础，无论在何处都遭到了质疑和嘲笑。那些升华的理论框架，不仅用以解释工人阶级对压迫者的集体反抗的正义性，还使其成为一种美德，而今却不复存在，他们的进攻行为便失去了道德理论的基础。

他们不再把自己看作是为正义而战的先锋，他们对社会体制的抨击也变成了反社会的、不得人心的，全无尊严和荣誉可言。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整个人类，他们都不再对未来抱有希望。他们不再是时代的先驱，反倒成了时代的失败者和被淘汰者；他们与社会体制的抗争也被降低成个人与所处不利环境的对抗，他们的斗争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升华过程。实际上，对旧的传统和规范，他们根本无所作为；他们感到自己不再肩负为社会或为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而做出贡献的重担。他们已经觉察到这些都成了谎言，成了不合时宜的虚假承诺，是对他们常识的奚落；他们便对任何有关责任和义务的说教回应以嘲笑。他们中大多数人出身于工人阶级，他们的父辈、祖辈要么曾是社会的牺牲品，遭受了失业，要么就是终其一生从事着几乎无报酬的体力劳动，勉强维持家庭生计。先辈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深植于这些反叛者心中，尤其是像非-亚裔美国人和西部印第安人这类少数民族的心中，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祖先

p20 曾是奴隶。因此，他们不会再顺从于同样的命运，必定会向他们生活的社会报复。

不仅社会底层贫困、被剥夺、失败和挫折的工人阶级与老的传统和规范以及所有的意识形态目标有一种疏离感，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的感觉，这些人对我们自己的文明不再抱有理想和期望。一种对以往文明的行为规范的挑战，在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当中正在以穿着、行为和角色扮演等各种方式蔓延开来，形成新的规范。在艺术作品中，我们能看出愤怒的爆发，暴力和虐待狂的意象，它们被刻意地用来冒犯和侮辱我们对现实的天生知觉，冒犯和污辱高雅的品位；音乐变成了狂躁的化妆舞会上撕裂的、不和谐的、幼稚的声音；舞蹈则变成了蹩脚的、挑衅的、痉挛的运动。我们发现不但在艺术中，而且在文学作品和名人传记中，对文明美德的蔑视竟成了一种时尚。只有那些对极端残忍事件的丑闻揭秘，对不正当性行为、欺骗和犯罪行为的曝光才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兴趣，才能满足出版商赚取利润的动机。时尚意味着从僵死的文化束缚中解脱出来，意味着将隐藏在最深处的污秽昭示于天下。那些作为社会榜样的成功的人，那些受到尊敬的人，被看作是骗子，“解放”的人质疑这些榜样，质疑推崇这些榜样的文化，这是一场心理上的战争。

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左翼激进分子的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抗议活动早已信誉扫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嬉皮士的思想体系也失败了，他们只顾此时此地的即时满足，而即时满足不过是排解个人的愤怒和暴虐，不过是偷盗点糖果，这为法律所不容。然而合法的商业机构中的名门望族便可堂而皇之地追求他们的短期利益。青少年有他们自己的团伙，他们蔑视法律，甚至公开宣称与之对抗。他们的贪欲表现在对奢侈品的获取上，例如价格不菲的运动鞋，时髦的穿着，足以让他们炫耀花钱的能力。为此他们不择手段地掠夺他人财物，抢夺、人

p21

室行窃、人身攻击包括行凶抢劫，攻击伤害他人身体，甚至致人于死地。他们经常对完全陌生的人实施极端的暴行，造成严重的伤害，甚至死亡。就在我写作本段的这个星期，一位 88 岁高龄的老太太在家中受到攻击，她遭到了残暴的毒打，头部被踹数脚，奄奄一息，她被抢走了 50 英镑养老金。

特别让世人震惊和难以理解的是，这些暴行的实施者没有一丝的怜悯和良心的谴责。原因是他们将受害人去个性化了，把他们看作简单的物体而没有将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甚至将他们视为可以正当地任意蹂躏的敌人。这已不仅仅是贪婪或某种复仇感了，而是一种对虐待狂的崇尚，对任何他们贪欲的阻挠者进行残害和杀戮的快感。他们的行为没有针对性，他们甚至不认识受害者，而不过是一种幼稚的发脾气，或是一阵狂怒的发泄，正如他们所说，只图“一时的痛快”。

我们遭遇了一连串抢劫、暴力、谋杀和强奸的案件，它们不仅仅发生在市中心的贫民区，还发生在青少年当中，甚至十岁的孩子当中。报纸日常报道的残暴事件令我们发指，而许多人都有过一次甚至多次被袭击或自己的家和汽车被人闯入的经历。

暴力事件的增长有统计数字为证：1993 ~ 1994 年间，暴力案件增长了 17 300 起，达到了 311 500 件；其中人身攻击达到 219 270 件，增长了 7%；严重导致永久伤残的暴力案件有 19 498 起，增长了 8%。1994 年以后，暴力事件有了更显著的增长，尤其发生在青少年当中。

摘取《旗帜晚报》1996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的一篇报道：

“如果单从自行车被盗来看犯罪率的波动，你会有惊人的发现：

1934 年，伦敦市全年有 791 辆自行车被盗，平均每

天 2.1 辆，此时犯罪率的增长开始日益引起公众的关注。去年，偷车贼盗窃了 19 219 辆自行车，平均每天 52 辆，与 1934 年相比增长了 2 376%，这还是连续增长了四十多年的犯罪率首次出现了下降，警察局内为此交手相庆。”

以这种方式来衡量伦敦市过去六十年的犯罪增长，诚然有些匪夷所思，但下面的整体统计数据也支持了这一令人沮丧的消息：有记录的犯罪案件从 1934 年的 86 863 起增长到 1996 年的 822 596 起。

最流行的犯罪形式在性质上也发生着变化。1934 年，主要的犯罪形式表现为醉酒、妨害治安的行为以及卖淫。

今天主要是暴力犯罪、入室抢劫、盗窃或闯入汽车、劫道，这些行为中有许多是出于对毒品的需要。还有一种犯罪引起了公众和警局的高度重视，那就是白领的欺诈行为。自 1950 年起，暴力犯罪案件便以每年 3 000 起的平均速度增长着。而自 1987 年起的 8 年内，平均每年增长 12 000 起。

与 1998 年的同期水平相比，截至 1999 年 9 月，最近六个月有记录的人身暴力事件增长了 26%。性暴力案件增长了 20.1%，抢劫增长了 34.7%。今天的许多老人们谈及他们的年轻时代时，总是留恋过去的好时光，这是不无道理的：经过二战末期的一段犯罪增长之后，五十年代早期曾有过短暂的平静，那时候的犯罪数量降到了 1938 年以前的水平。但仅仅到了五十年代后期，犯罪数量又开始持续攀升。

伦敦所有犯罪数量统计：

1934	1945	1956	1995	1999
86 863	128 954	108 582	817 082	100 万以上

p23 日益增长的暴力犯罪已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它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其中的一个危险信号便是，人们对这种犯罪行为越来越熟视无睹。青年女子在地铁站

外、在路人的众目睽睽之下被强奸，而没有人关注并伸出援助之手。

在下面的篇幅里我将引用一些报纸的报道，因为记者可以与受害者及其家属直接接触，也能和案件发生时袖手旁观者接触，为我们提供了关于他们切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

每天我们都会读到一些令人震惊的残酷和谋杀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没有什么明显的动机，不过是为了从领取养老金者手中抢夺微不足道的钱数，老人们常常为此而丧命。一伙十二岁左右的男孩绑架并杀害了一个四岁的小男孩，却丝毫没有认为自己做了错事；一名男子杀害了一个年轻的商店经理，被捕后向警察宣称谁还敢来试试当英雄，都是活该。以上种种事件表明这些罪犯们根本没有感到良心的谴责，事实上他们还因为自己被捕和判刑而感到莫名的愤怒。

1996年6月5日的《旗帜晚报》报道了一起男学生从背后袭击一位七十二岁老妇的事件：

“一名羸弱的七十二岁高龄的养老金领取者被两名十二岁的男生从背后袭击后，她的家人们正在极力挽救她的生命，说他们正在为她祈祷渡过难关。”

“埃伦·弗莱斯克兹（Ellen Fresquez），人称内莉（Nellie），遭到了小学生从背后突袭，他们转过她的身体把她推到一个铁栅栏上，手袋被偷走，里面没有现金，只有一包烟、一个打火机和一支笔。弗莱斯克兹的七十八岁的丈夫弗兰克（Frank），曾经因一次严重的中风而丧失了生活自理能力，昨天当他得知已经陪伴他五十年的妻子受到伤害时，又一次轻微的中风发作了。弗莱斯克兹全家彻夜守候在她就医的圣托马斯医院（St Thomas' Hospital）。弗莱斯克兹共有十个孩子，五十岁的卡瑞纳·斯科特（Carina Scot）夫人是其中的一个，她说：‘自昨天起，我

们一直陪在她身边。她现在生命垂危，完全依靠器械维持。此刻我们都在祈祷，每个小时，我们都会有她的病情报告。’”

p24

“斯科特夫人的弟弟，四十八岁的约翰·弗莱斯克兹 (John Fresquez) 告诉我们：‘这对我们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来渡过这个难关。父亲的健康状况极差，我们不敢告诉他内莉出事了，只能以后慢慢跟他讲。妈妈是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真不敢想像十二岁的孩子会做出这种事情来。这个社会的某个地方一定出问题了。这太不公平了，妈妈一生都在照顾我们，这对她真是太不公平了。’”

自那时起，令人发指的野蛮和暴力事件便几乎天天见诸报端，甚至每天不止一次。

如同我先前指出的，对超我的蔑视和对文化权威的攻击，伴随着积郁的攻击行为的释放，以许多方式表现在青少年学生的行为上，表现在大众娱乐、电影、音乐、舞蹈和美术作品中。

暴力行为的爆发，特别是在青少年当中的大规模涌现，在学校中非常明显。许多教师发现，他们的职责已经沦落到维持课堂最起码的纪律和把学生的注意力尽量拉到他们的教学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面临着一场暴力的蔓延。一名十二岁男孩被控强奸一名十一岁的女孩；一个十三岁的少年用枪从背后射杀他的老师；一伙女孩参与杀害了另一名女孩；一帮十岁左右的孩子组织实施了一系列袭击老太太的行为。未成年人犯下的暴力罪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据统计，未成年人针对教师的攻击行为，并造成严重伤害甚至终生残疾的，近几年内正呈上升趋势。某个教师联盟曾召集会议商讨如何保护他们的成员免遭学生的暴力伤害，最终都无功而返。他们澄清了一个问题，

即教师不应该为学生的暴力行为以及课堂上的霸道、逃课和违纪行为受到谴责。在老师接手一个新班级之前，早已不受控制的一小部分孩子已经开始为他们整体的行事风格定调，而这一小部分具破坏性的孩子时常具有同一种行为模式。正如克里斯托弗·哈德逊（Christopher Hudson）在1996年5月14日的《旗帜晚报》中所写：

在家中，即使孩子们不能从肉体上被兽性化，那他们也将从情感上变得残忍——无需征得同意，他们便可以在自己的房间用自己的电视和录像机这类的电器，观看从他们的某个兄长那里得到的暴力影片。从此埋下的隐患不仅造成在课堂上的捣蛋或是霸道的行为，更是导致街头帮派、群殴械斗、谋杀以及向政府请愿等行为的暴力之源。电视中的枪击、强奸以及谋杀所造成的不断的视觉冲击有助于加大一种文化对现实生活中真实暴力的容忍度，这似乎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当然这里指的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在电视上的各个频道中不间断播出的暴力节目。我们所在的社会允许电视中一天二十四小时无休止地播放充斥着暴力的电影，给那些整天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干的成人，那些尚未具备判断力的孩子们观看，必定会因此形成道德的困惑乃至绝望。

p25

事实上，在英国千百万的家庭中，电视已经扮演了儿童的最重要的教育家。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间，电视里的暴力节目比现在少得多，即使屏幕中出现暴力（通常是牛仔和印第安人之间），也倾向于给出一个鲜明的道德尺度；那时十至十二岁年龄段的暴力事件几乎是闻所未闻的，这不能算作一个巧合。难道说，阻止屏幕暴力的不断泛滥，回归到过去那种乐观向上的、用戏剧表现道德观点的电视节目，至少在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不再播放枪战

片，真的有这么难吗？如果我们希望将来学校不需要铁丝网和警卫的保护，我们就应该认真回顾一下历史的教训。

毫无疑问，电视电影在孩子们的兽性化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它们本身也体现了一个对自身价值进行攻击的文化体系。教师在课堂上的威信和领导地位被否定，孩子们认定他们可以自己或通过结交同伴获得技能和知识。相当大比例的儿童因此丧失了基本的数字和文学能力，而他们所谓的“新教学方式”和他们潜在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论的短处也暴露无遗。

4. 艺术的退行性解体

如果我们关注一下当代的绘画作品，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充满异乎寻常的空虚，侵略暴力和绝望预言的压倒性困惑，以及爆发性能量和对毁灭的怪诞理解的意象。

早在上世纪初，表现派作家们就预言了人性将要面临的威胁。他们早已洞察高压统治显现出的危险，在国家权威和机器大规模生产压迫下，人们过着无人性的、机械化的生活。表现主义源于艺术家对机器技术的无情逻辑和对利润数学计算的义愤，因为这些东西置人类天赋的技能和直觉反应于不顾。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让自己站在社会最底层人民以及工业社会的牺牲品和被遗弃者的一边。他们的表现形式夸张、尖锐、突兀，具有鲜明的攻击性，没有利用任何现实的或自然的手法。表现主义的作品中大多表现了人性被挤压、扭曲，以及对现代社会的恐惧和困惑。他们的目标是无拘无束的自我表达和情感爆发，自发性是他们最常用的词，并以此为口号。移情作用被排在了知识性和精确性的前面，因为只有通过移情作用或夸张手法，更深层的情感才能被表达出来，自然与人类的生机和骚动才能被恰当地展示出来。

路德维希·基尔希纳 (Ludwig Kirchner)、埃里希·赫克尔 (Erich Heckel)、蒙克 (Munch)、高庚 (Gauguin)、奥托·穆勒 (Otto Mueller)、奥古斯特·马克 (August Macke)、埃贡·希勒 (Egon Schiele) 以及考考斯卡 (Kokoschka) 仅是这一画派的一部分画家。但他们企图在这个日益危险且与他们格格不入的环境中重塑人类自我形象的人本主义的努力, 被现实环境中强大的主流势力击溃了。无论在自然界还是社会事务中, 人类已不再占据世界的核心和统治地位, 这反映在一个剔除人类形象的艺术流派中。这些在二十世纪早期曾占据统治地位的流派, 或多或少地被并入并屈从于现实的无序解体的普遍意象。

p27

瓦西里·康定斯基 (Wassily Kandinsky), 抽象画派的创始人, 他不单在其绘画中, 还在他的著作中表达了他对艺术在现代社会中角色的看法: “我们必须开创一种新的画风, 一种新的艺术交流的语言, 以激进的方式打破传统。” 在抽象画家们呈现给我们的现实中, 我们可以看到物体的各种存在方式: 原子微粒、向量和轨道、拉力线和张力线。我们所能感知的固体物质形态消失了, 被分解成了基本元素代表的自然力量。

我们也许会问, 二十世纪初的这些艺术家们是否预料到了现代科技的观念上的革命, 他们是否对此有所反应。毫无疑问, 西方文明超我形象的瓦解, 为新科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感性和知性的推动力, 最敏感的艺术学家们不仅预料到了而且反响强烈。

在抽象派画家、立体派艺术家、未来派画家、构成主义者以及现代主义的其他学派积极反映物理学的重大影响的同时, 另一学科也在使我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彻底的革命, 这就是精神分析。

对意识四维和潜意识的发现, 堪与物理世界的四维、相对论以及量子力学的发现相提并论。存在于意识层面以下,

心理的隐秘未知处，而又时常浮现于我们梦中的潜意识世界，从此成为超现实主义绘画中首要的主题。

供职于巴黎附近的圣迪济耶精神病研究所（Psychiatric Institute of St. Dizier）的安德烈·勃勒东（André Breton）曾绘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想和梦境用以分析。他也绘制并分析儿童的梦，因为他认为儿童的心理过程比正常的成人更接近心理的底层。他试图揭示出深藏并压抑于意识之下的内在世界，它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却又不为其所知。他在《超现实主义宣言》〔（*Manifesto of Surrealism*），1924〕一书中写道：“超现实主义基于相信更高的现实，相信至今尚被忽略的结合形式，相信梦作为无目的的思维游戏的非凡意义。超现实主义的目标是解除或摧毁迄今仍深藏于我们的潜意识过程中的心理机制，并为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找到解决之道。”

在《宣言》的另一部分勃勒东宣称，在理性主义、文明与进步的控制下，人类的想像力被阻遏了，因此超现实主义的任务便是调动潜意识的力量，以重建人们所有资质的平衡。

基里科（Chirico）、米罗（Miro）、马克斯·厄恩斯特（Max Ernst）、伊韦·坦圭（Yves Tanguy）、萨尔瓦多·达里（Salvador Dali）以及曼·雷（Man Ray）纷纷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梦的世界，在这里，时间与空间、实质与形式的范畴都无效了：物体的关系并行，对过去事物的回忆出现在当前事物中，在有组织的知觉全面崩溃中同时存在着不确定的宁静和莫名的恐慌。儿童时期或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特征表现在他们的绘画中；然而透过压抑的掩饰，他们向自我的统治地位挑战，让他们的本我世界展现在他们的画卷上。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他们是本我的忠诚奴仆，在现实世界和意识中叫嚣着寻找自己的发言权；他们把被自我紧锁并牢牢看管的大门打开了。在萨尔瓦多·达里对潜意识和梦幻想像的绝妙展示中，我们可以见识到施虐受虐狂，肛门色情以及偏执狂空前清晰和犀利的

面目。

总体上说，超现实主义和抽象艺术创造了一种新的精神动力和刺激，一个色彩和感觉的冲击，一个自我表达的新高度，这些都达到了以前从未尝试过的深度和广度。这场运动不仅发生在绘画上，还发生在音乐和建筑，以及文学和戏剧上；他们对人类关系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旧的界限被突破，传统被抛弃时，现代主义便意味着在举止行为、言语和思想上的不羁：深藏的东西将会浮出水面。

阿尔班·贝尔格（Alban Berg）、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毕加索（Picasso）、斯特林堡（Strindberg）以及魏德金德（Wedekind）继承并巩固了现代主义的精神，颂扬力比多的释放，成为第二代先锋。“新自由的朝阳”（即对心灵新世界的发现，以及这个新世界从压抑中的爆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后搅动了欧洲的文艺意识。

p29

爱因斯坦发现了蕴藏在物质中的巨大能量，他却无法预料到这一发现的后果，如果他看到这一宇宙能量能被用在原子弹上，他一定会感到很遗憾。同样，现代主义的创始者也无法预料到他们的作品将会产生的后果。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对从习惯势力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一个自由发展的人性的向往，让步给了对一个不再有人类存在的世界的向往——在无规则粒子的世界中，在分离的感觉与冲动的大锅炉里偶然的能量爆发中，个体被溶解了。换句话说，对原始自然力和本我能量的发现，不仅引发了人类自我形象的丰富与膨胀，还导致了认同的迷失。自我的综合功能在本我力量的冲击下屈服了，分裂替代了整合；困惑替代了目标指引。

早期的现代派画家，以及追随其后的抽象表现主义者和塔希（滴色）派画家（tachist）生动地描绘了自我的瓦解以及从现实和混乱的攻击中的退却，这标志着艺术退化的程度又加深了。

自我发现整合潜意识的各种驱动力的难度越来越大了，而这些被压抑的欲望正在突破旧有的界限并开始支配意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称其为疯狂的常态。我们可以预料到肛门挑衅、虐待狂、受虐狂以及破坏驱动的爆发。它们不仅向我们文化的规范和价值观宣战，还以它们自我毁灭的形象为荣。艺术家们将这些幻想向人们表现了出来：撕裂的尸体、触目惊心的鲜血、骷髅、皮肤和肠子的碎片、公然示众的排泄物、人类各种紧张、痛苦和恐怖的怪诞状态——我们所有的防御被撼动了，我们的感觉被强暴了。

p30 在口唇虐待狂的画像里，獠牙狰狞的头颅，浸淫在鲜血中布满抓痕被撕裂的尸体凸现出来；在众多绘画作品所表现的主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瘦骨嶙峋的尸体，龙虾的大螯生出了人的手指，巨大的阴道鲜血淋淋并生出了牙齿，自画像中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具攻击性的头颅，这些都象征着虐待狂已经凌驾于意识的自我之上。在詹尼斯·库内利斯（Jannis Kounellis）的画展上，陈列着大块的帆布，其中有十张覆盖了展览厅的墙壁，帆布无一例外地绘满了以原始处决方式被砍下的头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也成了一位诠释人类在虐待的态度中所表现出来的恐惧和失望的高手。在这些绘画中，人们几乎感受不到怜悯的成分，毋宁说，这些作品是在帮艺术家们或许还有旁观者们发掘虐待快感带给人类的灾难和苦楚。

p31 在一些诸如特蕾西·艾敏（Tracey Emin），戴敏·赫斯特（Damien Hirst）等等当代青年艺术家的画展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腐化和衰落的图像，它们象征着我们的文明在走向瓦解和死亡。它们看起来没有意义，就好像世界已经没有真正的意义，观众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任意诠释它们。

第二章 哲学的颠覆者

1. 维特根斯坦和语词分析

艺术家开始了针对他们所感知到的现实进行攻击，接着哲学家们便针对他们感知到的道德准则进行理论批判。他们要证明，所有的形而上学和基于此的道德观念皆与我们的感觉相抵触，因此是无稽之谈，对它们的批判也就像在攻击毫无理性思想基础的喀迈拉怪物（chimera，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女怪——中译者注）。他们将自己看作是从失败的道德中觉醒的代言人，整个欧洲的道德已成真空，他们担负着发扬道德的重大使命。

逻辑实证主义者、语言分析家、后现代主义者以及解构主义者的观点起初纷杂而混淆，每一派都很武断地强调自己的主张，后来逐渐形成了共识，为消灭超我，扼杀西方文明形而上学的和道德的理论框架提供弹药。他们过去没有，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意识到，人类从本性上需要建造一个理论框架用以认识客观世界，并找到自己在这个框架中的位置。哲学家的任务就是使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成为一种理性的批判，为达到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和以理性为基础的道德体系铺平道路，而不是仅仅否认形而上学的意义。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探究了道德信念的腐化和对其指导方针的蔑视所导致的部分后果。我们还看到了道德真空在欧洲文明中的发展导致了野蛮、

侵略性以及残忍自负的驱力的爆发；同时，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自我已经丧失了它对超我的信任，违抗超我的支配，投靠本我的冲动，屈从于本我的鼓动。这便导致了在利润驱动的名义下对财富无休止地野蛮追逐，并由此将大自然变成了一件没有灵魂的商品。人们对自然界的开发和征服，丝毫没有考虑到对我们所依存的自然环境的破坏；对动物的移情作用的减弱，使得人们极其残忍地戕害生灵，导致成千上万的物种绝迹。与此同时，商业、金融公司会同日益自我膨胀的官僚们，在他们的统计表中将人类简化成没有生命的数字，无视人的身份与尊严。近几十年来，还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我们发现对一些公民的暴行缺乏道德舆论的谴责；而或许更令人担忧的是罪恶感和良心的丧失，尤其是那些犯下骇人暴行的年轻罪犯，竟会对被判有罪而心生怨恨。这些为非作歹之人的“无辜”态度令世人愤怒和不解。由于我们都清楚地看到道德缺失所带来的后果，“道德危机”因此受到了广泛的关注，道德价值的重要性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

针对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的不满、愤怒和暴力，我们既不能再简单地归咎于资本主义、贫穷和社会剥夺，也不能怪罪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所带来的分裂性的影响。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在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时代，革命运动分裂性的、对抗主义的宣传的影响已经消除，民主在政治制度中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进步，贫穷现象显著减少，然而反社会行为却已达到空前的规模。当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社会地位的丧失持续摧残着我们的社会生活时，我们不能将这些看作是无明确目的的暴力之风盛行的根源，而没有起因的，反叛行为的发生也不仅限于被压迫阶级。举例来说，由毒瘾而衍生的犯罪行为不止在贫民区而且在富人区都非常普遍。

许多人由此认为我们需要一些道德原则来引导我们的判断，在我们与他人接触时逐步向他们灌输责任感。然而这不由

得让我们想起宗教权威的圣诫已丧失其可信性，想起封建统治者以及更近一些的独裁政府强加给人们的责任，他们都宣称顺从他们的指令是我们的责任。关于生命的意义，他们都持有一个形而上学观念，以便让我们相信这并非是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或对权力的追逐，他们的统治顺应了天意和人类的宿命。

诚然，我们在工作和其他形形色色的活动中必须履行某些义务，当这些义务成为我们谋生的工具或成为激励我们在任何活动中成功的工具时，我们可称其为工具性义务（instrumental duties）。企业家有义务满足市场的需求，并依照商业法则来经营他的买卖。他必须懂得如何在追求利润时避免公然违反法律而逃脱处罚。这未必阻止得了他的欺骗以及钻税收和公平竞争法则的空子；但他有责任将这些事做得既巧妙又有心计。即使是罪犯也有责任在他们犯罪时，尽量将被警察擒住的机会降至最低。为了避免破产或沾上贪污和被起诉的恶名，这样的责任需要机敏的头脑。换句话说，无论某人参与何事，为了保证其成功，他必得吃透规范此事的法律。

然而这些不能视为有道德的责任，道德责任旨在达到普遍有益，保护生命，并善意地对待同胞，我们也可以说是利他主义本能的表现。始于十九世纪末的实现启蒙运动理想一次令人鼓舞的尝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演变成了对启蒙运动哲学主张的猛烈抨击。对战争的恐惧以及战争带来的贫穷和大规模失业，不仅引发了人们对这个漠视人民苦难的社会的深恶痛绝，还使得人们从一个无耻地废弃了自己信条的伪善道德中醒悟过来。

p34

一些“新哲学”的权威宣称，只有我们的感觉证据与逻辑的法则结合，才具有真理的价值；而基于形而上学的、声称具有普遍正确性的道德观念，被他们贬为无稽之谈。在他们的口中，所谓道德不过是情绪的烟和尾气（smoke and exhaust of the emotions），比空想和欺骗好不到哪里去。

维也纳学派的杰出成员厄恩斯特·马赫 (Ernst Mach)、弗雷格 (Frege)、伯特朗·罗素 (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施利克 (Schlick)、卡纳普 (Carnap)、诺伊拉特 (Neurath)、费格尔 (Feigl)、魏斯曼 (Waismann)、波普 (Popper) 等, 都堪称光辉的革命思想家。逻辑实证主义运动便是以他们的思想为基础, 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哲学, 更确切地说, 是基于哲学体系的反哲学。维特根斯坦掀起了一场针对启蒙运动的主张的论战, 原因在于他认为启蒙运动是建立在形而上学的假设之上, 任何事物都可以用这个假设加以解释: “整个现代世界观是建立在一个认为所谓的自然法则可以解释所有自然现象的幻想之上。” 同理, 他认为所有的形而上学都是幻想, 作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的伦理学也是凌驾于客体和事实之上的: “世界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 对它的观察也理应不受人类心理和动机的左右。” 他没有意识到对世界上所有事物的观察, 依赖于我们的兴趣的指导, 我们看什么, 看到了什么, 意欲看什么 (这一点就连波普都倾向于接受)。他坚持认为, 既然伦理学是先验的、超出了可观察的事实, 那它就是无法描述的: “世界的意义必定在世界之外。世界中一切事情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 该发生的就发生了。世界本身和世界中的客观实际不存在价值和意义; 如果存在任何有价值的价值, 那么它必定在一切发生的事实之外。因为一切发生的事情, 它们是怎样的, 都是偶然的。所以也不可能有伦理命题。” 以此推论, 伦理是不可描述的, 因此是无法说出的。“同理, 意志 (因为它是绝对主观的) 和伦理的基础都是无法说出的。而作为一种现象的意志只有心理学才感兴趣。”

p35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 康德认为任何伦理学研究都必须将心理学考虑在内。然而维特根斯坦却说: “意志, 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 都不能改变事实, 也不能改变可以用语言表达的东西。世界上的事物是怎样的, 对凌驾于世界之上的更高的事物

来说，对凌驾于我们的道德世界之上的事物来说，完全无关紧要，上帝不在世上现身。”此处我应当指出，在犹太人的哲学中，上帝超越了我们的感知，是超越我们的理解的本体，然而他在世上现身，让圣徒们传达他的意图，并告诸天下；现实的世界便是上帝的意志和意图的表现。而维特根斯坦却针锋相对地坚持道：“我们觉得，即使所有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人生的问题也完全不会被触及。显然那时已经不再有问题留下来。实际上，确实有不可言传的东西。那些超越了我们现实世界的、神秘的、更高的事物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他甚至还说：“任何理解我的命题的人都会认识到，它们最终是无意义的。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然而对于一个更高的形而上学的世界，他又无法表达。对于无法表达的东西，我们只有沉默。”

经过歪曲、老套的陈述；他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只能认识现实的世界；而对于那个超越了我们感觉的、真实的、更高的世界，我们是无法真正认识的，因为我们无法用语言表现它们。他认为我们不能理解无法表达的东西。从这一点出发，可以得出知识存在于语言并被局限在语言中，因此语言分析替代了精神分析。精神只存在于语言所表现的范围内。

我记得多年以前，在广播中收听爱因斯坦的哲学演讲时，他曾说到，他不懂语言哲学家是干什么的，“因为难道我们都未曾有过这种经历，即脑子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却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只有天才才能将复杂的哲学问题转化成这么简单直白的语言。但是维特根斯坦坚决否认了人的头脑能够通过努力达到对超越我们所感知到的世界本质的理解。按他的说法，我们受到了自然科学的限制，而他认为自然科学只可用来解决我们所感知到的现象问题，任何超越逾此的尝试都是徒劳的。他最后断言，超越感觉的，尤其是形而上学的事物是无意义的、不可知且不可说的。因为正如罗素所说，肯定或否定事实

是语言的任务。维特根斯坦和他的追随者显然没有理解，科学的理论往往出自关于世界本质的形而上学观念，并旨在证实其正确性；他们也不懂得我们的理解是以综合作用为基础的，即康德所说的先验综合。

心理的基本功能和目标便是将多种感觉和印象整理成为一套统一的、概括的理论，以达到对世界实然（it is the way it is）和所以然的理解，将暂时的与永恒的事物联系起来。由此确实会经常产生一些关于世界和人类状态的虚幻想像，这些想像有可能是荒谬的或缺乏经验证据和逻辑性，在许多宗教和意识形态中，我们能发现这种情况。同样须承认的是，我们用于表达信仰的语言有可能是完全荒谬的。然而这种荒谬性并非存在于语言中，而是体现在语言所表达的思想中。因而，哲学的任务便是分析人的心理如何使语言产生，并赋予语言以意义。

p37 对语言本质和起源的深入研究的确很有意思。近五十年来，社会人类学和脑神经学在我们对人类这一特殊能力的进化的了解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进展，然而维特根斯坦却对此一无所知。对于他来说，心理停留在语言中，作为客观事物可以得到验证；而他认为对于逻辑和科学的探索来说，心理过程和语言形成的过程过于难懂了。从这点看，我们可以称维特根斯坦和他的追随者们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行为主义心理学也宣称，只有心理的外部表现，即一个人的行为，才是自然科学应该研究的课题；而它后面的、非客观的东西应该被科学心理学所忽略。这是一种故意破坏的行为，抨击心理是一种神秘的实体，是为我们所不可知因而而是不可言的。这种宿命论摆出一副逻辑必然性的姿态，不时地引用弗雷格和罗素的数学公式，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导论中总结道：“以我所见，此处所表达的思想的真实性是明确的和无懈可击的。我由此相信，在所有的实质性要点上，我已经找到了问题的解决方法。而接下来，如果我没出错的话，

这项工作的价值还包含了它显示出当问题得到解决时，我们取得了多么微小的进展。”

在对语言进行了小心翼翼的，往往是歪曲的分析之后，维特根斯坦先生似乎要设法证明它们丝毫不能使我们接近“更高的事物”，只能表明主张这样做是错误的。尤其不能达到任何一种我们所能肯定的道德概念；因此，对其进行任何哲学探讨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说，心理在它真正的任务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并说服它自己接受这个现实。

维特根斯坦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对个人的哲学道路具有心理动机的典型实例。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不可遏止的矛盾冲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看待事物的方式，以及一个人应该证明什么或隐藏什么。鉴于我们更加文明的态度，当我提到他是同性恋并为这个“可怕的痛苦”深感羞愧和困扰时，我认为我并非乐此不疲地粗俗揭露维特根斯坦不得不深藏的秘密。他被迫在公开行为中将此事深藏起来，不希望任何人谈及此事，自己也不想说。他希望在别人的眼中他的外显行为没有揭示出他力比多的秘密——他内在（或是高层）本质的自己。他的语言只与事实有关，只与可被感觉到的事物有关，只与外显的表现有关，他认为这些是关于实然的真实知识的唯一来源（如他所宣称：“世界是所有实然的总和”）。超越它的任何东西都隶属于形而上学的构架，以信仰和臆测为基础，因此是无意义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确有超越事物外在表现的东西存在，他称之为“更高的事物，生命和宇宙的真正驱动力”，而他对男孩子的爱，一定不能被认为是爱。我们可以说他在他的内心世界和外面的世界之间搭建了一个屏障。

p38

维特根斯坦带领我们面对面地接触心理学，特别是哲学思想的无意识基础。我认为通过一个哲学家或一个画家的心理学问题去判断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或一个画家的作品，或是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个人的艺术或哲学作品，都是错误的。因为我认

为应该基于作品本身的价值来评判它们。但如果一个哲学体系充满混乱和自相矛盾的论述，这些主张以逻辑和科学的名义反驳逻辑和经验主义论据的法则，那我们将会发现，要做出这样的论述需要多么聪明的头脑啊！很多证据证实维特根斯坦的哲学思考反映出一种心理骚动，一个他自己无法解答的强迫性自问。在他的演讲和后来的著作《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中，他强迫性地反思着，一个人本能地感知的事物和他有意识地为他自己和这个世界呈现的事物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在一次演讲中，他谈及了对解释的见解：“假定红颜色（抑或是自己思考某事物的现象）是某种特殊和难以描述的事物，那么人们会认为他可以通过看一个红色的图像就可以知道红色是什么。但如果我说我在你的头上敲一下，你就能正确理解‘红色’这个词的含义，你会怎么说呢？当然不行。并非只要有一个解释就会产生理解；也不是说只要有一把钥匙就一定打得开一扇门。”然后他又说：“一个解释不能是隐私的，它必须是公开的。一个解释必须提供一种到达某处的方法，指明道路。它必须提供一种使用语言的方式。因此如果有人问：‘即使我不能向别人说明什么是思维，我能对自己说明。’我们的答复是，也许他所做的使他有可能正确地使用语言，但这根本不能成为我们所说的解释或说明。”通过他扭曲的蒙昧主义，维特根斯坦打算掩盖“实然”的真相。

他严守隐秘的自我，他内心深处的宝贵财富不会被这个世界理解和欣赏，他也不打算将它们浪费在这个冷漠甚至是排斥的世界上。据与他关系密切的诺曼·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教授说，在许多对他明显冷淡的场合，他可能会很敏感，但如果马尔科姆向他确保的确理解他所说的话，他便放松下来，采取缄默和敌视的态度。他不相信自己能向他人表达自己的知觉和思想，甚至怀疑一个人能否知道或理解他自己的情感乃至肢体的感觉。在他的某次演讲中，维特根斯坦谈到了我

们对我们的身体姿态和肢体位置的感知：“为了移动我的胳膊，我必须知道它在什么位置以及是否我已经移动它了。然而，如果我不去看它，也不用另一只手去摸它，我怎么能知道我的手在什么位置呢？我如何获知我的手指弯曲了？当你的手指以某种方式弯曲时，你总能有确定的感觉吗？你总能觉察到这种感觉吗，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从另一个会议的笔录中，有这样的论述：“有一个哲学问题是关于人真正看到了什么。一个人真能看到深度、物体、表面、外观等等吗？你很可能会说所有这些都是解释、假设等等，一个人看到的其实是一个布满色块的平面。但是如果我被要求描述我所见到的，我会以物质对象的方式表述：我看到一张瓷砖面桌子的顶端，右侧有一个墨水瓶，等等。我无法只用色块来描述它。人们也许会想，虽然我不能用语言来描述，但至少我能画下来。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不知道我要画的是什么物体，我根本就没法画。他的强迫性自问甚至涉及到他自身的知觉和感觉，以及一个人如何能真正了解它们并以语言或绘画的形式传达它们。他的自问暴露了在他的自我中，坚持感觉的真实和如何言说和传达它们之间的极度分裂：“只有能被语言表达出来的才是客观的——即公开的现实，”而为了保护他自己免遭被评判、误解和谴责的威胁，不能公开表达的依然深藏在他的自恋防御所强设的壁垒之后。

p40

维特根斯坦在授课期间留给学生的一个永恒印象便是沉默寡言。学生常常发现他坐在自己的帆布椅上，长时间的沉默，不与任何人打招呼；他看上去像是全身心投入到严肃的反思和某种自我拷问中。没有人敢用闲散的话题打断这种沉默。诺曼·马尔科姆常提及为何他会由此联想到贵格会教徒的祈祷会。任何自发的自我表达都须经过谨慎的审核。据他的学生说，他痛苦的沉思有很多是难以理解甚至扰乱人心的，然而其引发的反响却意义深远，并得到学生们不同程度的神会，产生

了一大批追随者。我认为，可以肯定地说，他吸引了许多敏锐的青年人，这些人缺乏父亲的引导和回应，或是在升华的水平缺乏宗教“父亲”和启蒙运动理想的引导和回应。他们失去了方向感，不知明天的意义何在，无法找到一个能够关注他们情感的文明社会。如何交流，如何找到正确的语言，并用确切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想法，都已成了哲学家们的困扰。同其他所有的困扰一样，它不会达到任何目的，而无目的则成为终极智慧——对绝望的回答。这也是哲学的终结——哲学否定了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心理和智力骚动使许多人都在质疑所言的意义，维特根斯坦是那个时代典型的代表，他也成为失去方向的一代人的楷模。

2. 维也纳学派

p41 第一次世界大战揭示出旧教条的破产和伪善，在它结束后的几年间，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执意以一种不容妥协的态度批判所有的形而上学主张和它们所使用的语言，目的是为开创一个理性社会扫清道路。他们坚决要将所有的主张或立场纳入两个中心问题：“你的意思是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他们认为，通过坚持不懈地问这些问题，一个人就能澄清所有哲学和政治主张的适用性和真正价值。这些问题不可避免地指向查证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只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一个主张就可以被认为是有意义的。

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启发（尽管并非在所有问题上总是与他们一致），也意识到形而上学的非理性主义的危险，它不仅支配着教会的教条，而且还支配着黑格尔的极权主义哲学及其对卡尔·马克思的影响。他们将所有的形而上学都看作是缺乏逻辑和经验证据考证的理论构想，容许甚至鼓励各种空想以永恒真

理的面貌昭示天下。然而，施利克反复警告说，批判哲学的目的是阐明和分析他们在认知和道德方面的主张，并对这些主张进行无情的剖析；不应直接关注日常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应关注知识法则。如施利克所说，“哲学属于世纪，而非以日计。哲学不直接与现实挂钩”。社会主义者卡纳普曾写道：“所有我们这个学派的人都对社会和政治的进步怀有极大的兴趣，但同时也确信对政治目标纯粹的逻辑 - 哲学研究必须是中立的，无论它们是否涉及个人的道德目标或社会的政治目的。”

既然他们忠实于民主社会主义，他们决定坚决地澄清所有关于知识本质的认识论问题，以及我们是如何达到相信我们的主张是真理；特别是，一个形而上学概念，例如历史规律。工人阶级把共产党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服从其领导。通过阶级斗争和工人、知识分子的革命觉悟，共产主义的理想，作为历史的巅峰，终会被实现。尽管它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并要推动人们从被奴役和剥削的境地中得到彻底解放；尽管在工人的解放事业中，还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只要他们对这个形而上学幻想的真实性深信不疑，清洗和屠杀也不能转变他们对这场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使命的信仰，斯大林被看作是这个形而上学空想的化身和捍卫者，当然，也少不了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帮助。

p42

伴随着德国人的种族优越的形而上学幻想和建立“千年帝国”的虚构的天命，即使让所有“劣等”种族灭绝也在所不惜。维也纳学派的成员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在为一个理性和人道的社会而战的哲学派别，不为历史规律（波普称之为“历史主义”）的幻想所迷惑，这一现象显然是狂躁 - 虐待驱力激励了那些不顾一切理智和常识而相信这个幻想的人们而产生的投射作用。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荒诞的神话影响对现实感知的扭曲。因此不难理解，为何哲学家坚持他们有关认识论的提问

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并宣称这是科学的方法，绝对客观的观点，而且完全以感觉所提供的资料为基础。

p43 在这里，我想引用物理学家、心理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厄恩斯特·马赫（1838 - 1916）在他的“基础的 - 理性的纲要”中一段很重要的话：“那种认为科学必须局限在对事实的陈述上的观点，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排除所有不能为经验所控制的，高于所有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坚持此观点（包括物质和精神方面），那么得到的结论就是‘感觉’是一切可能存在的物质和精神体验的基础，而理论概念只是连接它们的纽带。形而上学的概念只不过是一系列令人困扰的伪命题，而且离题千里。”包括维特根斯坦、施利克、诺伊拉特、卡纳普、魏斯曼以及波普在内的所有激进实证主义运动成员和支持者都接受这一论述作为他们的哲学基础。然而，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你否认了对形而上学观念的任何理性判断，如果你宣称它们没有任何理性意义，视它们为无稽之谈而断然摒弃它们，那么我们就拒绝考虑对它们进行理性的研究。事实上，我们这是在鼓励各种非理性的形而上学观念，并否认哲学在对其做出理性判断方面能起任何作用，这就为一个退步的进程和偏执与狂躁驱力冲破无意识幻想的防线敞开大门，使它们得以统治形而上学。这公然违抗了哲学的基本任务；实际上，你这是在阉割所有哲学的努力，并将对理解的探求降低到对感觉印象的比较，而这正是他们所标榜的终极知识和理解。我们拒绝分析哲学在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复杂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此难免会使道德不加约束地获得非理性的和庸俗的思想模式，而原始空想将会占据道德的统治地位。

这个事实的一个悲剧性的例证是，施利克，这位严格的经验主义和逻辑哲学推理的典范，被无需对自己的无理和野蛮道德进行理性检验的纳粹党人杀害，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也不得不在极端仇恨和暴力的侮辱席卷欧洲之前疏散流亡。

如果我们检验他们的认识论，就会发现他们对感觉在知识的构成上所充当的角色没有表示出充分的理解，而这一过程早已被洛克（Locke）以及后来的康德和叔本华明确地指出过。感觉是唤起先验概念的触发器，先验概念又被洛克称之为先天概念，它将感觉转变为知觉。康德曾简而言之：“毫无疑问，我们所有的知识都始于经验。因为除了物体作用到我们的感官而将它们转化成知觉（心理表征）这种方式以外，我们知识的接受能力怎能被唤醒而运行的呢。因此从时间上来讲，我们的知识不是先于经验，而是始于经验。然而，即使当我们所有的知识始于经验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出所有的知识都出于经验的结论。因为，极有可能恰恰相反，我们经验的知识是我们的感觉印象和先天认知能力的协调产物。”

我们先天的心理能力（先验的）对感觉进行解释，产生知觉（对物体的心理表征），这些知觉与其他具有普遍特征的知觉，使我们能够进行概括，提出理论，直至宏大的理论体系，从中我们便可得出事物的涵义。因而，我们通过一个综合的过程来达到对事物的理解，这一过程对于人类的心理来说是先天存在的，康德称之为先验综合。人类心理不仅试图理解我们所经历的事物，而且还要用宇宙的本质和生命的意义来解释它们。这种通过自然综合（即将所有给定的经验协调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得出一个宇宙意象的尝试叫作形而上学。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种形式的论证是人类的自然需求，就像这些问题：“宇宙的起源是什么，它是如何被创造的，人生的目的又是什么？”我相信，这些问题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而且，我将会在下一章说明，它们将不可避免地存在于人脑的发展中。自康德认识到人类需要形而上学以来，就“真理内容”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令人沮丧，迄今为止只能让人怀疑形而上学的概念是否具有任何理性意义，或说它们只是人类思想的反

p45

常，几乎不值得引起注意。然而如果形而上学不是作为一门科学，而是作为人类心理的自然倾向而言，必须受到所有哲学家的重视。针对那些无法根据经验运用理智来解答的问题，人类的推理能力在不断进步；此外，在每个人心目中永远存在着某种他所信仰的形而上学体系，只要推理能力发挥出思辨的功能，这个体系便会永远存在。但是如果考虑到形而上学概念的不合理性而决定在哲学研究中将它忽略，那么我们就不可将它们纳入批评和理性的研究，也就是允许它们凌驾于我们的思想之上而不受质疑，并为非理性和幼稚的空想敞开大门。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形而上学的概念源自心理学的以及认知的需要（康德称为“天赋的形而上学”），而我们也很容易看到人们将各种情绪表象投射到形而上学的概念中，我们在神话、宗教和意识形态中都能发现它们，此外，还有我们的知觉，以及对什么是事实的判断都受到它们的影响。同样，道德的概念比推理的标准更能引发我们的情感需求。

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们为了获得形而上学的概念，是通过最大可能地实践他们的推理才能，还是不经过行使自己的推理能力，让自己的理解顺从时下占据支配地位的或盛行的形而上学构架，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如我们所知，启蒙运动所设定的任务是，将人类从幼稚的依赖和顺从权威强加给他们的教条，推进到一种成熟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行使他们的推理能力，依靠这种实践来评价实然；对任何权威所强加给他们的形而上学构架都能付诸大胆的批判。

p46

当维也纳学派的哲学家决意将所有的认知简化为感官知觉时，他们便拒绝了所有的形而上学，所有的普遍概念，特别是所有的道德，认为这些都是废话，不值得进行任何的理性研究。

“科学的”哲学家们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科学概念作为一

切知识唯一来源，其本身就基于一套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念，这套观念我们理应称之为形而上学。他们太想当然地把它看作是所有正确认知的必要形式，以至于他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如我前面所说，我们的知觉不仅取决于先验的（先于经验）范畴，例如因果关系、物质、范围以及其他；还取决于主流的神话传说、宗教，或是用以解释我们的各种经历，让我们以某种方式感知它们的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比如说，在一个宗教社会里，如果某件不幸的事情降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会试图领会这是上帝的意图或是上天的惩罚，并尽力向惩罚我们的上帝赎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应称之为一个文化的先验。

3. 背景：启蒙运动的哲学

宗教认为世界具有精神，是上帝创造的，因而是永恒的。宇宙、日月星辰，伴随位于中心的我们的星球，以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被看作是上帝意志亘古不变的表达。上帝对他的创造颇为满意，而当第六天创造结束时，他觉得他的造物完美无瑕；他用他的爱拥抱人类——他最杰出的作品，也拥抱着他所有的创造物。在他的怀抱里，人类能感受到他的保护，感受到他的宽恕，宽恕自己的越轨，肉体的罪恶，以及不信上帝。人们必须承认他们生来性恶，并要以感恩的心情谦卑地顺从于永恒的天父，用祈祷和膜拜来获得他的保佑和拯救。永恒的教会——在地球上对神灵的供奉，那些投身于它的人是忠诚的，受上帝保佑的团体，他们分享他的爱、他的力量，他们比那些不知道上帝或是怀疑上帝的人享有更高的特权。

p47

当人们开始将上帝分离出宇宙和自然，拒绝承认他是造物主，而且不想再屈从于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自然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时，他们不得不考察是什么使得这个世界成为现在这个

样子，社会制度的根源和它们的价值又是什么。求知欲代替了信仰和崇拜，人们开始以一种有组织的、科学的方式，自由地行使他们的推理能力。他们在探索周围世界时面临的神秘感和不安全感，以及他们自己心理的复杂性和困惑，都是他们研究的对象。支配着新科学的观念是，相信对现象的研究能够达到一种对普遍法则的理解，得出涵盖这些通用法则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可以通过观察来检验是否与所观察到的数据匹配。早在十六世纪贾科莫·萨巴瑞拉（Giacomo Zabarella）（1533 - 1589）就解释过理论是如何通过研究现象而形成的：“当我们形成关于某个事物的理论时，我们还可以从中寻找并发现别的东西；在我们根本形不成理论的地方，我们也决不会发现任何东西。”

基督教的中世纪将世界劈成了若干分离的部分，也考虑了各个部分的分化和固定成为独立体的过程，虽然新观念也使用了分类和分化方法，但这只是达到统一进程的第一步。中世纪的哲学家们将自然秩序看作是上帝造物的博物馆，万物被永远地归入各自的类别中，不会进化，它们是最终的产物。神学家们逃避研究，因为调查研究的目的是获得概括和普遍的原理，而这将会证实人的理性比教会的教条更重要。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III）在1219年，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IX）在1228年都曾说过：“神学必须将它的权力凌驾于每个单独的分支学科之上——如同思想在肉体之上——而对它的解释必须要独立地依据经圣徒们检验过的传统教义，而不是依据对‘肉体武器’（也就是说，通过感官的观察）的应用。”权威的论述、或经权威演绎出的推论，比任何论题都高级；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永远保持静止且相互没有联系。

文艺复兴将静止的中世纪转变为一个发展中的世界；将专横的上帝转变成一个富于理性和创造力的存在，他的意图和行为变得使人可以理解。人类自决力量的出现反映了在他们的想

像中有一个理性的神，创造了人类并使人类也有理性。

受到文艺复兴鼓舞的新知识分子认为在多样化的外表背后，事物存在着协调和统一；他们便致力于通过观察现象寻找统一的原则。由此，对现象的分类和区分不再是目的本身，而是为了获得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普遍原理而进行的统一过程（即归纳）的第一步。罗杰·培根（Roger Bacon）曾写道：“哲学原理是从个别情况中得出公理，通过渐进的、不间断的提高，以至于最终达到所有事物的最普遍原理。”

哥白尼（Copernicus）与很多同时代人一样相信一种世界观，即这个世界既是一神论的，也是柏拉图式的，其秩序表达着一种普遍的目的，其特点是和谐，这个世界是建立在许多有序、理性、数学的关系之上的。中世纪的天文学家满足于可以“记录现象”的天文模型，也就是大致符合观察“机械地做出”的模型，而哥白尼认为这样的模型还不足够完善，他认为，只有通过了解“宇宙不同组成部分之间无法改变的匀称协调”，了解宇宙关系的明显的必然性与那些错误体系的人为特点之间的鲜明对比，才能真正了解宇宙几何学。

哥白尼拥有两个不一定共存，实际上也很少共存的非常突出的优点：即观察时无比的耐心与形成假说时的大胆。这两种品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复兴的一神论神学理论和柏拉图哲学的影响。此前少有古人能够同时拥有这两个优点，而中世纪无人具备其中之一，但是哥白尼都具备了。

p49

笛卡尔（Descartes）的认识论建立在真实可信的东西（*veracitas dei*）之上：凡我们能够看见并且了解得很清晰、很明确的事物都是真的，否则上帝一定是在欺骗我们。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回忆学说”（*anamnesis*）中找到这一理论的根源，“回忆学说”认为，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某些知识源。对于笛卡尔而言，确定无疑的是，哲理化思考关注的是感知的世界，但是正确的方法绝对不能依赖感觉经验。事实上，

我们从来都不是仅仅根据感觉来理解事物，而是根据施加于可感知物体之上的理性来理解事物的：“我们必须寻求物质事物的‘特定的原理’，不受到感觉偏见的影响，而是借着理性之光，这种原理因此具有非常明显的证据，所以我们无法怀疑其真实性。”

思考的头脑对于笛卡尔而言才是人类经验真正的源泉，也是其存在的核心。“我认识到‘我思故我在’这条真理十分牢靠、十分确实，神秘主义的所有最狂妄的假定都无法把它推翻，于是我断定我能够毫不犹豫地承认它是我所探寻的哲学的第一原理。”[笛卡尔：《方法谈》(*Discourse on Method*)以及他的《沉思集》(*Meditations*)]

这段文字是笛卡尔知识哲学的核心内容，包含了他的哲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内容。笛卡尔之后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深受其影响，非常重视知识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我思故我在”使精神变得比物质更确定，并赋予自我的智力一种至高的地位，完全超越了早期的思想家所能够想像的范围。

斯宾诺莎可能是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当中性情最为温厚可爱、人格最高尚的一位，他相信贤达者在人类有限性容许的限度以内，努力照神的看法，在永恒的背景之下看待世界。

我们应当看到，斯宾诺莎把上帝从神圣的天堂带入到了人间，从而为神化自然铺平了道路；很快自然本身就变成了崇拜的对象，成为自然哲学和科学探寻的对象，而上帝就这样消失在这个人间世界里了。

p50 牛顿可能是最后一位在对自然的崇拜中没有忘记上帝的伟大科学家；实际上，他的科学活动都是对上帝的崇拜，是上帝创造了万物，创造了牛顿全力观察和揭示的宇宙规律。和笛卡尔一样，他运用理性和科学实验的手段，努力发现导引着自然机制的逻辑和数学定律，以此来证实上帝的存在。

牛顿非常相信，那种人皆观察到的经验事实中绝对暗含着

具有特定明确性质和功能的上帝的存在。上帝没有脱离这个科学试图理解的世界：事实上，自然哲学中的真实的每一步都使我们离首因的知识更近了，也因此将被格外珍视。它将拓展道德哲学的边界，因为，“只有我们能够借助自然哲学理解什么是首因，他凌驾我们的力量以及我们从他那里获得的益处，自然之光才能显现给我们对他和我们彼此之间的责任”。[艾萨克·牛顿：《光学》(Optics)] 因此，尽管宗教和科学在根本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接近宇宙的方法，并且都是有效的，但是对于牛顿而言，科学王国最终是依赖于上帝的，其最终的结果是使虔诚的心灵更加确定上帝的现实世界，也更加乐于服从他的命令。“自然哲学的主要任务，”牛顿这样写道，“是根据现象，而不是捏造的假设进行辩论，是从结果中推导出原因，直到最终理解真正的首因，这首因绝非机械式的……难道不是在现象中显现出来，有这样一种存在，他没有形体，鲜活、有智能，无所不在，在无限的空间里，也可以说在他的感觉里，密切关注事物本身，彻底觉察事物，当事物在他面前片刻展现时，全面理解它们。”(同上)

我们在这里见证了人们与上帝关系的转变：原来被看作是威严冷漠、深不可测和令人敬畏的超我权威已经变成另外一位友好的上帝，他爱人类，并对他所创造的宇宙感到满意。他希望人类理解他，就在人类身边来引导和教诲人类。人类感到拥有这位万能的父的认可和保护，这种让人产生安全感的想法让上帝的子孙们能够自由发展他们的智力和道德能力。上帝的万能和人类自我才能自信的表达之间的和解，最终导致了自我扩张到宇宙中；人类从上帝受理接管了宇宙。

p51

借着斯宾诺莎和牛顿的帮助，上帝的权力扩展到了所有的时空，世界依然存在着某种精神性的东西；超我依然存在，依旧是全能的，是可以辨识出来的。然而牛顿的世界概念慢慢失去了其神圣的根基。理性思维范畴侵入了宇宙，最终以数学、

几何和实验证实的因果关系来认知宇宙。空间、时间、运动和因果关系不再需要上帝的存在来加以解释了，似乎通过力学、几何和数学定律，就可以形成精确的终结性公式了。这种消除世界秩序中神的因素的过程，在拉普拉斯（Laplace）的著作中阐述得极为详尽，拉普拉斯证明，宇宙中所有的无规律现象都是具有周期性的，都受制于某种永恒的规律，这种规律确保所有无规律现象都不会超越某个特定范围，他相信这些正表明了宇宙固有的稳定性。

上帝就这样在力学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中被剥夺了职责，人们开始思考，这些能够使自身永存的机器是否还需要任何超自然的开端呢，此时，休谟（Hume）开始质疑首因概念，这一概念是否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必然的理念或原因呢，而康德则在忙于他那深刻敏锐的分析，这种分析最终把上帝完全从知识领域里驱逐出去了。于是在十八世纪的某个时段里，上帝从人类的视界里消失了；他消失于机械论的宇宙里。那么超我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呢？千百年来，超我的形象就像放映机把里面的图片投射到电影屏幕上一样，从其所寓居的心理被投射到天堂神界，而人们看着那些模糊的影像，却假装着那是真实的，那么现在这些超我形象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变化是在两个方面发生的：其一，随着科学的进步，物质宇宙承载了原先加诸于上帝之上的动力、威严和令人敬畏的特点；其二，p52 人类开始意识到理性的宝座和权力的形象一直都扎根在人类大脑之中。上帝这个古老的投射产物现在被送还到它的缘起之所——人类的心理。

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最为关注的，是解放人类的自我及其理性能力，使之摆脱对神圣超我的依赖，他们宣称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是知识的源泉，是首因（*causa prima*），是富有创造力的动因。

康德曾经对启蒙运动的理念做过精彩描述：“启蒙运动把

人类从自我强加的监护状态下解放出来，摆脱了没有外界指导的情况下无法运用其智慧的状态。如果这种监护状态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因为缺乏勇气和决心，在没有领导帮助的情况下不敢发挥其自身智慧导致的，那么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大胆运用你自身的智慧吧！这是启蒙运动战斗的呐喊！”这种追求精神自由的斗争代表了人类对成熟的要求，代表了人类摆脱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父亲形象的孩子般的依赖，追求解放自我的要求。但是为了要达到成熟，为了能够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人类必须掌握必要的工具和技巧。在智力层面上，这就意味着人类需要具有理性，他要能够掌握理性思维的技巧来获取知识。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但是同样的，“我思故物在”（“Cogito ergo est”），也就是说，“我思考，因此我创造了关于宇宙的真理”。正如贝克莱主教所言。

康德把认知过程中人的头脑占据中心地位的概念与感觉活动联系起来，证明它们不仅是在实践中互相影响，而且在理性的思考中也必然会彼此影响。尽管科学理论都是经过观察确认的，但是这些理论并不仅仅是观察的结果，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的结果，是我们试图整理我们的感觉数据信息并努力理解这些信息的结果。形成理论的并非这些感觉数据，而是我们的智力。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很大程度上，这个秩序井然、规律严整的大自然是我们的头脑吸收和整理信息等活动的产物。“我们的智力并不是从自然中总结了规律，而是把规律强加给自然。”

人类从神圣权威那里获得了独立之后，又面临着另外一种新的义务，当时的大思想家们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人类面临着与伟大的古希腊文化时代同样的问题，人们必须发现心理是如何运作的，从而能够掌握知识，能够形成建立理想社会所需要的正确行为原则，因此启蒙时代的人们必须发现反映理

性和道德的原则，这样人们就可以不需要依赖上帝而独立创造一个社会了。

当人们热情洋溢地追随新发现的自由时，他们失去了永恒的统治者；他们在宇宙中成了没有父亲的孩子，不得不鼓起勇气，自己去获取原先集中于上帝身上的力量和智慧。帕斯卡尔（Pascal）、培尔（Bayle）、伏尔泰、卢梭（Rousseau）、霍布斯（Hobbes）、洛克、休谟和康德，还有很多其他人，看到了人类面前开放的新的知识和自由的大门，他们将这些远景公布于众，众人为之着迷。新型的科学学院在整个欧洲相继成立。欧洲社会的自我成熟及其争取独立的斗争伴随着很多冲突和错综复杂的情结的困扰，这些因素确定了文化和个人发展的特点。旧的优势、固着和传统，保留那些古老机构所获得的既得利益，以及那些正统教派和教理的卫道者，一直守护着他们的阵地，反对革新者。

然而，什么力量都无法长期压制那种已经遍布知识领域的新精神的发展。所有论战、信息交流、观念借用和矫正等，都不过是更加支持新科学在整个智力生活中的范例。它们从不同角度为新社会与将要建立起来的新世界之间的协调做出了贡献。很多人都梦想着一个改变的人类，甚至梦想着一个由试验和计算创立出来的改变的自然界。他们赢得了同时代人们的关注，因为他们实现了人们掌握更多自然知识的深层渴望，这些知识将会使得人类更加全面地支配自然，使得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

人类不再主要面对上帝了，而是主要面对大自然，人们怀着一种曾经指向上帝的敬畏和惊奇之心来对待自然。他的祈祷转变成了研究和试验。对新发现的回应通过上帝控制自然而世

最深的代表人物。

同时，人类对政治和经济现实世界产生了新的兴趣，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最高层组织，即国家。国家机构再也不是上帝意志的表达，因此也不再是永久存在的，成为了理性研究的目标。知识分子接受新发现的自由的挑战，判定人们到底希望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

人们发现自然有她自己的法则，她遵循这些法则创造了万物、万事，“现实中的所有事物”都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过程，这个发现把一个死气沉沉的宇宙变成了一个创造性的宇宙，也激励了人类的创造性。这赋予人们确认和追求自己的目的和目标的自由，让他们睁大眼睛去欣赏一个新的未来。进化因而意味着向着更健康，更公平，更美的存在形式进步。认为自然遵循其自己的法则并因此拥有自己的创造力的思想，打开了一扇通向一个人类创造力的新远景的大门，通过这扇门，它能超越它古老的局限和负担。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曾强调说：“人类命运的改进与人类心灵的进步完全是同一件事情。”

然而，作为启蒙运动特点的乐观主义一度让位给了悲观主义。那时，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们曾宣扬对那些看起来注定的事放弃和顺从的美德；而另有一些人则戏剧化的表现对权威的敬畏和对自由的渴望之间、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之间，以及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和对“实际生活”的束缚之间时常发生的冲突。拿破仑想要通过他的征服之战向全欧洲散布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不仅在军事上遭到失败，而且还掀起了一场国家主义热情的复苏，这场复苏不仅是在公众之间，而且还有像费希特（Fichte）、黑格尔和海德格尔（Heidegger）这样的哲学家也复苏了爱国主义热情。（我前面曾指出黑格尔认为普鲁士政权将是辩证过程的履行和实现。马克思似乎没有觉察到黑格尔哲学中国家主义思想的这一面，而叔本华看出了这一点并给

予了毁灭性的抨击。)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混乱和令人绝望的后果毁灭了对一个开明的世界秩序的希望，让路给了国家主义热情的复苏，尤其是在发誓要复仇的战败国中间。斯大林承诺俄国要战胜西方资本主义；而德国人则欢迎希特勒带领他们战胜资本主义的犹太共产主义者，犹太人被打败并受尽对他们民族自豪感的凌辱。现实告诉人们乐观主义是没有根据的，这激起了人们愤怒的反应，它诉诸通过攻击和专政得到释放，这使人们团结起来，为胜利，为重拾国家自豪而战。

而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者们，下定决心要用启蒙运动的精神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来重燃乐观主义精神，他们的哲学家们决心击败已经毒害了欧洲思想的旧的形而上学空想。

4. 维也纳学派的难题：理论与实践分离

维也纳，凭借其光辉的学术和艺术革新，一度曾是中欧耀眼的文化之都，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和君主政体的坍塌而丧失了活力。社会党的舞台已经搭建好了，他们开始了一项意义深远的实验，不仅通过激进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而且通过价值观的转变，废除了旧的阶级构架。他们推行了一种团体感和美学理想，对公共健康和社会服务体系进行了彻底的变革，对教育进行了激进的改革，因此超越了其他社会力量的零星的社会改革。然而，他们走得更远，正如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奥托·鲍尔（Otto Bauer）所说，“我们的目标是带来一场人类灵魂的革命”。最早的社会主义宪法文献之一，涉及到了“妇女问题”，坚决确立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平等和地位，确保了她们不仅在教育而且在职业上的同等机会。宪法的另一个章节强调了没有获得文凭或学位的年轻人不能被投放到劳动市场上。有技艺才能的孩子应该受到训练以取得熟练工匠的文

凭，而在有了若干年的经验后，将被授予相应行业的硕士学位；有学术才能的孩子应当拥有获得大学的医生、律师以及建筑师学位的机会。相当高比例的妇女成为了医生或律师。他们还最先建立起一套国家健康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

大批的出版物应运而生以激发民众的学术热情，极好的“工人图书馆”在各个社区建立起来。维也纳的社会主义运动谨遵列宁的格言，即工人只有赶上甚至超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和知识水平，才能成功地推翻旧政体，成为有效的新社会的立法者。

相当多的旧的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在那些担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会遭到削弱的牧师的帮助和鼓动下反对他们，他们要经过比原先想像的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达到目标。然而，尽管在被反革命的半法西斯主义者陶尔斐斯（Dollfuss）镇压以前及纳粹入侵之后不久，他们仅活动了不到十五年，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当相信进步，相信价值观和社会体系必须转变和改革的信念充满社会之时，不幸的是，人们听到维特根斯坦的言论[此处我再次引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 - Philosophicus*）中的话]：“世界中一切事情就是它们本来的样子，该发生的就发生了。世界本身和世界中的客观实际不存在价值和意义，因为一切发生的事情，它们是怎样的，都是偶然的，所以也不可能有伦理命题。以此推论，伦理是不可描述的，因此是无法说出的。同理，意志也是无法说出的，它是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一种现象的意志只有心理学才感兴趣。”

p57

如诺曼·马尔科姆教授所评价的：“维特根斯坦的性格便是极深的悲观主义，无论是在对他自己的还是整个人类的前景上。”任何与维特根斯坦关系亲密的人一定都能意识到，他认为我们的生命是丑陋的，我们的心灵处在黑暗当中——这是一种接近于失望的感觉。我们也许可以补充说，他感到我们无法超越和改变现实（世界上事物的状态），这一思想深刻影响了

他的悲观主义。

逻辑实证主义者决心建立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可以对所有论述和命题的真实价值进行判断，只需问它们是否建立在可靠的经验主义基础上，即是否建立在由感觉所提供的证据之上。他们依据独立于价值观、兴趣或道德观念之外的感觉经验鉴别事物。任何不满足这些条件的理论或命题都不被承认，不是对其意义进行分析或研究，而是拒绝接受。

伯特兰·罗素坚持认为一个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哲学体系不能证明乐于施加残暴是不好的。与此相一致的是，维特根斯坦宣称的，“某人被抢了钱包”是一个在科学思考之外的道德陈述，它只能描述感官知觉，观察到某人将手伸到了另一人的口袋里并拿走了他的钱包。此事的对错是一个道德推论，与科学的观察无关。无论能了解的是什么，罗素说，都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了解；但是从感觉、愿望、价值和道德来说，事情是否合理，便是它的领域以外的了。因此，他们作为人，也许有某些关于社会罪恶的观念而站在进步的一边；但是作为哲学家，他们不得不忽略这些问题。维也纳学派的大多数成员都十分同情左派，并认为他们自己是社会民主政治的支持者；而且

p58 对于理论和实际思考的分离，以及哲学置于他们中间的壁垒感到非常的不安。从社会民主政治和纳粹以及共产主义对立的高度，卡纳普写过一篇评论，题目是“理论问题和实际行动”（Theoretical Questions and Practical Action）。在文章中他试图阐明，理论问题和实践活动之间有一个严格的区分：“维也纳学派想要达到的政治标准在科学的理论领域之外。当一个人能够证明哲学的和宗教的形而上学时常象征着一种我们所要拒绝的危险和麻醉时，我们却无法通过经验主义的哲学来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希望通过呼吁和宣传，尤其是通过教育影响公众，但是我们必须清楚这些影响处于科学的理论领域之外。”

然而，到那时为止，这些对逻辑实证主义方案的解释和辩

护已变得不合时宜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某种程度上促使了左派的瘫痪。纳粹狂热信徒的运动，共产主义者的运动都不屑于对他们的意识形态的经验基础进行艰苦的分析，而是直接用行动表达他们的信仰。法西斯主义者粉碎了社会主义的政府，接踵而来的便是纳粹的入侵，葬送了理性哲学的所有痕迹，摈弃了那些他们认为阻挡了千年德意志道路的人性。理性和智慧，以及关于他们信仰的优点和缺点争辩，都被看作是对“德国精神”的威胁。

1936年，施利克被一名纳粹分子杀害，他的谋杀案由奥地利的天主教会审判。在此之前费格尔便看出，在反犹太思潮增长的形势下已没有机会进行他的专业研究，于是他离开了维也纳，移民到了美国。1934年，舒施尼格（Schuschnigg）政权接管时，诺伊拉特流亡荷兰；卡纳普于1935年移民美国；波普于1937年逃离维也纳，在新西兰找到栖身之所；魏斯曼则由牛津大学提供了一个教授之职。维也纳学派最后一位留守的成员哥德尔（Gödel）也移民了，他于1940年设法逃跑，经由中国满洲乘船到达旧金山。

p59

伴随着维也纳学派的瓦解，他们的思想也日益国际化。当逻辑经验主义者不得不离开他们最初的精神家园或被杀害时，他们的作品却赢得了国际上的承认和瞩目。尤其在美国，他们受到了相当多的关注，并对美国的哲学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由卡纳普和费格尔编辑的杂志《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受到普遍好评，足以说明逻辑经验主义在美国的传播之广。随着科学哲学理论在大学的建立，新的研究学院和越来越多的职位在大学里开设。

尽管他们不得不离乡背井，但在英国和美国却受到了狂热的欢迎。

5. 逻辑实证主义在英美走向语言分析

在家乡，维也纳的哲学家们曾遇到过一股非理性空想的浪潮，他们试图通过一个无情的语言分析来挽救一个理性文明的前景。统治阶级的神学和政治学掌握着语言的措辞，他们宣称这是生命本质的永恒真理，而这却是与逻辑和经验证据法则相背离的；同时，他们标榜自己是一个道德的世界观的捍卫道士，而他们的世界观有着邪恶的目标，他们的完美典型是我们所知的最不道德的表现。逻辑实证主义者希望，使用哲学规则，通过对语言的使用和误用的批评，来捍卫民主。他们被温和地指责为建立一种语言管制（language police，也可译为语言整顿——中译者注）。这个双关语在后来语言分析的发展中已经不再那么有趣了，尤其是战后经过奥斯汀（Austin）在牛津大学的演讲和文章中详细说明之后。

p60 维也纳的哲学家们到达英国和美国时，发现这些国家的情况很不相同。他们被视为一个业已建立且被广泛接受的哲学氛围的重要创始者，而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些国家都有过针对形而上学体系的革命，而不同于奥地利和德国的是，他们早就推翻了封建主义的政权和意识形态。美国宣扬人权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基础之上，个性自由的观念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在英国，贵族阶层明智地收买聚敛了巨额财富的企业家，设法以国家身份的象征而幸存下来。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保住了阶级体系的延续，即贵族阶层高高在上，资本家作为国家重要和有价值的成员得到完全的承认，军队和教会不再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威胁，因而其存在可以被容忍。事实上，教会、军队和资本家这三个阶层在全世界都被视为维护了民主和文明的优点。

在美国，破除教会的形而上学和封建等级制度更加激进一

些。毕竟，北美大陆的人们是从曾经风行欧洲的宗教压迫和贫穷中逃离出来的，他们在这块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自由之地上看到了新的机会。自然，他们科学的世界观不会受到敬畏权威和宗教教条的阻碍，还将帮助他们达到某种意义上的繁荣。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景象是，每个公民可以自由发挥他的才华，通过他的努力提高生活水平而获得承认，在他的同胞中赢得荣誉和威望。

然而，他们的科学观与欧洲的哲学家不同。新大陆的劳动者和农民拥护资产阶级的哲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试图加入资产阶级，成为中产阶级的成员，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逐渐开始在普通人的思想和政治倾向中占据统治地位。他们看到了能过上体面生活的新机会，于是大力支持思想自由、自我表现自由和追逐财富的自由；而且，即便不是全部，也有多数人进入了中产阶层并热情地维护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他们成为所有极权不妥协的敌人，拒绝那些宣称能够指引人们命运的先验信仰的诱惑。他们想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即使他们之中有人祈求上帝的帮助，也不希望上帝决定他们的命运。他们想要提高劳动的效率，提高生产力，并增加利润和财富。而能够保证这些成功的便是利用科学进行技术革新。为了追求财富和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自信，新兴资产阶级决心应用科学和技术以改善生产方式。

p61

两位杰出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 - 1910）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 - 1952）对美国的乐观主义给出了最系统的描述。威廉·詹姆斯是公认的实用主义创始人。实用主义认为真理是由有用的想法组成，而想法的正确性需通过实现这些想法来加以证实；换句话讲，构成真理的想法应符合按照这些想法所得出的结果。实用主义承诺他们能够解决哲学的唯心论和唯实论之间的老矛盾，唯心论认为思想存在于头脑中，而唯实论认为思想是对感官所感受到事

实的反映。詹姆斯看到了现实与我们出于目的而对其进行判断的方式之间的联系。换个说法，我们探寻真理和理解，都是为我们的利益和生存本能服务的。我们或许会发现威廉·詹姆斯对实践的关注，有很多处预示了尼采（Nietzsche）对语言运用的政治方面的理解：“通过命名和分类，我们做事便无法持一种实际的中立态度，而是遵循着社会的态度和结构。”

p62 约翰·杜威发展了系统的实用主义，他将其看作是一个与社会问题密切相关的哲学体系。他的哲学是关于生活应该是怎样的问题，他试图在道德和科学知识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他的逻辑学著作不是以一种抽象的或纯粹的形式，而是以科学研究的方式，概括地说明思维是如何运作的，普通的生活问题应当如何解决。他由此进一步推动了意向性概念以及备受叔本华和尼采推崇的意愿的首要性。但是他坚持认为，对事物的研究必须朝向人们的目标方向。

事实上，在英国，所有的语言分析家都是大学的教授或讲师，尤其是在牛津和剑桥。他们对古代传统相当冷淡，都认为自己是激进的。他们不想改变世界，因为毕竟，人们已经为民主而战，并早已取得了胜利，而且经常在美国同盟者的帮助下得到顺利的维护。他们曾为自由和民主而战，并在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胜利；他们认为没有必要让任何大的社会变革危及他们的胜利。1945年，英国首相工党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在工党获胜庆典的几天后宣布，工党不打算罢黜贵族，也不准备采取任何重大措施干预贵族特权。即使在既定制度内部进行了大量的改革，延续性也是明显的。尽管他们钦佩奥地利社会主义者取得的成就，并在许多方面受到鼓舞，但他们还是拒绝接受社会的激进变革。

牛津、剑桥的哲学家们决心检验语言的使用，借此对现实和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进行解释，而不是改变它。与他们的中央经济统制论相一致，他们坚持认为意图与真实无关，必须从哲

学论述中排除出去。他们只关心如何正确解释事物的存在状态，即“实然”。当奥地利的哲学家设想着清除非理性的形而上学假设的压力，为一个理性社会做好准备时，英国的哲学家没有打算使他们的工作成为变革的准备，他们的工作本身便是目的。为了防止学生失去兴致以及克服厌倦感，讲师们尽量从这样的一个话题开始：“当你遭遇某种困难的境地，你会怎么做？为什么？”但是，正如曼德尔（Mandel）教授所指出的，这种方式忽略了一个事实，即这些两难的困境是道德的困境，因为它们包含了通常人们应该如何行为的规则冲突。[C. W. K. 曼德尔：《语言哲学评论》（*A Critiqu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第二版，1979]

p63

在他们对人们如何使用话语的艰苦卓绝、小心翼翼，甚至可以说是强迫性的研究中，他们使维特根斯坦复活了，而他也对英国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方法专注于将言语的使用归纳成一套古板的、强制性的规则，这些规则规定我们应当如何使用语言，我们应该说什么，不能说什么。无论我们说什么，都受制于一套成文的法规体系，并对他们所说的语言的不当使用设置了禁忌。

这一拨牛津、剑桥的哲学家们当中最具影响力的成员之一 J. L. 奥斯汀，自 1945 年至 1960 年在牛津大学任职哲学教授。他为语言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为语法增加了新的维度。他认为语法在他所谓的语词工具的使用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对许多需要利用语词的工作以及它们不同的用法进行了大量的分析，提出了对语言功能进行分类的新方法。但是在他对语言哲学的这许多贡献之后，在他的著作，尤其是在 J. O. 厄姆森（J. O. Urmson）和 G. J. 沃诺克（G. J. Warnock）搜集整理出的他的演讲辞中，都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我们对现实的感知和了解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词。他认为错误地使用语词会使我们对感觉传输给我们的现象产生错误的知觉，因此只有对语言

进行悉心的分析，才能清晰地思考。他认为当我们检查我们应该说什么以及何时该说时，我们不仅在观察语词，还在检查我们使用语词所谈论的现实；为了让我们对现象的觉察更加敏锐，我们要获得对语词的敏锐觉察力。[J. L. 奥斯汀：《一个词的含义》（*The Meaning of a Word*），1940] 他教导他的学生，了解一事物是什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了解它的名字是什么以及恰当的命名。他提出语言现象学（*linguistic phenomenology*）这一术语，意即对现象（外观）的正确研究和描述，正如曼德尔教授所指出的，不是关乎我们外界的现实，而是关乎我们使用语词所表达出的外观事实。

奥斯汀从罗素那里得到了启发。罗素曾声称，语法能够成为了解现实构架的向导，而对语法规则的正确应用可以使语言获得，至少是接近它的真实功能。奥斯汀教导他的学生说，我们必须要做的是，将大量诱人的言辞谬误一个接一个地拆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有望学到一些正面的东西。而事实上，他也在坚持不懈地分拆“言辞谬误”，无论是在他的著作中还是演讲中。他和他的同仁们动用了数百万计的语词来分析语词，直到后来他的学生们开始对如此大量的词汇分析产生畏惧，而且感到自己表达想法的方式受到审查，以至于他们变得怯于表达，许多人感到困惑和迷惘，无法信任他们自己的思想。借用一句双关语，太多的不懈的分析导致麻痹（*too much and unremitting analysis leads to paralysis*。这里分析和麻痹二词发音相似，故作者称为双关语——中译者注）。这使得许多学生对能否最终达到对这个世界的正确理解，或者说，实际上是对心理本质的正确理解，以及特别是我们如何能够知道道德行为意味着什么，抱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我先前谈到的这种玩世不恭主义在哲学的破坏性颠覆中得以表现，并促进了这种颠覆。

6. 语言之塔：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

当盎格鲁 - 撒克逊人几乎，还好没有完全将哲学带入穷途末路时（像维特根斯坦打算的那样），法国的哲学家们也不甘落后，他们以自己尽力迷惑公众的努力引起世人注意。他们运用华丽的词藻，善辩的口才，像在哲学的马戏中表演空中飞人的演员一样迷住了观众。事实上，他们似乎要花特别的心思将他们的语句背后的含义搞得晦涩。他们将蒙昧主义的艺术带到了一个前人从未达到的新水平，就连黑格尔也望尘莫及。但这意味着什么？一场显然由有知识受过教育的人领导的哲学运动怎么会受惑于一些故意把人们搞糊涂的人，任由他们折腾？会不会是他们不能正确的写出或是不能理解沟通的基本艺术？事实不会如此，或者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要问这是如何成为一种可以接受的被期望的研究哲学的形式，尤其是在一个作为启蒙运动的发祥地并以它的唯理性而自豪的国度？这一统治法国知识分子舞台近四十年之久的运动，其代表者被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解构主义者。他们沿袭了他们先辈的诠释学，即解释说明的艺术。

p65

诠释学是由希腊人提出的，他们的教育大多基于对诗歌和戏剧的研究；它后来成为了贯穿整个基督纪元的一门神学辅助学科，因为神学太依赖于对经文手稿的解释。随着理性主义运动的出现，施莱艾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谢林（Schelling）试图将解释的过程纳入到新哲学当中，而狄尔泰（Dilthey）则给予诠释学在理性的世界观里一个永恒的位置。所有形式的交流，例如书面陈述、口头交流，甚至是手势和动作都被看作是将被加以解释的文本。如任何一个精神分析的从业者所知，一个病人传达出的信息必须被诠释以发现在其神经症症状之后隐藏的含义。因此，一个主观的、通常是无意识的

现实会被意识到并得到理解。

各种形式的解释都解释了一些事情。即使无法达到最终的无可争议的解释，我们也要寻找更好的解释以更加接近我们所探寻的事实。我们不会跨进通往犬儒主义的门槛。解构主义跨进去了。

当没有什么可相信的时候，当原以为必然和真实的事情被证明是错觉时，我们可以分析——仔细推敲——我们使用的词语，也可以有意地胡说八道来嘲弄它们，就像小孩模仿大人嘲弄的态度说“呸，真烂”，并没有任何意义。

p66 这种语言的混乱，挫败了人们到达天堂并发现其真相的努力，又再次在我们的时代上演；但是我们所使用的语言的内在混乱和矛盾阻碍着我们到达天堂或是任何真理的确定性。当盎格鲁—撒克逊人谨小慎微地研究词语、句法和语法时，法国人以他们老于世故的态度，宫廷小丑式的文雅的嘲讽来奚落我们的文化宣言，并采用一种没有意义的语言来证实他们的观点。但问题是，这种嘲弄已经变得专业化了；这些小丑们居然相信了他们自己的嘲弄，忘记笑了——他们希望得到严肃的对待。

这一运动的主要代言人是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露丝·伊丽格瑞（Luce Irigaray）、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吉尔斯·德勒兹（Gilles Deleuze）以及费利克斯·瓜塔瑞（Félix Guattari）。他们的著作被美国的艾伦·索卡尔（Alan Sokal）和比利时的吉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这两位物理学教授在《知识的骗局》一书中揭露为毫无意义、混乱并空洞无物。

或许最能代表由索卡尔和布里克蒙所引用的没有内涵的空话的例证之一，便是下面这篇发表于1984年和1991年的保罗·维瑞利奥（Paul Virilio）的文本：

“当时间的深度代替了可感觉的空间深度；当界面的互换代替了表面的定界；当透明度重建了外观时；我们开始惊讶是否我们坚持称之为空间的实际上不是光，而是一种接近初始的、超光学的光，太阳光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段或是反射。这个光出现在测量它的瞬间，曝光的不仅是历史和按时间发生顺序排列的事件。时间的这一瞬间是“曝光时间”，但它不是曝光过度就是曝光不足。照相和电影技术已经预示了它的存在，连续的时间剥去了所有物理维度，在这个连续统中能量活动的量子 and 电影观察的斑点突然成为一个消失的形态学现实的最后的遗迹。迁移到一个相对的永恒的现在，而这一相对性的拓扑学和目的论的厚度和深度属于这个最终的测量工具，这个光速有一个方向，是其大小和维度，它在所有的放射方向匀速传播，测量宇宙。

p67

其他法国哲学家的作品也好不到哪里去，雅克·拉康也不例外。

他们决心给公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一个印象，他们操纵短语和句子，而任何周密的研究都能证明这些短语和句子毫无意义。这个语言塔里的很多人用深奥的术语和断章取义看到的新词把读者搞糊涂，假装在运用科学术语，其实他们自己显然不懂这些词，也不期望读者能懂。因此他们觉得可以任意发明科学概念糊弄非科学家的读者，甚至无需最起码的证明和解释，对真正科学家的轻蔑的批评，他们置若罔闻。

最好的例子是雅克·拉康发明了数学公式以“提高”精神分析理论。除了他通常冗繁而难解的语言，为了使读者相信他的理论有“科学证据”，他还将数学应用于精神分析，这可能是最不能令人容忍的做法。

拉康喜欢在著作中使用数学，早在1950年他的著作

中就充满了图表、公式和“运算法则”。在1959年的一个研讨会上，他说：

如果你们都允许我使用我的一个公式，人类生活应该定义为微积分，0是失去理性。这个公式只是一个比喻，一个数学隐喻。当我说“失去理性”，我指的并不是某个深不可测的情绪状态，而是一个虚数。 -1 的平方根与我们的直觉支配的任何事情，任何真实的事情都无关，可是，在术语的数学意义上，它必须与其全部函数一起保存。[拉康：“《哈姆雷特》中的愿望及其解释”（*Desir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desire in Hamlet*），P28-29，1959年研讨会]

一年以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虚数的精神分析作用：

p68

我想先从 $S(\emptyset)$ 说起，首先 S 作为一个符号。

同样由于这些符号，正是这个原因，这个符号只能是一条从圆周画出的线[特质]，不能计算其中的一部分。它可以用符号来表现，即这套符号中的 (-1) 。

同样，它是难以表达的，但是它的运算是不难表达的，因为它产生的名词是可说出的。它的陈述等于它的以符号表达的意义。

因此，通过计算以符号表达的意义，根据以下公式：

$$\frac{S(\text{signifier})}{s(\text{signified})} = s(\text{the statement})$$

其中 $S = (-1)$ ，得出： $s = \sqrt{-1}$ 。

（拉康1977b，P316-317，1960年研讨会）

索卡尔和布里克蒙评论道：

这里拉康只能拉读者的后腿。即使他的“代数”有意义，算式中的“signifier”（符号）、“signified”（用符号表达的事物）和“statement”（陈述）显然不是数字，

而且他的横线（任意选择的一个符号）并不表示两个数字相除。因此，他的“计算”纯粹是幻想。然而，两页之后，拉康又回到了这个题目：

无疑，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 - Strauss）在他论莫斯（Mauss）的注释中希望承认 0 符号的效应。但在我看来我们所涉及的不如说是缺乏 0 符号。这就是我之所以冒着不名誉的风险指出，我将数学运算法则歪曲到什么程度：符号 $\sqrt{-1}$ ，在综合数字论中仍然被记作“*i*”，仅仅是因为在其后的使用中从不要求自动化，而被认为是正确的。

.....

因此，竖起的器官象征享乐的部位，不在它本身，甚至也不在想像中，而是在于缺少渴望的想像：这就是为什么它等于上面导出的表达式 $\sqrt{-1}$ ，通过陈述系数 [缺乏符号 (-1) 的函数] 而恢复享乐。

（拉康 1977b, P318 - 320）

p69

通过运用荒谬的术语，他引起了他的听众和读者们强烈的困惑，强迫他们认为自己无知，因此拉康必定比他们知道的多；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能区分现实和幻想，显然更不能识别理智的界限。在他比较后期的研究中，他宣称语言是“表达无意识的工具”而且“只有在语言的层面这个问题才存在。语言是为我们所知的唯一的交流；除了谈话之外没有潜意识”。

拉康所说的许多含混的东西与他所提出的一些理论相矛盾，但是拉康这位“精神分析学家和弗洛伊德学派的创始人”，并不知道潜意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受控于婴幼儿早期前语言阶段，而且会持续影响个体；早在我们不能说话，不能用词汇表达之前，我们生命中最早期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冲突就会对性格以及神经症和精神症的征兆产生显著影响。人对

语言的掌握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逐渐习得的。如每个人所知，当然精神分析学家也知道，词汇经常被用来掩盖我们的真实所想，它们既是表达的工具，又是用来压抑那些扰乱我们自我防御的情感和想法的工具。

p70 不仅在法国，在盎格鲁-撒克逊的国家里，对语义学的专注也被看作是最新的时尚，是在磨亮精神分析的军械库中的装备，并成为任何自认为是现代的分析家的义务。然而，这些语言分析家们在为发现了用于澄清隐藏在患者的话语和叙述之后的意义的恰当工具而洋洋得意之时，却陷入了他们自己话语的圈套，把它们降格成了冗词赘语。研究话语含义的研究者们变得使用话语而不顾意义。他们并未提高我们对人类精神的了解，也没有改善治疗方法。他们所作的只不过是注意力从潜意识过程转移到了对语言行为的研究，转移到了对患者在他的心理咨询时间内所说的话语的调查。但是，患者的话语和“叙述”并不能充分表达他的心理过程。毕竟，我们所说出话语，尤其在我们的抑制力所强加的焦虑和精神冲突的压力之下，只能揭示出我们很小一部分的心理体验；而通过把这些话语看作是对心理过程的完整表述，语言分析家们忽略了我们心理过程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语言分析统治了哲学太长时间，终于走向了死胡同，而它实际上破坏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那些追随了语言分析的时尚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对精神分析所做的同样的事情是很危险的。

保罗·里克尔（Paul Ricoeur）宣称：

“今天，我们在从事一项综合的语言哲学的研究，借以说明人类符号动作的多种功能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拥有我们可以任意使用的符号逻辑学、注释科学、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也许这是第一次，我们能够将人类会谈的统一问题整合为单一的问题。上述学科的进步

既揭示并加强了对那些会谈的肢解。今天，人类语言的统一成了一个问題。”

里克尔作为一个“提出人类心理反映在语言上的综合哲学”的人而被冠以“整体语言哲学家”的称号。一个神秘化的实例，却自我标榜为精确！

但是没有人能胜过拉康，无论是在对弗洛伊德思想的篡改上还是在对话言有意的愚民政策上。我禁不住要诘问他一篇名为《一封情书》(A Love Letter)的演讲中节选的一段话，在此他试图解释他的“符号”和“符号所指的事物”的概念，他的长篇大论都是折磨人的辩论，就为了说明：“我所从事的是弗洛伊德特意搁置一旁的，即女人要什么？弗洛伊德认为除了男性之外没有力比多。什么意思？整个人类除了男性之外是什么，是很难忽略的另一半，却由此被忽视了。”（这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但凡读过弗洛伊德的书就不能做出这样的论断）他继续道：

p71

“女人涉及那一半的符号，至于那一半，只能一直维持那一半。这里我只能假设你会回想起我关于没有另一半的那一半的论述。如果所有的事物都能用符号清楚地表示，那么这个那一半就是在其最基本的基础上彻底的那一半。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将那一半 (Other) 的 O 上画一条线，记作 S (Ø)。

我们如何设想与说话的这一半有关系那一半（从生物学上说大约是人口的一半）。这就是写在黑板上的从 The 出发的箭头。这个 The 是不能说的，对于女人什么都不能说。女人涉及 S (Ø)，这意味着她已经被加倍了，也不全是，因为另一方面她也可能涉及 Φ。

Φ 是我指定的阴茎的符号，这个符号在男人中得到阴茎享乐的支持。那是什么？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实践中

手淫的重要性被充分强调，是白痴的享乐。”

[雅克·拉康和弗洛伊德学派：《女性的性行为》(*Feminine Sexuality*)，P151-152，麦克米兰 (Macmillan)，1985 年]

朱丽亚·克里斯蒂娃被广泛地公认为语言分析的诠释者，运用哥德尔的数学理论，成为弗洛伊德理论的拉康派分析的支持者，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她在《诗歌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1974] 一书中写道：

马克思的一个发现，迄今为止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可以在此简述一下。如果每个个体或每个社会组织代表了一个集合，那么作为所有集合的集合——国家是不存在的。国家作为所有集合的集合是一个虚构，不可能存在，就像在集合论中不存在所有集合的集合一样……国家至多是一个所有有限集合的聚集。然而，为了这个聚集的存在，也是为有限集合的存在，必须要有某种无限：这两个命题是相同的。形成所有有限集合的集合的愿望将无限推上了舞台，它们相辅相成。马克思注意到了国家要成为所有集合的集合这一幻想，他在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提出的社会单位中看到的聚集不过是为它自己建立了一个集合（正如有限循序的聚集是一个集合），这个政体缺乏某些东西：的确，它的存在，或许你也可以说它的权力，依赖于其他集合都不包含的无限的存在。（克里斯蒂娃 1974 年，P379 - 380）

p72

但是，克里斯蒂娃的数学的学识没有局限在集合论上。在她的名为“论语言学的被试”（*On the subject in linguistics*）的文章中，她将数学分析和拓扑学应用到精神分析上：

镜像阶段之后，在句法运演时，被试已经肯定了自己

的独特性，它停止了在符号化过程中朝向“无穷大”飞行。我们可以想想这个例子：一个普通空间 R^3 的集合 C_0 ，这里任何连续函数 F 都涉及 R^3 ，所有整数 $n > 0$ ，点 X 的集合 $F(X)$ 不得超过 n ，当变量 X 退向“其他场景”时， C_0 的函数趋于 0。在这些修辞学上的惯用语句中，位于 C_0 中的被试达不到拉康所说的“中央外部语言”，他迷失了作为被试的自己，这个情境将转化相关的群体，拓扑学称之为环。

（克里斯蒂娃，1977 年，P313，斜体部分原文是斜体）

索卡尔和布里克蒙评论道：

“这是克里斯蒂娃试图用显然她都不理解的华丽词藻吸引读者的最好例证之一。这里所给出的函数集合 $C_0 (R^3)$ 的定义甚至没有正确地抄录下来，这个错误对任何一个懂得这个学科的人来说太明显了。但是真正的问题是她所声称的在精神分析学上的应用是一派胡言。一个“被试”怎么能处于 C_0 ？[艾伦·索卡尔和吉恩·布里克蒙：《知识的骗局》（*Intellectual Impostures*），P45 - 46]

艾伦·索卡尔和吉恩·布里克蒙强调（P9 - 10），这种半公式化的理论如果用在物理学、生物学或社会科学上，简单地把它包裹在符号或公式中于事无补。

p73

社会学家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Stanislav Andreski）曾经用他惯常的嘲弄口气表达过这种思想：

“这种路数的著述，其秘方像其获得赞赏一样简单：找一本数学课本，抄袭其中不太复杂的段落，将一些参考资料加到有关社会研究一两个分支的著述中，无须多余担心你写下的公式与真实的人类行为是否有任何关系，然后给你的作品起一个好听的题目，

暗示你已经找到了一个确实的集体行为科学的解决方法。[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作为魔术的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as Sorcery*），1972年，P129 - 130]

安德列斯基的批评最初是针对美国的定量社会学的，但同样适用于此处引用的一些文本，尤其是出自拉康和克里斯蒂娃的。

值得注意的是，解构主义者们似乎从不提及坚持某些观点、表现出某种确定个性、发展其自己思想的作家，而是通过一味地提及文本而将作者去个性化。作者之死是一个便利的办法用以对付可能遇到的有意义的交流；也不用区分什么是实质性的，什么是不那么重要的；所有的目的都为了暗中破坏一个文本中可能包含的中心思想。解构主义者破坏意义的另一个杀手锏便是经常重复这一教条：所有的文本都存在自相矛盾，因而文本自行解构。因此，安德森写道：“在批评性的文本中已经进行了论述，而文本里表现其与众不同的文字游戏（旨在对可理解的实质的知识和意义进行解构）独立地放在论述之前或之后。”[丹尼·安德森（Danny Anderson）：“解构：批评的策略，战略上的批评”（*Deconstruction: Critical Strategy, Strategic Criticism*），《当代文学理论》（*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麦克米兰，1989年，P150]

里克曼（Rickman）教授在他的《从诠释学到解构》（*From Hermeneutics to Deconstruction*）[《新分析》（*New Analysis*），精神分析社会研究期刊，1998年春季]一文中指出，解构——远不只是一种更严格和批判的分析方法——它旨在破坏追求知识和意义的信心。他还引用古德哈特的话：“对解构的认知兴趣引导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不能知道。”[尤金·古德哈特（Eugene Goodheart）：《怀疑论倾向》（*The Sceptical*

p74

Disposition)，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P127]对理智的绝望反映了害怕在我们的时代碰到人类的非理性。对既定程序的拒绝，可以从新一代对前辈学者的蔑视中看出。或许身处安稳的教室和从事著述的知识分子们需要一种置身反抗资产阶级社会自满的革命的先锋感，他们想要展示勇气和反叛。

有意思的是，解构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不再谈论作品，而只谈及不带有内在含义、内聚性或主旨的文本、词汇；我们无从知道作者的头脑里有什么，或他的意图是什么，以及什么促使他记录下他的想法。他说作者想些什么看起来无关紧要，他消失在了文本之后，只有通过读者的投射和诠释才能让他活跃起来。如果作者是一位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诗人或小说家，那么对他作品的解释便比作者的想法和意见重要得多。在词汇的背后没有统一的精神，或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没有超越我们所用词汇的更高的含义”。

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 在他的《作者之死》(*The Death of the Author*) 一书中写道：“发言的是语言，而非作者。我们知道既然一个文本不是释放神学或哲学意义的一条词汇线，那它便是一个多维的空间，此中的多种作品，而非其中的一个原作，在相互融合和碰撞。” [罗兰·巴尔特，凯瑟琳·贝尔西 (Catherine Belsey) 在《理论的明天》(*The Future of Theory*) 一书中引用，Harvester 出版社，1987年，P145] 通过否定作者、否定上帝的子民或理性之人，新哲学家们向知性的超我宣战了；他们宣布我们文化世系的父亲们没有对我说过一点有用的或独创的东西，这样他们便成为知性之父的谋杀者。然而很有趣的是，这使得儿子们从理性束缚中解放出来，容许他们胡说八道，鼓励语无伦次和莫名其妙的语言成为一种美德。他们发明出陌生和毫无意义的词汇。

“从前”，父亲们或掌权者们常常说：“仔细听，然后照我说的做。”以教条的方式表达并以法律的形式强化，这便是神

学或世俗形而上学的方法。启蒙运动反叛的知识分子声明：“仔细听那些权威者们所说，运用你自己的推理去判断，按照你的理智告诉你的去做，与你的理性的兄弟伙伴们协作。”然而，理性的兄弟伙伴们辜负了理性，他们也变得教条和独裁，未能实现他们要将世界建设成为美好家园的承诺；一个旨在消灭理性的背叛者的新的起义爆发了。但是由于没有持一种新的令人信服的理性观点作为行动的指导，他们所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攻击理性本身并否认它确实存在。

有一种与知性的父亲形象的分庭抗礼，是执迷于打败他们凌驾于我们之上的权力。如德里达所述：“两个中的一个统治另一个。解构对方是为了在特定的时间颠覆等级关系。”[雅克·德里达，《地位》(Positions) 1972年，Athlone出版社，1981年]又如罗伊·博伊恩(Roy Boyne)写道：“解构意味着颠倒两级，将特权阶层调到迄今仍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对立面去。”[傅科和德里达(Foucault and Derrida)：《理性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Reason)，Unwin and Hyman，1990年，P125]人们怀疑，在他们令人困扰的抽象中，他们是否还留意他们的革命意图。当他们谈到两级分化、分散、中心和边缘的逆转以及其他蒙昧主义的术语时，他们指的真的是男/女、黑/白、劳/资、有法/无法、攻击者/牺牲者的对立，或是传统至高权威的逆转吗？他们试图响应尼采的要求对所有的价值重新评估的呼吁，其努力最终换来的不过是困惑，直到我们不知如何分辨好坏、真假和对错。

我们往往会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按照我们自己的兴趣所在以及我们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来解释话语，这是个很自然的常识。如果你是一名纳粹分子，你就能理解上等民族、鲜血与国土、意志的力量以及犹太人阴谋毒害日耳曼民族纯洁的血统这类的话语。而对一个非纳粹或反纳粹者来说，这些不仅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的口号，而且还会理解为一个企图获得全世界领导

地位的妄想狂的白日梦。从这个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别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文本中的词语单靠它们本身不是完全没有意义，读者或听者的解释使得它们意义深长；然而，是发言者或作者所持的意图和思想赋予了他们的词语以含义。将词语所蕴含的假说、世界观和形而上学纳入一种批评的分析，这永远是智力的任务和它的推理实践，哲学的传统目标就是搞清楚为什么我们要说事情，什么促使我们说出来，而不单单是我们如何说出来。根据纳粹分子、种族主义者或是资本主义者的口号，弄清他们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意图和目标是什么，这是理性的任务，即研究我们持有的或认可的认知错误。

解构主义者借此削弱了我们的高级心理能力。解构主义的从业者证实了，他们的作家记录了他们能解构我们作为理性存在的自信。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指出“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我们看他们的著作就像看一出冗长而没有实在意义的免费演出。” [M. H. 艾布拉姆斯：《现代批评与理论》（*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朗曼出版社，1988] 如果文本、声明和口号没有明确地表达出作者的意图和观点，我们无法从中看到一个人的想法，那么它们就如同一个语词掩盖下的空洞。即使我们是语言分析家或我们可以随意以我们感觉满意的方式解释它们，我们能够试图通过分析句法和语言关系从中挤压出任何含义，我们却无法运用我们的理性才能使它们能够被理解——我们的理性和伦理判断变得多余了。不仅是作者的思想、推理和价值观无关紧要，就连我们自己在书面或口头语词面前也不再重要了。一种信仰或偏见会被轻易地认为同任何其他的一样好，没有我们可以用来检验其价值的理性准则。前面我所提到的时下盛行的犬儒主义，在新哲学家们的讨论中得到助长和辩护。

p77

如果作者的理性和伦理价值观从观点中消失，并被认为无关紧要，那么我们的高级心理能力将会由于缺少锻炼而萎缩；

我们从而会退化到较为原始的认知水平，我们的心理也将屈服于非理性的冲动、偏见、未经验证的传统，以及某些前意识的情结。没有我们可以用来评估它们的理性准则。我们所残留的理性才能将会被用作推行和证实任何我们所持的信念和我们所追求的行为的工具，以证明它们是正确的。

第三章 意识和道德的物质基础

1. 本能的真空

我们已经看到了原始攻击性、无情的独断专行和利欲的驱力突破了防线，这时，按精神分析学的说法，自我丧失了对超我的信任，反叛超我的命令，投奔了本我并屈从于它的鼓动。

在广泛的人类社会行为领域，我们目睹了决意要羞辱、折磨甚至屠杀不属于同一部落、种族或宗教的人们极端的集体施虐，以至于要达到灭绝的程度；在另一个极端，坚信所有的人、宗教和文化是平等的，宣称宗教和社会的霸权必须被摈弃。这叫作道德或文化的相对主义，最近叫作政治上的正确性，它已经开始支配西方民主政治的很多领域。因自由和自我表现之名，我们不得歧视不同的价值观，甚至不同的知识概念，因此，一个真理被认为和别的一样好，而且确信一个想法或形而上学概念的真理是一种亵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后现代或解构主义哲学家们的声明中看到了，他们对词语苛刻的分析简直就是一种对理性的折磨。他们已经成功地扰乱和吓倒了我们的理性才能。

迄今算来已经是好多年前了，我本人在对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讲关于康德哲学和他的普遍道德规则概念时，曾领教过这种“民主的”反应。当时听众中的一些人表现出很不情愿接受任何人有权告诉他们该如何思考；而且困惑于我怎么会支持一位

德国哲学家的思想，将普遍的是非概念强加给热爱自由的人们。同时，还有一些听众想要我简明扼要地以务实和现实的态度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而不是沉迷于这种与他们的思考方式截然不同的理论的哲学探讨。这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责任感的人们维护着个体选择他们自己价值观的权力，而且做出判断时不会受到某些更高权威的影响，他们对康德哲学的这种反应显得特别的尖刻，因为康德毫无疑问是启蒙运动中最有造诣的代表人物。在他的《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1784〕一文中，康德写道：

“启蒙运动把人类从自我强加的监护状态下解放出来，摆脱了没有外界指导的情况下无法运用其智慧的状态。如果这种监护状态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缺乏智慧，而是因为缺乏勇气和决心，在没有领导帮助的情况下不敢发挥其自身智慧导致的，那么我称之为自我强加的。大胆运用你自身的智慧吧！这是启蒙运动战斗的呐喊！”

但是，对不依赖于某个较高权威的命令或指导而自由运用人自己的理解力的诉求，暗示着人天生具有理解力，这适用于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两方面。在康德的主要著作《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书中，他分析了理性思维的潜能及其限性，他提出理解力先天或先验的形式是所有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所有认知过程的基础。在他专门阐述道德的书中，他详细说明了某些先验或绝对命令，这些命令对一切有感知能力的存在（即所有人类）来说是适用的。他仔细地阐明了人类的理性，以及人们实践它的自由，它是一种使人类区别于其他所有动物的能力，而其他动物的判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能（用我们现代的话讲，就是遗传编码）。康德宣称，人类的目标是主宰自己的命运，超越动物的局限性，并依靠他独

有的自由能力按照他理性的指示实践他的意志：“一个生物理性是一种能力，它扩展了生物运用其力量的规则和目标，使之远远超越了自然本能；它对它的计划的理解是没有止境的。”

然而，如他在《普遍历史观念》[(*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1784] 一文中所写：“经过努力，人们既不是像动物那样简单地从本能出发，也不是从理性的计划出发，当我们看到，除了一部分有识之士，人们在世界历史大舞台上的行为受到愚蠢幼稚的虚荣心，甚至是幼稚的阴谋和破坏的支配，我们不可避免地感到愤慨。”这无疑敲响了我们这个时代的警钟，人们很容易认识到我们的危机。毋庸置疑，康德的理论意义深刻且令人信服，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一个理论想要获得真正的价值（在我们能够确认它的真实性之前），它必须要通过经验证据的检验。然而为了给意识和各种理性思维——这个人类所有的素质中最非物质的部分——提供经验的、事实的证据，我们必须为它们找到物质-生理的证据并探索是什么使它们成为可能。

我将要在本书的后面部分详细阐明道德的基本哲学原理。但首先我们必须问一问我们能否发现科学证据，证明人类心理拥有通过理性的思考来决定其行为和信仰的自由，理性本身是否有能力指导人们的行为。如果我们看看人类历史上以及个体生命中的那些无数的表明理性不能指导一个人或一个国家的行为的例子，就不奇怪为何以下说法会有市场：即认为人类的天性（如他们所言，实然）缺乏改变其基本性质的自由。因此，如果相信人性并非受控于本能遗传的决定性因素，相信人与动物不同，这只不过是满足人们虚荣心的一个幻想。

认知的物质概念衍生出一个信条，即否认人类有任何形式的思维和知识是与动物的心理不同的，是能超越生理和遗传条件作用的，这为行为主义提供了哲学的基础和证据。行为主义

不仅成为了研究方法，更主要的是成为了物理和机械论心理学的一个代名词。行为主义者的先驱卡尔·拉什利（K. S. Lashley）在他1923年发表的声明中，提出了他基本信念的基础：“对我来说，行为主义的精髓就是，相信对人的研究，除了能以机械和化学的概念来识别的东西之外，什么都不需要。”这一声明不断被引用，并成为社会学、精神病学以及心理学这些认为自己属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基础。

创建一门人类行为的科学可以使之在自然科学中占据一席之地，说明人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这一理想使得其信奉者以还原论的方法解释人的思维过程，也就是说以物理、化学和遗传因果关系的方法来解释心理过程。但是，如果科学不研究人性的特殊和主要的特征，不研究人如何实践其理性才能，如何修改其遗传天赋，那么就不是丰富了科学，而是削弱了科学。

机械论和还原论的科学观念遭到了俄国生物学家 A. I. 奥帕林（A. I. Oparin）的强烈抨击，他坚持认为在自然界中有一个从物质现象到精神现象的质变。在题为《从自然到精神现象的质变》（*The Qualitative Change from Natural to Mental Phenomena*）一书中，他写道：“它迫使科学对人性独特和主要的特征一无所知，从而使得科学不但不能胜任它的任务，而且成了不好的科学。”

毫无疑问，人是一个生物有机体，也同样是进化的产物。他既是物理的又是心理的有机体，他被赋予了思想和智力；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的脑与他的思维、意识以及潜意识过程有着相互关联。所有我们的感觉、知觉，我们的思维和观念都以我们的脑为基础，没有脑，我们就无法进行我们的心理活动。因此，显而易见，在器官和精神之间，在人的本性的这两个维度之间确实存在着必然的相互作用。用史蒂文·罗斯（Steven Rose）的话说：“我们所需要的是认识人类状态交互作用的本质，也就是人类大脑状态交互作用的本质。” [史蒂文·罗斯：

p82

《有意识的大脑》(The Conscious Brain), Pelican 出版社, 1978 年]。罗斯赞同奥帕林的观点, 认为随着意识的出现, 进化上一个质的飞跃发生了, 致使人类和其他物种之间有了关键性的区别: “意识的出现改变了人类存在方式的质量。这一变化也表现在人脑的结构和功能上。”在动物王国的进化中, 我们能够观察到脑皮层活动的逐渐加强以及额区的扩展; 在人类的进化中, 前额尤其是额叶以匪夷所思的加速度扩大, 为人类心理的特殊性质提供了生理基础, 减少了人对本能的依赖, 使得人类从所有其他的动物种类中分离出来。

我们可以说, 伴随着人的进化过程, 前额叶的出现提供了神经学上的资质, 以服务于人对远见、预期以及一个宽泛的选择范围的需要, 这些都是人进化中决定性的优势, 并使人的生存成为可能。通过意识到他自己的需求, 以及他的环境条件和周围的危险, 也就是说, 不仅是对事物存在的方式和他想要它们成为什么样, 而且对他的行为以及行为可能导致的结果, 都有一个内部的表征或想像, 人学会了在各种可能的应付现实的方式中做出选择。动物需要许多代才能发生新的生物变异, 以适应新的环境, 而人只需要几分钟考虑, 或者甚至几秒钟就能识别出不能预料的危险或优势并据此行动。我们将看到, 这还需要大脑高级区域具备连接意识和想法, 以影响大脑的较旧区域的能力, 它的化学和遗传因素决定了本能, 并多少转变了它们的生物生理上的功能。人从本能反应的局限中获得的自由显著增加, 使得他对环境条件的各方面都能适应。

p83

但是随着人的新脑使人获得新的自由, 新的问题也产生了: 他处于本能的真空, 他的反应不再具有本能反应的确定性。人类再也不能十分确定他的判断正确与否, 他不再感到自己的行为无疑是必需, 这是其他动物所拥有的, 而人被迫去思考, 为他的判断和行为提供他自己的理由。然而, 为了按他自己的评价感觉他的行为确实正确和正当, 他还需要获得同伴的确认和

赞同；他需要集体共享的记忆和价值观，而这些超越了本能反应。换句话说，他需要一种文化的保障，以在他获得自由却失去本能时，替代他本能的保障。没有一个个体或社会是没有文化的，即使如我们先前所见，它只意味着一种反文化的文化。

然而，脑毕竟是一个身体器官，它的一部分却可以成为我们高级精神和心理过程的来源，并进一步为我们提供了超越和调节本能的自由，这一看似矛盾的论点成为许多困扰科学家和哲学家的难题的源头，并被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称为“惊人的假说”[《惊人的假说》（*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令他一直感到惊讶的是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有着一个生物的基础，他觉得他必须向不轻信他的人证实他的理论，这些人显然相信笛卡尔的二元论，这一理论暗示了精神和物质是两个独立的存在，一个是内部现实，一个是外部现实。外部现实可以被看到，可以说，在外界，所有的物质、物理现象都是由我们的感官所传输的对象；而内部现实则是我们内部体验的我们自己的思想、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的希望以及我们的焦虑。但是，如果我们采纳进化的观点，我们必须认识到，要生存的愿望，要生活的愿望，这是所有有机系统的愿望，并用一种对我们的生存和安康有利的方式对环境做出反应。内部的、主观的世界才是生物本身变化的动因。发生在我们人类的脑和身体中的巨大变化，将人类从所有其他动物中分离出来，在这个星球上，这可能是生物进化中最令人称奇的事件了。令人称奇的不仅是使人类在所有的生物有机体中占统治地位的基因编码，还有对可能发生事件的内部表征的能力和预测将来，预知我们行为结果的能力。

2. 脑的结构和功能

人脑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复杂器官，用来接收、传达和

储存信息，向身体各个内部和外部官能发布指令，对刺激进行接收和解释，用来形成世界的意义和个人与之关系的抽象概念。

脑可能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结构了。每个人脑都包含了几千亿个神经细胞（神经元），它们之间通过几万倍于它们数量的连接点，或叫神经突触相互连接。这个非凡的器官，在从怀孕到出生的九个月间，如果以一个平均的增长率发育（当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这将意味着，在整个妊娠期内，每秒都有大约四千个神经细胞形成。如果这看起来已经很戏剧化了，那么在我们生命中的最初几年，每秒钟每平方厘米的大脑表层有大约三万个新的神经突触生成，这一事实更值得留意！

“这一巨大的阵列秩序井然地发展着，完成大脑布线，履行个体发生过程中丰富的功能——也就是说，发展被理解为基因与环境之间的一种精妙的、不间断的相互作用的产物。因为大脑必须要履行日常功能，比如，分析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图像，并以尽可能不出错的方式传送到脑的视觉区域，同时还能够修改操作使其成为一个经验的结果，这一细胞及其相互作用的产物可以被最贴切地比拟为特异性与可塑性之间的对话。一方面，我们有着相对难以修改的连接，使感觉数据得以解码，运动行为得以执行，甚至多种功能是我们通常意识不到的，例如直立、呼吸、睡眠和觉醒。另一方面，细胞连接中的微妙变化，形成了大脑中学习和记忆的特征，使得我们能够修正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使之成为一个经验的结果。” [史蒂文·罗斯：“脑，心理和世界” (Brains, Minds and the World), 摘自《从脑到意识》 (From Brains to Consciousness) —— “心理新科学评论” (Essays on the New Sciences of the Mind) 中的评论, 史蒂文·罗斯编辑, 企鹅出版社, 1999)

p85

在我们的研究中给予特别关注的大脑皮层，目前为止是人脑中最大的一个部分，根据最近的估算，在这个大约有一个男

人的手帕大小的二十五万平方毫米的面积内聚集了三百亿到五个神经元（神经细胞）。因此它必须大面积的折叠，以适应颅骨的形状。皮层的厚薄不一，但总体上在二到五毫米之间。

皮层的每平方毫米有几十万个神经元，它们之间都是彼此相互连接的。这些连接中的大多数都是相邻的，仅仅延伸几十分之一毫米，但有些连接则比较长，并穿越一段距离进入到皮层的另一部分，或是到达脑的另一部分。据估算，有大约30%的连接由大的连接、轴突或树突以及神经束组成的，它们展示出了在脑的不同部位之间有多少连接。也是人脑活动的这种同步性，将它与所有的机械过程区分开来，例如计算机，无论多快，它都是以一种连续的方式运行。（或许同样值得考虑的是，在基本粒子世界获得成功的同步要素，基本粒子不但用连续的方式以光速运行而且同步交互作用，因此可以在同一时间内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大脑皮层由两个分离的半球组成，各自分布在头的两侧，由它的中线巧妙地划分成两半。无论用肉眼还是显微镜观察，每一半都非常接近另一半的镜像。从脑的垂直分界线，我们可以观察到不同的区域，这些区域把皮层分为几个主要中枢或叶。位于头前部的是额叶，它的主要功能关乎言语、学习、记忆、智力和意志的操作，以及计划和选择。我们将会对脑的这一部分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因为它表现了意识的物理维度，也就是所谓心理的高级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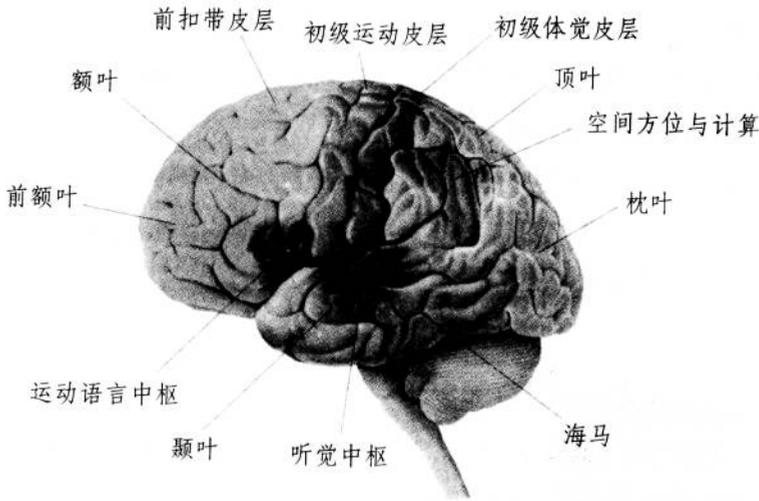
p86

在额叶后面占据脑的上半部分的，我们称之为顶叶，它包含中央区，负责感官输入和运动输出，尤其是触觉和身体感觉的协调和控制。在皮层的中部，额叶和顶叶之间，从脑顶部垂直向下一直延伸至颞叶以下，是初级运动皮层；与它相邻的是初级躯体感觉皮层。后者是对触觉和躯体外周感觉进行分析和解释的中枢，将它的信息发送到位于它前方的控制随意运动反应的运动中枢，即，对肌肉的指令。有趣的是，这两个中枢连接了额叶与顶叶，并在它们之间相互作用，阐明同时发生在不

p87

同的皮层中枢之间的反馈，甚至越过它们到达脑的其他区域。

颞叶覆盖了皮层较低部分的区域，包含太阳穴部位，控制听觉并对声音进行解释。在脑后的下部，我们可以找到枕叶区，它控制视觉，并分析对光和颜色的知觉。它还对形态、图案以及空间方位的分析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它将视网膜的视觉刺激转变成图像，并将它们置于外部世界中，在那里，这些图像被认为是对现实的表征或感知。然而这些视觉图像能够被回馈到额叶，在此处，它们被“思维中枢”用来制造创造性的想像，而想像在概念化和抽象思维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视觉表象在我们的知识观念和艺术思想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两者又是相互影响的。



皮层的主叶以及主要运动区和初级感觉区的分布

我们所观察到的任何事物都有许多不同的特征，例如形状、颜色、运动和空间属性，经许多不同的视觉区处理，此外，被看到的物体也同样被听到、闻到或触摸到，这一事实证明了皮层不同部位间的相互作用。当我们听某人讲话时，不仅需要言语中枢把他发出的声音编译为语词，而且还要将他面部

表情、手势和肢体运动解释成对他试图要表达的东西的整体理解，这些又唤起我们的反应和判断，同情或排斥。

p88 然而，皮层的各个部分不仅相互作用产生对我们周围世界连贯的知觉，而且将它们解释为一个因果关系的连续体，一个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的统一，以及一个超越了此刻此地，延伸至一个世界的概念的空间的统一。脑皮层的这些综合过程不仅服务于认知功能，而且关系到我们的价值观，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如何解释认知过程以及我们对这个世界意义的看法。脑皮层不仅对我们之外的现实有视觉表征的能力，还能够综合内部成千上万种刺激、趋力和欲望（这些东西试图进入前脑和意识），并把那些本是杂乱无章的信息转变成一个连贯性的自我感觉。自我的任务是从大量需要以行为的方式进行动力释放的冲动中，选择和区分出哪些是可接受的，哪些不是；哪些提升了，哪些阻碍了自己的利益。由此，必须抑制那些对自我有害的或是不可接受的冲动。一个人对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不是没有打之的冲动，对他痛恨的人也不是没有要杀之的冲动，而是他不得不压抑这种冲动，并把它阻挡在运动区的入口以外，甚至是意识之外。

3. 古老的脑区

位于在大脑皮层以下，大部分由它所覆盖的，是中脑。脑的这个相当古老的部分代表了我们的本能、遗传编码反应、感觉、欲望以及原始冲动的物质基础。它是人类几百万年所获经验的遗传存储，我们未曾意识到它，却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可以说，每一个人脑都包含了我们物种从最初的起源到现在进化的所有阶段。我们进化的不同时期可以从中脑的不同部位和它们特殊的功能中看出来。通过研究脑，我们得以洞察我们生物祖先的神经学特征。

我们的前脑，尤其是脑皮层的前额叶是我们物种发展中最新获得的，是我们精神过程的器官的代表，而中脑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进化的中间步骤，是大脑皮层与脑的最古老区域的连接。最古老的脑区曾掌管着我们原始祖先和它们现存的代表，例如鱼和爬行动物的生活，而且主要负责我们的身体及身体反射的化学和生理学过程。但是，由于中脑在我们神经系统的最新和最旧的脑区建立了连接，即使这些功能也会通过中脑的调解而受到前额叶的影响。语言的许多方面，像语词的理解、声音的质量以及声音所激起的情感反应，都是通过胼胝体的大量神经纤维束提供的，胼胝体拥有大约五亿个独立的双向通行神经纤维。

p89

脑的两个半球看起来相互对称。但是，脑的左半球连接着身体右半边的功能，而右半脑连接着身体的左半边。因此，左边运动皮层的刺激会导致身体右半边的活动。我们大脑左半球的每一个功能，在另一半都有同样的功能，这种情况也有一些例外，许多脑功能只能由一边控制。言语功能尤其是这样。脑的言语中枢在一侧，通常在左半球，而另一半球，虽然在解剖学上是一样的，但其功能却不清楚。负责将信息从一个半球传递到另一个半球的主要介质是胼胝体，它使得身体的一侧有可能知道另一侧在干什么。

在中脑的顶部，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皮层下结构之一，丘脑，有时也被称作进入皮层的通道，因为进入皮层的主要输入以及皮层各个区域间的连接都必须通过它。例如，位于皮层后部的视觉中枢为了将信息编译成可视图像，必须与额区连接，而从视网膜的神经节接收来的信息通过丘脑时，不仅产生出整合的图像，而且还会刺激相关的情感含义。神经学者们通常认为，丘脑接收输入的刺激，把它们组合成不同的等级，然后传递到其他的皮层下中枢或大脑皮层。如此以来，由外周器官接收到的未经处理的刺激，就会变得精细复杂，并被呈送至

p90 中枢神经系统的最高等级，即脑皮层的额叶。



丘脑和其轴突的关键位置，以及它与大脑皮层的连接

我们对躯体、视觉和听觉在丘脑和皮层之间的连接了解的很多，但是关于味觉和嗅觉的连接就知之甚少。然而近年来，在这些中枢的重要功能及其对精神活动的重要性方面，人们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

p91 我想要提及一位精神病学家彼得·兰德尔（Peter Randal）的创新性研究，他对于理解味觉功能在个体发生和种系发生两方面的重要性走出了一条新路。他写道：“前额叶皮层的远古种系发生的起源，现在仍在现代的人脑中，是一条古老的皮层，在前额叶底部，额叶下面，眼窝的表面。这与以前的教学是相悖的，以前所持的观点是，前额叶不接收原始的感觉输入，现在已证明这一稳定的旧皮层接收和处理嗅觉和味觉，尤其是味觉的化学感觉。在前额系统个体发生的早期，例如哺乳期的婴儿，味道不仅仅像成人那样，是一个局限于嘴的简单的感官事件，只会产生偶然的面部反射反应，例如一个微笑（甜的）或是一次蹙眉（苦的）。不同的是，在母亲怀抱中的吮吸纳期间，婴儿的味觉系统能够对所有的身体生理系统产生极大的（有时是性命攸关的）影响。例如，呼吸障碍导致呼吸暂停，类休克心血管衰竭，营养极度失衡，骨骼运动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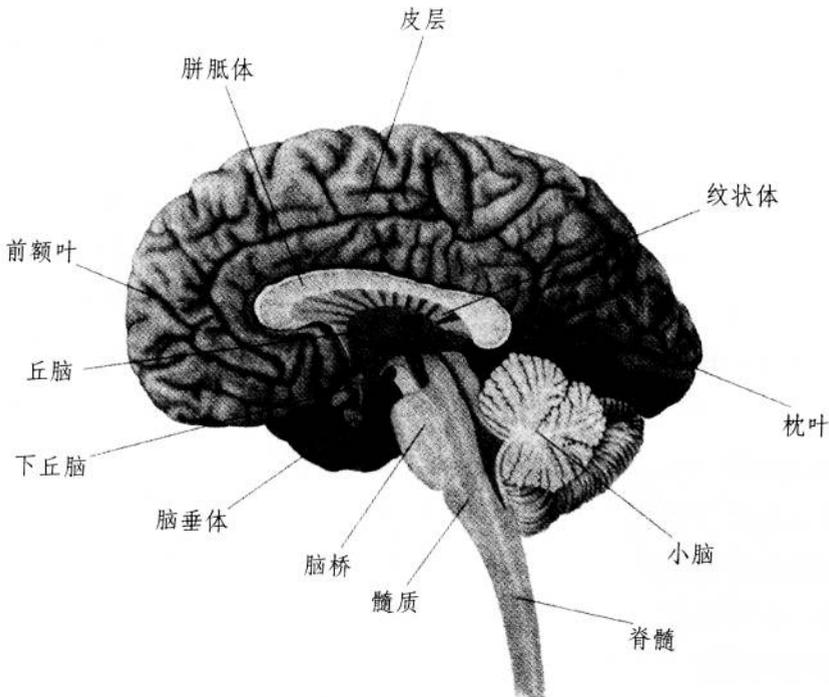
和激素功能失调。这些全面味觉反应继而产生一种同样由旧前额叶皮质编码的继发性自恋感觉的障碍，并引起继发运动反应，其感觉结果也是由这个边缘区域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断地接收和消散过程是情感的精神神经基础。这些原始的激发模式，可以通过参考味觉愉快/不快的皮层探测器诊断出来或被编码。事实上，在成年人脑中，所有的感官形式：触觉、听觉，特别是视觉，以及自恋的力比多感觉，都投射在眶回。为了以后回忆，任何与强烈的情绪有关的事件，在其投射到大脑的原始存储器——颞叶的海马区之前，都在这里被打上了标签。

“因此，最初的前额叶系统的‘编程’语言包含了一个带有深刻味觉性质的词表。这一系统的第一个目标便是制定标准，以判断什么是作为食物的可以被身体吸纳，什么是有毒或腐坏的必须摒弃。毕竟，在人脑中，这一原始的系统已经经历了一场独特的功能扩展和转变。在人的眼窝味觉旧皮层的前部和上部包围着最新进化和发展的新皮层，这是人类所独有的。这一皮层的神经技术的最高境界，一方面，受兴趣情感数据驱动；但另一方面，受到从后顶枕区向前投射的，经过高度加工的视觉数据驱动。它好像一个神经学的‘底片’，人可以借此将初步的情绪和感觉转变成内部表象。这种先验综合‘头脑中的图画’在婴儿古老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成年人的生活中提供了识别并权衡身心力比多需求的方式。站在现代生物精神病学的角度上，多数情况下，精神分裂症被看作是一种取决于遗传的病理性病例。例如，对精神病患者脑皮质激活模式的活体研究表明，‘病态前额叶活动抑制’（pathological hypofrontalism）意味着正常前额叶皮质的活动受到某种突触的过度抑制作用而大大的减少了。生物精神病学家解释说，这是脑的（化学）唤起系统的遗传故障导致的结果。而我认为某种严重的幼年创伤的本体论作用，导致这种长期存

在的皮质抑制模式。”

4. 下丘脑：激素与体内平衡

作为一个人什么时候成长、什么时候爱、什么时候打架、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死亡，这些活动，以及其他活动，都是由体内用以调节动态平衡的激素系统控制的。身体基本的新陈代谢水平由颈部的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控制；钙、磷以及部分尿液和排泄物的代谢则是由靠近甲状腺的副甲状腺控制。使身体进入准备逃跑或战斗的状态，主要是由肾上腺所分泌的肾上腺素造成的，它能够改变心跳和血液循环速度；性交的预备状态是由性激素、睾丸激素、孕激素，以及雌激素决定的。



人脑的一半，展示皮层下的区域

不管怎样，所有神经系统的这些激素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由脑的皮质和皮质下区域控制和调节，尽管通常都是在无意识

水平运行的。例如，呼吸便是由脑干中的延脑控制，这部分连接了皮层和它的额叶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得呼吸能够在有意识（随意）和无意识（反射）的两种控制之间迅速转换。

p93

激素分泌和脑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通过它们与脑垂体（脑垂体本身就是脑的一部分）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清晰地表现出来，它并非像原来臆想的那样，可以独立于脑，由遗传编码决定。需特别指出的是，发现脑垂体与下丘脑连接，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它的控制，这在人体基础的植物性功能和体内平衡功能的探索方面带来了新的光明。下丘脑是位于丘脑前部下方的几组相关的神经元的集合。它除了与脑垂体和脑干的某些区域连接之外，还与一些组织连接，这些组织叫作边缘系统。这一区域不仅与体内平衡有关，而且与情绪、与潜意识动机有着极为广泛的联系。我们会发现在与人类最为接近的物种中，由于在进化的过程中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它们的边缘区域所占比例相对于皮层来说减少了，而皮质系统的优势有利于对边缘控制进行更大的改造。

p94

自从发现下丘脑是一个内脏和边缘的中心区之后，除了上面描述的那些功能之外，大量独立的功能都归因于它。例如，血压升高、动脉收缩、瞳孔扩张、血糖和流动肾上腺素增加、支气管扩张、膀胱和子宫收缩、胃肠道蠕动性抑制、眼泪和唾液分泌以及体温的变化。皮质与植物性神经系统的连接，一直都是研究的热点课题，而且大量的证据表明植物性中枢就在包括前脑在内的中心皮层内。脑皮层对下丘脑的影响一方面停止了丘脑的功能，另一方面在适当的场合下刺激它们。如果不这样的话，无论什么样的刺激都引起反射，这些反射有可能是不恰当的或是对个体有害的。皮层的信息与下丘脑相关，并通过下丘脑到达脑的更原始的中枢，在一般情况下保证了对外界刺激的恰当反应。

这一发现使得我们能够理解，由新皮质发送到植物性系统

的解释是多么重要。这些解释可能是现实的，也就是说，符合外界的现实环境，但它们也可能是歪曲的，将错误的信息发送到植物性系统：焦虑状态，忧虑危险或是担心遭受迫害——无论假想的还是真实的——都会引发肌肉组织、消化和循环以及呼吸官能的收缩——当我们突然遭遇危险或感知到了危险的物体或处境时，我们会立刻僵住，大气也不敢出。通常随之而来的是一个补偿性的肾上腺大量分泌，产生愤怒、攻击和暴力冲动。我们可以说，这既可能发生在“正常”人对某些感知到的危险的反应上，也可能产生于神经症患者的强迫性幻想，精神病患者更是如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下，皮层，尤其是前脑的新皮层的这些错误表征，经由丘脑被传递到下丘脑，影响小脑、延脑和脑桥的反射。皮质和植物性系统之间对生命有益的交互作用会由此被阻挠，甚至会转而与它们自己为敌。如果人们集体共有这种错误的表征，将会发生种族的、国家的或是宗教上的歇斯底里。

p95

小脑位于头的后部、脑半球中心的枕叶下方。它的功能特别关乎对精细动作，亦即协调程度的控制，例如，它可以使得人们能够准确地伸手够到并拿起一件物体。可以说，它关系到技巧性动作的效能，它控制着一切有目的的细微肌肉活动，并确保这些活动符合于它们的目的，不会由于没有经验、缺乏信心、不安全感或某种抑制而导致动作太野蛮、太具侵略性或太柔和，离目标太远或太近。在一个人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中，在他靠近、拥抱、抚摸他所爱的或他想亲近的人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显著。一个人触摸他的朋友或爱人的方式可能过于攻击性、过分要求，也可能过于温和和踌躇。

我们可以说，延脑需要从皮质中接受特定的信息，因为它的任务就是向它们提供必要的反射。假设说，我们的注意指向一棵我们想要砍倒的树，但是如果我们考虑这棵树是否适合做我们想要的家具，工作的成本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投资，抑

或是这么做是否破坏了环境，那么我们的意图可能会改变。因此，前脑不得不做出各种选择，既有可能确保也有可能干扰自动的反射动作，阻碍它们的实施。这种接受信息、提供反射、做出选择的过程几乎是无止境的。众所周知，严重的焦虑状态或震惊也可以导致身体颤栗和手的抖动。

中枢神经系统中最古老和最原始的区域是脑干，它从脊髓向上延伸至脑的中心。从脊骨中显露出来进入到颅腔时开始变粗，先进入延脑，然后是脑桥。中枢神经系统的这些原始区域以反射的方式工作，这些反射作用并非后天习得的，但是它们的功能却是通过皮层解码来控制的。中枢神经系统将目标和意图传递到这些原始区域，继而通过反射来实施这些目标和意图。脑新皮层说，依据我的价值观或一时冲动，我要做某事，或是我必须要做某事，延脑和脑桥便会将肌肉协调一致，或提供激素的刺激，将其付诸实施。脑干，可以说同样是无意识的，也不能修改自己的反射。反射作用占据主导地位而且不能后天学习，这代表了进化的一个时期。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表明，低等动物如何在他们的本能推动下重复相同的行为，即使这种行为的结果会威胁到这些动物的生存。

p96

认识到高等动物尤其是人脑进行大量的交互式加工，使我们能对广泛的心理和躯体的功能和障碍的重要性开展新的评价。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可以通过精神神经病学的调查得到补充，并开创了一门新的研究心理的综合性的科学。

5. 意识和智力

由人类和其他动物的对比证实，前脑，皮层的前额叶是意识以及较高级心理功能所在之处；它们标志着动物进化的最新阶段，并且将人类与所有其他物种区分开来。即使与我们近亲的黑猩猩相比，尽管它们的DNA与我们只有百分之一的不同，

但实际上，我们人类的脑皮层前额叶却要比它们的大好几倍。毫不奇怪，脑皮层的这些区域是最令人好奇的，同时也是最难以确切理解它们做什么以及如何做。在脑皮层所有的区域中，前额展示出了最惊人的增长：在哺乳动物的进化过程中，它的增长在猫科中达到了3:1，黑猩猩17:1，而在人类中更是达到了惊人的29:1。与我们最近的始祖黑猩猩相比，我们的脑并不只是大了很多，而且，尽管人类的脑皮层大部分用于特定的功能，尚有许多区域未被分配明确的任务。

我们也许会把前额叶的角色与自我相比较，自我的任务便是将大量本能的冲动、驱力和反射协调为一个连贯的整体。我们可以称自己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虽然我们并不完全依赖于外部世界的刺激物，但却必须按照我们评价这些刺激的方式来解释它们。换句话说，额叶皮质区与大量来自我们自身的脑的较原始部分以及外部世界的刺激有关，并辨别出那些被允许进入我们意识的刺激，继而选择我们的行为方式。事实上，正是没有分配特定任务的前脑区，才向各种可能性敞开了大门，这种不确定感，这种对猜测、摸索答案的需要正是我们高级心理能力的特征。让·皮亚杰（Jean Piaget）强调，智力是这样的东西：当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使用它。这捕获了“新奇的元素，这是一种在没有‘正确答案’时所需要的应付和摸索的能力”，威廉·H·加尔文（William H. Calvin）如是说。[脑如何思考》（*How Brains Think*），韦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Weidenfeld & Nicolson），1997]

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复杂的行为与智力有关。但是许多动物的复杂行为是遗传的，与生俱来而不需要学习的。这些行为趋向于固定化，而且通常难以随意实施，就像打喷嚏和脸红。这些一成不变的动作模式与一个计算机程序相比，并没有显示出更多的洞察力或是对意图的理解。最无意识的行为常常是一连串的，一个行为的完成产生下一个行为。求偶行为接下

来或许就是复杂的筑巢、下蛋、孵化以及各种按部就班的繁殖行为。实际上，这些行为越复杂，就越不可能是智能的行为，只因为这是自然选择发展成的必然方式，基本不可改变。我们谈到智力，常常既指各种能力，又指运用这些能力的效率，同时也暗示着灵活性和创造力——用人种学者詹姆斯·古尔德 (James Gould) 和卡罗尔·古尔德 (Carol Gould) 的话讲，是“一种摆脱本能的约束，产生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的能力”。

p98

本能反应是进化形成的，是自动发生的，或是如达尔文所说，是不随意的。在脑还没来得及开始思考该做什么，它们就发生了。思考需要时间，但是对危险的反应经常需要不经考虑而迅速做出决定。[约瑟夫·勒杜 (Joseph LeDoux): 《感性的脑》 (*The Emotional Brain*)]。许多动物基本上是靠“自动驾驶仪”度过一生的，而那些能够轻而易举地从“自动驾驶仪”转换为有意识控制的动物，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认知使我们有能力根据我们所处的特定情境决定下一步的行动。知觉之所以成为心理宝库中如此有用的一部分，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使反应得以向行动转化。这种转化能力带来的生存优势，在塑造哺乳动物认知的进化细节以及灵长类动物尤其是人类的认知爆炸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我们还没有真正充分理解人脑是如何评估一个情境，并提出一套潜在的行动方案，预知不同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优先分配可行的行动，并选择一个特别的行为，但是这些行动毫无疑问都是精密复杂的认知功能。认知功能提供了由反应到行动的至关重要的转化。根据我们目前所知，某些区域如前额叶皮层似乎与之有关。前额叶是大脑皮层的一部分，其绝大部分是在灵长类动物的进化中扩张的，在其他的哺乳动物中，它甚至可能不存在。当人的这一部分受到损伤时，人们将很难计划做什么。所谓的额叶病人往往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做相同的事情。他们会将精力集中于现在，而无法将他们自己投射到

将来。

p99 基于脑特定区域损伤而产生心理障碍的报道充斥了无数关于脑病理学的书籍，例如病人不能识别（音乐）旋律，不能读或写，不能模仿简单的几何图案，辨认不出熟悉的面孔，不能计算简单的算术，不能辨认地点。然而，当病理学家们试图解答我们的智力活动可以定位在脑的什么位置时，他们不得不承认皮层中尤其是在前额叶的某些区域似乎没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当这些区域的任何一处 在脑手术中受到电刺激时，没有任何反应。当病人的前脑遭到重创而受到严重损伤时，在他们的外显行为甚至在智力功能上，并没有明显可辨的缺陷。那些由于头部重伤而导致额叶皮层或多或少完全毁坏的人，能够读、写，进行数学计算，还能凭借明显未削弱的能力继续从事他们的职业。有时作为会计和律师，在手术后，他们也照样能够重拾工作。他们的雇主从他们的工作中看不出任何衰退的痕迹。所有的医学测验都不能发现他们有任何显而易见的障碍。额叶的这种明显的功能非特异性，看来令人费解，也与这个事实相矛盾，即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额叶是所有人类特征中最具人性的。

虽然医生在对这些病人测验成绩的研究中看不到什么特定的变化，但病人的家人和亲友却能很快意识到他们个性的变化。他们注意到：“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了，他的行动变得迟缓了，他讲话比以前少了，他对他的家人、同事和老朋友都提不起多大的兴趣，变得懒散。”以前那些困扰他们或能激起他们强烈情绪的事情现在对他们来说似乎已经无关紧要；对那些亲近他们的人，他们不再表现出同情和责任感；对以前颇为关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他们也不再感兴趣了。他们似乎不再关心人们怎么看待他们。他们不再关心他们的外表，穿着随意，时常表现的十分不得体，有时还会无缘无故的爆发猥亵和暴力的言行。

p100

6. 道德的神经元

我们开始了解，前脑受损所导致的是与“人性”和文明有关的心理素质上的缺陷；通过观察前脑在严重受伤后所做不到的事情，我们从而找到了一丝线索，得以发现它在正常状态下所能做的是做什么。那些前脑遭到剧创和损伤的人们，仍能处理涉及我们称之为智力（包括阅读能力、书写、数学计算和职业技能）的任务。换句话说，他们能够从事他们过去所掌握的行为和技能，并能继续他们的职业活动，这些方面没有表现出受到阻碍，很是令神经科医生惊讶。然而，重点在于他们的表现完全基于先前既得的技能，这些技能作为对以前条件作用的反射而持续起作用。但即使这些已获得的能力几乎没有缺失，他们也无法对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表现出同情心和责任感；他们在面对新的陌生任务时会感到困惑；对新的境遇和智力挑战感到无所适从。他们不但对亲近他们的人们变得冷淡，对社会上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而且对任何他们没有了解的事物缺乏知性的好奇和兴趣。他们只活在现在，而他们运用智力功能的方式像个机器人。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不能积极面对新的环境，缺乏能力去尝试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的前瞻能力，在新的陌生的条件下进行计划和做出选择的能力也大大减弱甚至不复存在。他们缺乏自我批评、道德顾虑，以及对他人的移情作用。

我们从而可以认识到，我们脑皮层的前额叶提供了我们之所以被认为是“人类心理”的生理基础。神经学者早就认识到脑皮层的额叶区高度进化，而且远远大于其他所有的动物，象征了一种相对较新的成就，而我们现在可以重新确定这个所谓人类的精神维度，给予它特殊的性质，即辨别不同的形势和状态的能力，做出选择的能力，认同某种价值观和目标的能

力，在我们的头脑中预见短期和长期的可能或大概情形以及我们相应行动的结果的能力：我们应该做什么，如何做是正确的，还有分辨善恶的能力。换句话说，用道德的原则来指引我们的行为和判断。

安托尼奥·达玛西奥（Antonio Damasio）在他的《对所发生的感受》（*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一书中，描述了他对前额叶功能的研究，他称之为脑的道德中枢。他对许多病例进行了详细的报导，这些患者的脑前部因肿瘤或意外事故受到过严重损伤，致使他们对各种社会关系无能为力，无法关心他人或是一点责任感都没有了。他们不能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而且表现出丝毫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是反社会的和非理性的。但是达玛西奥和他的研究小组成员很谨慎，他们没有下这样的定论：每个犯有反社会或不道德行为的人都遭受了脑损伤。他们问：那些脑前部没有受到伤害却遭受了前额叶皮层障碍的人是怎么回事呢？那些从事犯罪、破坏活动、暴力和谋杀行为而丝毫没有从情感上意识到危险，没有意识到他们造成的苦难的人们，他们的大脑没有遭受过物理损伤，我们又如何解释他们道德感的缺失呢？

对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考虑到心理创伤，尤其是在一个人早期发展的阶段，我们也许能找到一丝线索；在每一个正常的或是健康的大脑中，都有一个区域用来专门记录和存储父母的应答以及那些影响和刺激他们道德神经元的早期环境，不论父母是爱与呵护还是冷漠排斥。

这个说法毫不夸大：我们被爱和被呵护的需要，以及反过来爱他人和呵护他人的需要，是作为一个道德观念在心理上表征的。我们可以说这些需要被我们的心理当作道德原则而外化和感知。这些原则，可以说在我们生命的早期就必须学习并储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而不是通过基因遗传编码的；借此，它们成为我们在选择和判断周围的世界以及我们的反射和冲动

时遵循的模式。因此，我们脑的神经学的过程尤其是额叶活动不仅取决于生理学的过程，更取决于心理学的过程。

众所周知，如果神经元和突触没有受到刺激就会变得不活跃甚至衰退——可谓闲置太久使它们变得多余。我们可以称之为学习过程，它不仅与认知有关，而且最重要的是与情感有关。在产生紧张和恐惧的应激条件下，大脑的高级功能便短路了，反射和本能反应支配了我们的心理和行为。这些个人心理进化的问题，我会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到。

我们已经了解到，难以数计的冲动将它们的信息从脑的各个区域发送至皮层的前区，前区对它们加以解释或修改，在内部（身体内部）以及向外部环境都进行这样的活动，选择哪些可以进入到意识中，哪些必须要被抑制。由此，笛卡尔的格言“我思故我在”被赋予新的佐证。这还验证了萨特（Sartre）的一个悖论：“我们被罚以自由还要被迫做出选择。”

所有的人类特征中最具人性化的部分有可能产生，恰恰是因为人类新的脑区看上去是“一片空白”，所以它能够对许多可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做出反应。它对各种各样的目标和意图敞开大门，而它的“空白”提供了一种弹性，使得它不会局限于本能反应和专门的任务，我们物种具有应付各种反应，做出新的调节和行为方式的潜能。

但是问题难就难在这里：大自然历经千百万年的进化而赋予我们的自由，同样给了我们疯狂的自由，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它使我们能够拥有道德的观念和信念，然而，被认为是道德的东西既可以适用于慈悲的同情，也可以用来为种族的或宗教的成见开释：从形而上学体系的构想到集中营的建造；从对我们同类的怜悯和同情的理想到极端的冷漠和残忍。大自然给予我们的非凡的馈赠可以变成它的对立面：理性太经常变为非理性，自由变为对自由的否认；提前计划的能力会效力于破坏和自我破坏的目标。我们可能不再提及首因；不再提及上

帝以其明智创造了世界并使它成为现在的样子，包括既有理性能力又有野性的人性；我们也不能再用遗传决定论来回答这个问题了。人们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惊人的事实，即人类可以在没有受到物理损伤的情况下麻醉他们的前脑：他们可以像那些脑严重受损的人们一样聪明，他们能够读、写、计算，使用电脑，处理股票和分红，他们可以给他们的孩子玩一些崇尚暴力的电脑游戏，并能为各种暴行找到冠冕堂皇的合理借口。我们时常能够注意到，一些非常聪明的人，他们能够为核武器和生物武器进行出色的数学计算，使这些武器被用来实现独裁，没有任何道德感用以评价他们自己的行为，这些人实际上愚蠢透顶。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致命的悖论：人类能够阻碍他们长远的前瞻能力，不能预见他们对同类的行为或与同类情感相通的结果，不能预见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直至今日的兽行的后果。然而如果我们未能分析出这个悖论，我们便是忽视了我们杰出的大脑施加于我们的任务。于是，我们必须要问，我们大脑的这个重要的性质，我们心理的奇迹，是如何起源的？

那些对他们所造成的伤害毫无责任感的精神病人、罪犯、冷酷残暴的独裁者，为了调查他们是如何压制或抑制他们道德神经元的功能，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新皮层的任务是分析从脑的较老区域接受到的众多神经冲动，将这些冲动与那些服务于生存和舒适需求的冲动区分开来。因此，我们必须分析，为什么人们会选择那些非理性和明显带有伤害性的追求。这些都是精神分析学家和人类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章 意识和道德的起源

1. 一门精神分析的人类学

在上一个章节中，我们已经探讨了意识借助其能力“摆脱本能的束缚而提出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案”的神经学基础的依据。然而从进化论的观点来看，我们必须问，我们的前脑使我们物种得以大大超越其他所有动物的非凡能力是如何又是为何发展起来的。如霍伊马·冯·迪特富特（Hoimar von Ditfurth）所指出的，我们必须首要牢记在心的是，意识的根源一定比我们的新皮层要古老一些，新皮层是思维的器官而不是思维的原因 [迪特富特：《心灵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Der Geist fiel nicht vom Himmel*），Dtv, 1991]。如果我们做某件事，我们需要在想像中反映、思考和预测将发生什么，这样就产生了意识。如果一个人认为心理和精神是中枢神经系统的解剖学结构的产物，那他就颠倒了因果关系。思维并不是脑发明的，而毋宁说恰恰相反，就如同行走不是双腿的发明，光、影、色也不是眼睛的发明。腿的起源是在进化过程中出于对在热带稀树大草原上快速行动的需要，眼睛的进化则是出于方向感和辨别力的目的，而对尽可能的看到太阳光线的反应。

如果我们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待我们物种的精神生活，并伴随着这个逾两三千万年的进程，我们可以认识到，人之所以能够占据进化的顶端，是历史进化的产物；在这一点上，我们甚

至可以追溯到一些具体的事件中去。

人脑额叶所获取的首要角色来自于思考的需要，来自于对自身行为结果的预期的需要，预知和预言的需要，以及一个人将自己置身于某个特定行动之前，计划和权衡的需要。人智慧的天性会去质疑他已知的东西，在头脑中尝试新的可能性，并依据事物的本质和他的现实观去修订他的知觉。在众多的可能性中，他还必须创建一种道德判断的感觉，这种感觉不仅仅使他能用一种正确的方法来了解周围的事物，还关乎到他对周遭的人和事的态度何谓对何谓错，以及对他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为。他必须对如何正确诠释进入思维的海量信息有某种程度的确定性，在那些自己感兴趣的、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信息和不利的，甚至是自我毁灭的信息之间，做出取舍。人若缺乏一种能够让他集中思想的导向，便会迷失在一片混沌的欲望、冲动、反射和本能中，这会让他陷入一种混乱和迷惑的状态，他不能以一种连贯的方式行事。他将不知道要干什么，而沉浸于一种麻痹瘫痪的状态，甚至失去了生存的意志；或者是出于无助的感觉，他受控于一种狂暴的情绪，对周围的世界做出虐待狂般的破坏或是自我毁灭的反应。

正如我所说的，这种现象不仅仅表现在个人身上，在文化中我们也能看到。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对存在的焦虑状态：当面临着变化了的环境，已经不能再用习惯、传统和遗传来寻找答案时，这种状态就会出现。这些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物种的危机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物种面对着两种抉择：重建判断和反应方式以适应新环境，或是在生存的战斗中被击败。我们的原始祖先必须有足够大的脑区来转变他们本能的反射和习惯，以应付新的环境，而这一点，本能是无能为力的。

2. 工具制造和智力

一向的说法是，人是工具制造者或道德生物，这使得人与

其他的物种区别开来。除此之外，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还有语言和智力。这些人类能力与遗传因素包括 DNA 有关。但似乎没有人问及这些能力如何形成以及为了什么目的而形成，人类的基因和 DNA 又是为何进化成现在的样子呢？有无尽的研究在致力于类人猿到智人的转变，这些研究借助了解剖学、生理学和神经学观察的方法。对于这些转变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已经了解很多，但我们没有去问它们为什么发生。如果我们赞同进化论的观点，我们会问为什么在不同的进化阶段会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们可以合理地解释为，这些变化是一个物种在生存环境发生突然剧烈的变化而面临灭绝的威胁时，对危机的反应。为了存活下来，一个物种必须获得生理和心理上新的能力。

传统达尔文的生存驱动力和适者生存的观念可以作为一种解释，进化不是偶然事件。偶然性在生命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很多情况下这只是在我们尚不清楚某事的原因时用来解释事情的一种概念。爱因斯坦也不同意量子力学中的一些统计或然理论，凭着一种天才的直觉，他宣称：“虽说上帝是狡猾的，但他可不是一个掷骰子的人。”他没有摈弃因果关系原则，并历时多年试图发现一个通用理论用来解释他所发现的现象之间的因果作用。

事物以它们所存在的方式存在着，这一思想令人想到一种犹太-基督教的宇宙哲学，说自然界的现象看上去像陈列着上帝造物的博物馆。进化论的观点将我们所知的生命看作是持续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而我们所感知到的现实不过是其中一个暂时的阶段。考古学家对于他们所发掘出的化石在很多问题上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对化石的时间范围、其特征的描述，他们为何物种和人种的鉴定，对于像腊玛古猿、东非人、南方古猿和傍人属这样的人类始祖能否被归为人类的问题，与他们一起发现的石器，以及在奥杜威（Olduvayan）遗址发现的大量

石器，究竟是自然作用还是早期人类劳动的产物，一直有着激烈的争论。

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关乎一些决定性的特征，用以区别出人仅仅是那些可以被用作工具的自然物体的收集者呢，还是他已经发展出根据使用的目的制造工具的智力和技术，并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发展出一套标准的技术和模式。这不仅需要将双手进化得有能抓取物体并在树枝上支撑他，更需要一个明确的直立行走姿态把双手解放出来操作物体。

3. 工具制造和文明的起源

如果要对工具制造的基本原理做一个概念化的阐述，那么它就是外化的原理。这是人的一个基本特征，他通过用物质符号和文化概念在外部重现自己的心理过程，将他的心理过程外化。人的这一心理 - 精神活动的外化过程，是一切人类文化的根本，它于约一百万年前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产生同时出现。人是文化的创造者，这是人的一大特征，而没有文化也就不成其为人类了。

黑格尔和马克思谈及外化（Veräußerlichung）以作为异化的一个方面，而我将这个术语用于描述人类劳作、创造自己的环境的一种基本能力，由此生物的进化便转变为文化的进化；精神接替生物成为进化的动因。

p108 由于皮层的前额区和视觉区大规模扩张，人可以对一种经验有一个表象，即使事情并没有实际发生，他可以看到自己在做某事，即使他并没有真正在做。他可以体验各种感觉和冲动，例如在他的口中、他的牙齿、双手和手指，在他的想像中体会这些冲动。他能将可能的或潜在的活动形象化和概念化，并预期未来的形势，在他的想像中解决问题。（未来作为一种假想的情形存在于现在，而反过来，现在受到了对未来想像的

影响。)借此,人可以在他的头脑中从事大量各种各样的活动,比较它们的实用性,在自己着手行动之前选出最佳的。从自然选择和适应环境的角度来看,这种能力的巨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它使得人类能够在短短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内调整和修正他们的行为,而对于受制于本能反应的其他动物来说,这可能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自然选择才能达到。

然而,人类不仅能够通过在头脑中的试验发起他自己的自然选择,他还能够在物体上体验他自己的欲望和运动感觉,也就是说,他可以将自己的外周和运动感觉投射到外部物体上。例如,如果他希望自己的牙齿和指甲变得坚强有力,因为这些至关攻击、撕咬以及切削、刺穿和抓擦,他会把某些石头看作是潜在的牙齿和指甲,把它们设想成牙齿和爪子,并能看到它们工作时比他自己的更有力、更有效。这些石头从此便会获得他的器官的生命力:人类能够将他的感觉外化到这些物体上,将它们制成工具或武器。因此,他会赋予外部物体以他自己运动器官的感性经验,他会将一块石头看作是一个潜在的爪子或拳头。在这块石头里,如柏拉图所说,藏有工具的理念,藏有工具的本质,而这一本质必须要由工人或雕刻家从石头中挖掘出来。

从一块石头或一根棍棒中“识别”出一个人的运动器官的能力,还包含有将他的感觉和冲动投射到外部物体的能力。在制造工具的过程中,人复制了他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并增强了它的力量。一支矛象征着飞跃,它象征着一条服从自己欲望的胳膊,摆脱了身体的限制,矛头象征着撕扯东西的爪子,咬穿东西的牙齿,矛和矛头象征着飞行运动的实现和刺穿猎物或敌人身体的力量。

然而,人类并非只是将他们自己新发现的能力和力量的感觉投射到他们所制造的武器和工具上,赋予它们某种灵魂,他们还会内摄这些武器和工具的力量,并与之产生认同。他的武

器越是精良和强大，他在面对世界时就越感强悍和安全，这一点从拥有武器而自豪的个体、部落以及国家中可见一斑。从人们改进武器和工具的无情的驱力中，我们也能见证这一点。武器和工具被改进成式样越来越精密和复杂的军备和机械，而它们为国家和个人带来的是一种地位感。

但这些投射和外化的作用并不只局限在运动器官上，而且作用于情感和心理过程；人们能够从大量的自然物体，无论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物体中识别出他自己的情感。

在这里，我想谈谈符号化和符号。一个符号既代表了概念，也代表了视觉表象形式的欲望和感觉。每一种主观经历的情感和理念都能在一个符号中找到它的视觉表征。人会通过素描、绘画、雕塑和建筑来尽力重现这些符号表象，他也会在外部自然界物体中寻找符号表象的代表：树木、花草、天空、太阳、大海、云朵、草场和林中空地都可以象征他的心理状态，因为他将自己的心理状态投射其上。当一棵树象征男人自信的力量和母亲的拥抱和保护时，可以被看作是坚强和自豪的；一朵花可以代表娇媚的少女，向世人展示着她的性感；花以自己的快乐为快乐，以它鲜艳的颜色来歌颂渴望和欲望的刺激，它可以表现得不知廉耻，也可以因为害羞而脸红；绽放时变得弱不禁风容易受到伤害，容易遭受男人激情暴力和无情占有欲的威胁，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的诗歌这样写道。

大量的幻想，或者毋宁说是无意识的情结和恐惧都投射在了自然界的物体上。对一个相信科学的旁观者来说，一棵树会被看作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不具有心灵和幻想，而是由木质、根和叶组成，与这种投射的幻想没有任何关系。如果他碰巧是个商人，他会将这棵树看作是一个收入的来源而对其进行统计上的或是经济上的评估；又或者，他是一个环保主义者，这棵树又会被看作是生命有机体所需氧气的基本提供者，并且应受到保护以免遭商业开发。虽然这些人都认为自己是完全经验主

义的，但还是难以否认他们将各自特定的观念上的和情感上的态度投射到那棵树上。即使是严格的经验主义者也不能完全消除自然现象的象征性意义，它会在他的梦中或是前意识幻想中重现。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万物有灵论的世界观，伴随着它的幽灵和灵魂、仙女和怪物，已不再出现于人们有意识的心理中。即使万物有灵论被宗教和科学文明所驱逐，它也继续维持一种隐秘的存在方式，偶尔被画家、诗人和神秘主义者重新唤醒。

因此，人是一个能够将自我外化的有机体。他既可以成为内在的自己又可以成为外在的自己（黑格尔称之为精神的客观性，或拥有人的观点的上帝，是自我外化的表现）。一方面，人能够在他创建的事物中感受到他自己，另一方面，他又能从这些事物中抽离出来而变成局外人，例如，在树立严格的科学思想时或是在市场经济的哲学中。外化由此成为工具制造、劳动、万物有灵论、图腾崇拜、敬神和意识形态等等所有这些的基础。

4. 从原始人到人的进化

自我外化有可能是人类最杰出的能力之一，而且是将人类明确地从其他动物区分开来的能力之一。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一能力是如何又是何时在后来变成人的猿身上出现和发展的呢？就外化是人类制造工具能力的基础而言，我们可以追溯到中早期的更新世，追溯到爪哇直立人和北京人。这两个人种同属一个物种，据猜想，分别生活在距今一百万到七十年前的爪哇和中国。他们被普遍认为是已知最早的“人”种成员和毫无疑问的工具制造者。而且，他们颅腔的容量远远超过了之前所知的任何物种，已知最早的爪哇人的容量为 750 毫升，后

来的北京人的容量为 1150 毫升。我将工具制造的能力和外化作用联系起来，我认为这些早期的人类已经发展了外化作用，而且，由此为人类物种进一步的心理和身体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类在森林中进化出基本结构、脑、感觉器官、四肢和生殖系统，所以人类可以被称为森林动物。后来的发展，即在开阔地上的生活，只是需要对这些结构加以调整和细化，而不是建立全新的结构。因此，我们的类人猿祖先栖息在树上的生存方式就是人类特点出现之前的前期调整。当需要转变这些基本的灵长目特点时，人类完成了这个转变，这是人类的伟大成就。

在从灵长目向人类进化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不同阶段：环境上从无边无际的大森林变成了肥沃的开阔地——稀树草原——然后是千万年间稀树草原慢慢地被侵蚀；这些环境变化需要人类不仅仅是偶然性地猎杀一些小动物，而且要猎杀大动物，才能生存下来。

p112 据估计，从非洲西海岸到西印度群岛，从南非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从澳大利亚的南部到西伯利亚，这一面积广阔连续的亚热带森林在大约二千五百万年前遭受到了稀树草原的入侵。草在树之间蔓延生长，干旱的平原像海洋一样漫无边际。这是地理剧变的开始，这一剧变始于第三纪的中新世，结束于更新世时期冰河纪时期气候的灾难性转变。森林中的灵长目动物和类人猿多半时间都躲在荫凉里，在树叶和树枝的“绿色洞穴”中生活。森林里的植物提供了住所、保护和生活供应，现在依然为我们这个世界上的黑猩猩、猩猩和大猩猩提供这些。他们沿着灌木丛中隧道一样的小路奔跑跳跃，在高大的树木的华盖之间跳跃摇荡，通常都会努力避开那些开阔的令他们感到不安的地方，在那里稀树草原的草已经侵袭到森林的边缘了。虽然我们现代的大猩猩也面对着依然在扩张的草原的威胁——这些草原是现代人为满足其对农产品无休止的追求而人

工制造的，但是大猩猩们并不能离开原始的居住地；而在大约一千二百万年以前，沿着森林和稀树草原之间不规则的边界线上出现了一个新型的灵长目动物。这种新型灵长目动物开始探索这片到处是青草和嫩枝的开阔空间，也许开始追逐和猎杀一些小动物。因为树木附近的食物供应变得越来越少，他开始向稀树草原深处走去。“在事物的边缘地带，进化的作用是最为集中的，在这里两种环境互相影响，完全不同的事物就近在眼前，因此崭新事物的诱惑也是最强的。” [约翰·E. 法伊弗 (John E. Pfeiffer): 《人类的出现》 (*The Emergence of Man*), Thomas Nelson, 1970]

这些生物就是原始的前人类 (pre-man)，是比大猩猩要小得多的类人猿。这些森林居民开始采取地面生活的方式，这意味着他们要比黑猩猩等更少依赖树木。他们不具有，或者已经失去了允许他们在树枝间摇荡的特殊的四肢和肩膀结构。在印度发现了这种类人猿的遗迹，一千二百万年以前他们生活在那里，被命名为腊玛古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太多的腊玛古猿标本，总数少于一打，但是足以作为早期人类进化的推测的基础。

在更新世出现了相当突然的生态变化，导致了冰河纪剧烈的气候变化，并且迫使灵长目动物必须面对荒凉危险的环境，现在我们知道不太剧烈的转变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过。这些转变的性质比较柔和、渐进，森林并非完全消失，平原地带和开阔的稀树草原并不是丝毫没有植物的冷冻的苔原，而是开阔的草原，长满灌木丛，为那些准备好适应开阔平原生活的素食物种提供丰富的滋养。但是只要可能，这些人类最早期的祖先还是会回到森林里睡在树木的庇护所中。当这些可以栖息的树木不复存在的时候，他们选择了一些不容易被食肉动物发现的地方，可能是面对着峭壁在岩石上过夜，就像现在的某种狒狒一样。白天他们冒险在开阔的草地或半干燥地区探索搜寻每一点

可以找到的食物。他们开始使用棍棒以及尖锐的石头来挖掘那些水分丰富的植物块茎和浆果一类的食物。这些石头和挖掘用的棍棒也可以用于抵挡食肉动物。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他们的牙齿，尤其是犬齿的大小的时候——牙齿的尺寸是我们考察他们生活方式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出现了一个非常显著的矛盾现象。多数灵长类动物都生长着硕大的犬齿，这些犬齿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例如狒狒，他们是另外一种从树栖生活转变成地上生活的灵长类动物，当面对敌人的时候，会张开大嘴露出一组巨大而且尖锐的犬齿。这种武器展示行为是一种警告符号，能够使它避免更多的麻烦，通常它的敌人都会躲开。一旦这种威胁和警告失败的话，这些牙齿可能就真得发挥作用了。这是狒狒最可怕的武器，归根结底，狒狒在群体中的社会地位要依靠它的战斗能力决定，而它的犬齿则象征着它的英勇。

p114 但是腊玛古猿并不具有这样硕大的犬齿；他们的牙齿要相对小一些，牙根浅而且小。事实上，他们是第一批为我们所知的不具备天生武器的原始人类。既然一个物种的生存要依靠强有力的攻击和防御能力，那么这个重要的发展一定存在某种特定的原因。西蒙斯（L. E. Simmons）观察发现，“这些原始人类吃饭和打斗的方式都已经不同于类人猿的方式。他们当然也不会像类人猿那样用牙齿有效地切碎植物，也不再向食肉动物攻击性地展示牙齿了。事实上，他们的手似乎更有可能在食物采集和自我防御中发挥主要的作用。此外手的用途的扩展意味着他们已经开始直立行走”。[西蒙斯：《人类的早期亲戚》（*The Early Relatives of Man*），“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1964年7月刊]

毫无疑问，因为猿人能够直立，并且能够用双足行走几分钟或更长的时间，进一步促进了工具的使用。双足行走增加了双手的自由度，提供了更多的时间来掌握新的操作技能。直立

行走也使他们看到稀树草原的连续的全景，也增强了他们看到周围发生的事情，觉察和预料危险的能力。我们也可以这样推测，直立姿势有助于阻止那些最为危险的食肉动物——大型的猫科动物。乔治·沙勒（George Schaller）曾经在印度观察过老虎，在坦桑尼亚观察过狮子，曾经这样评论过这种可能性，“大型猫科动物的狩猎方式通常是趴着，静静地等待着猎物，或者是偷偷地靠近猎物然后从后面扑上去，接着咬断它们的脖子。因为人类是两足直立的方式，所以并不是个很好的目标，不是那种大型猫科动物很容易扑过去的较低的体位。也许这就是现在以及过去为什么人类能够阻止住那些大型食肉动物的原因之一”。

因此毫无疑问直立行走的能力，哪怕只是一段距离，对于被迫生活在平原上的类人猿而言是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优势。它解除了前肢在行进中的必要性，开辟了手的新的技能领域，增强了处理和操作物体的技能，增进了使用物体进行自我展示，发展了新的食物采集和攻击动物的技能。但是腊玛古猿，这一千二百万年前的前人类，从根本上讲还是与它的近亲——类人猿一样，依然是素食者。它的大部分食物供应还是来自稀树草原上的野果、谷类植物和野草，只是偶尔被迫猎杀动物。它所猎杀的动物都是些小猎物，它小心地躲避大型动物。同样，它可能还努力尽量在靠近森林的地方活动，偶尔在森林里过夜，它可能依然把森林当作逃避平原艰难生活的避难所。换言之，在当时的情况下，它还不愿意完全失去森林的庇护以及那些可以食用的植物。但是腊玛古猿奠定了直立人出现所必要的前提基础，最终促成了一种新的物种出现，这种物种能够直面生态灾难的挑战并变成了人。

南方古猿的前齿相对较小，站立的姿势已经相当挺直，并且已经发展了较高的运用双手控制物体的能力。他们的双手，相对于我们的类人猿祖先而言，具有更大的运动范围，这说明

相对于那些嘴唇和牙齿更为敏感熟练的类人猿而言，他们能够更灵巧地进行更多的实验和尝试。另外还有一双具有立体视觉的眼睛观察并注意手上做的事情，在大脑皮层中存储了手的行为模式，并且不断发现和发明新的技能，大脑以更快的速率增长成为可能。在爪哇人中可以观察到的大脑皮层区的增大意味着记忆力增强，最重要的是，对于可能的行为和情境的内部想像力大大增强，即或多或少独立于实际感觉刺激的内部知觉和表征能力的急剧提高。

最早的人类，可能是爪哇人，能够想像事件的发生，并且能够对这些内部表征做出情绪反应，与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差不多。（在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周边事物世界的心理解释、我们的想像和幻想，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身心功能：如人们所说，坏的想法会致病。）他能够幻想愿望实现，能够想像他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猎杀危险的动物，能够在幻想中战胜猎物或威胁野兽，以控制自己的情绪压力，如害怕和饥饿等。在饥饿和焦虑的压力下，他可能会想像自己拿着象征牙齿和爪子的强有力的武器，他可能会把这些形象与周围的石头以及其他坚硬的实物联系起来。一看到石头，他可能就会识别出想像中的武器，并且根据想像对石头进行加工。因此他可能会把自己的想像转变到外部世界，通过劳动把想像变为现实。

p116

5. 图腾、鬼魂和精灵

但是，通过劳动把欲望及其符号形象外化，这只是外部化诸多方面的一种。一旦进攻和防御的情绪通过工具和武器实现了外部化，那么多种多样的幻想和情绪实现外部化过程的大门就打开了。这些精神经验可能会被看作是存在于外部世界的：“存在” = “处于外部世界之中”（exists = is outside）。爱和恨、安全与焦虑、破坏与补偿、负罪感与牺牲等情绪，都能在

幻想中找到符号表征，这些符号形象就会被认为是存在于人类之外的——独立存在于外部世界之中。人们的情绪冲突，以符号形象呈现，仿佛在外部世界进行；精灵、鬼魂和妖怪互相争斗，替人们进行情绪战争。人类不再是孤单的，他再不会独自面对未知的宇宙了，鬼魂和精灵既能保护他，也会威胁他，替他打仗，教他如何行动。他会在他投射到外部世界的精灵中识别自己，并从其中得到认同感和安全感。

一旦人类学会制造工具并且创造了语言，那么就可以通过标记和符号、图画和雕塑、言语等来代表这些精灵；一个崭新的意义世界和戏剧世界也就出现了，而文化，正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也就诞生了。文化意味着以鬼魂、精灵、神性和神话影响世界的的能力，通过共同的崇拜和仪式把它们传达给群体成员，使群体与它们保持联系。通过文化符号，群体成员分享着他们的情绪体验，并且彼此之间找到了情感交融之处。

鬼魂和精灵还代表着我们认识的和我们所想念的人们。正如同我们的父母亲去世后还会在我们的梦中出现，像活着的时候那样，原始人则会把这种持续的存在归因于他们梦中和幻想中的鬼怪精灵。他们会想像着已故的人们存在于另外一个王国里，因此会努力通过招魂、标记和符咒的方式寻找与他们沟通的途径。于是鬼魂崇拜就开始了，通过词语、名字、某些相应的标记和图画符号推动了这样的崇拜。最后，连呼喊鬼魂的名字也成了祷告，一种仪式和一种巫术活动。事实上，鬼魂就存在于代表他的名字的单词中（“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

p117

原始人类大概已经学会珍惜其头脑的重要性。他的头脑会被高度调动起来；在他的生存斗争中它是最重要的器官。原始人们可能会意识到鬼魂既存在于他的头脑中，也存在于外部世界，所以为了与祖先的鬼魂沟通或拥有祖先的鬼魂，他会吃掉先人的大脑。我们吞食着老师的头脑，我们“挖老师的头脑”

并且“消化”它。但是现在我们作为智人以言语符号的形式所表达的内容，在原始人那里却的确是这么做的。他在其先人的脑颅中挖一个孔，取出脑子，然后隆重地把它吞食掉。通过这种方式，他吸收了他祖先鬼魂的力量和技能，并且确保得到祖先的佑助和爱。于是他把他所爱戴的先人内摄了。

表现出文化和仪式迹象的最早的人类遗迹发现于周口店北京人居住的山洞里。此处发现的大量北京人的头颅在相同的地方都有孔。很多头颅摆成圆环形。显然，这些孔使得他们能够从头颅里取出脑子，然后吞食寄存于其中的鬼魂。这可能是集体的盛宴，是原始版的基督教弥撒圣餐，而在圣餐仪式中食用圣饼和饮葡萄酒，即象征性地吃掉耶稣的身体和饮用他的血。这暗含着后来的图腾盛宴中的相同的机制，即通过隆重地吃掉图腾物的身体来吸收其力量、技能和智慧，实现同一文化成员对于图腾的认同。

p118 通过这种方式，原始人类又重新获得他在不得不跨越其本能定位时失落的安全感，进入了一个为精神形象和符号所控制的世界，为了生存，发展了人类特有的器官。他的心理取代了自然选择，他的想像和技能取代了，或者不如说排挤了本能，成为进化的动因。失去了本能的安全感之后，人类进入了一个为其心理所控制和指导的宇宙，进入了一个由形象、符号和人造物组成的世界。

6. 狩猎者和留守者

随着大脑皮层活动的发展和大脑体积增大，成熟过程延长了。由于大脑结构复杂，由于需要学习协调本能反射，需要掌握文化积累的技能，人类，甚至包括前人类，不断延长婴儿期，他们需要长时间地依赖父母，尤其是母亲。随着婴儿延长的无助状态及其对母亲保护的需要，基地必须变得更持久，更

具保护作用，能够提供一个逃避大型食肉动物的安全庇护所。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更新世出现的日益寒冷的气候。不仅是母亲和孩子，还有成年的直立人，都需要一个抵挡寒冷气候的庇护所，在狩猎的探险完成后可以回归那里。

早期的原始人和他们的灵长目动物同伴相似，多数是直接暴露在大自然之中。有时在寒冷的或暴风雨的晚上，他们可能被迫在伸展出来的悬崖之下寻找庇护，在那个依然为其他动物所控制的世界里紧紧依偎在一起。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依偎在岩石庇护之下，或只是短时期进入山洞，那么这只是为了避免天气带来的临时的不便，因为他们知道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然后他们会回到开阔地上平常生活的地方。但是，中更新世的人不可能期望天气会迅速改善——一代又一代，天气都是寒冷刺骨，这时山洞的庇护成为必需。

相对于大自然中的其他因素，是火给早期人类提供了温暖，并且还有一种避免大型食肉动物的安全感。他把火带到他建立基地的地方，在山洞中创造了一个温暖而且光亮的区域，同时驱走严酷的自然条件、黑夜和四处觅食的野兽。人类祖先最先是在欧洲和亚洲极地和半极地地区开始经常用火来取暖的。在非洲还没有发现用火的遗迹。

p119

已知最早的用火遗址发现于法国的埃斯卡勒山洞（Escales cave），时间大约是七十五万年前，与北京人居住的山洞中发现的存火炉床大致是同一个时期。

山洞原来都是一些强大的食肉动物，如熊、鬣狗、狼，可能还有虎等的居所；人类要想占据这些洞穴，首先要把这些野兽赶出去。同时他还必须确保这些动物不会再回来，所以在入口处燃起火来。火不仅能提供温暖、抵御大型食肉动物、长期基地的安全感，还为人类带来了光明。火延长了白天的长度；夜幕降临后的时间就变成了消闲时间，这时候古人类就可以计划更多更复杂的活动。火边围坐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促进所有

群体成员——老人和青年——团结的凝聚力。那些年纪太大无法打猎的人们变得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记得很多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通过讲述很久以前的事情增加了群体的记忆存储；老人能够把那些古老的探险和技能传授给群体成员，提供了过去与现在的连续感。他的故事成为神话的核心，而这是群体心理凝聚力一个更深层的情感维度。他强化了想像力，这些想像使得日常生活的具体经验与精神事物结合在一起。他成为人们与其祖先的连接纽带，他也使先人的经验和生活对于当时的一代人变得真实。当这位老者去世之后，他们就会隆重地享用他的大脑，以确保他的记忆存贮继续存在，他的神话会永存。

p120 这种防止往事被遗忘，把往事保持下来并且使之成为现在的一部分的内部精神生活，因此得到增强，各种情感的心理表征也得到增强。例如，火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物体，而且也是在严寒的绝望和危险中代表着安全和拯救的符号。人们在心中把火想像成为温暖和光明的符号，把居住的洞穴变成一个完成狩猎之后可以回归的温馨的庇护所。火代表着家的形象，代表着母亲的呵护，女人的拥抱和迎接。

随着性别差异不断加大，女人在洞穴里呆着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后代的依赖性和无助状态的时间在不断延长。因此，女人与家的联系越来越强，越来越多地成为呵护和爱的形象。

但是这里我们再一次遇到男性具有控制力和支配力这一问题。当我们谈论性关系中的心理因素，谈到男性渴望女性，女性也渴望男性，这些因素确立了两性之间强有力的纽带的时候，我们引入了占有和嫉妒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那位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护整个群体的强大的男性，只与某位女性建立一对一的关系；他可能会为部落中很多女人所吸引，作为她们的保护者，他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她们的主人。他会对其他男性表示嫉妒，年轻的男性可能会威胁到他的妻妾，可能会挑战他的权力。我们可以观察在平原上生活的长臂猿的女眷群体，

或一位雄性主导的生育群体，很多早期人类的研究者都曾经援引这个例子，来说明它们与早期人类社会之间的诸多相似之处。

根据人类学家克利弗德·乔利（Clifford Jolly）的研究，居住在大平原上的吉拉达狒狒（Gelada baboons）与人类之间具有一种很重要的相似性，即都具有单雄性生育单位。J. H. 克鲁克（J. H. Crook）这么描述吉拉达狒狒的社会结构：“‘单雄性群体’是吉拉达狒狒的繁衍单位。它包括一位体型硕大的成年雄性和一群雌性狒狒，既有母亲，也有处于发情周期各个阶段未曾生育的雌性，还有大量处于少年、幼儿和婴儿期的狒狒，有时还会有一些半成年雄性，它们虽然身体已经完全长成，但是还没有达到性成熟。在狒狒比较分散的地方，这种社会单位是最常见的，它们时不时地与一些完全由高大的半成年雄性或成年但是不拥有‘妻妾’的雄性小群体保持联系。这种‘纯雄性’的群体也是独立于其他单位独自活动的，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凝聚力。” [（J. H. 克鲁克，p121《吉拉达狒狒的群体结构和迁移》（*Gelada Baboon Herd Structure and Movement*），动物学会研讨会（*Symposium Zoological Society*），伦敦，第18期，P237-258，1966]

这种社会结构正是弗洛伊德称为“原始部落”的结构，他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情况。这里也有这种专横的成年雄性垄断一群雌性，并且排斥那些年轻而性成熟的雄性；这些年轻雄性往往会被赶出家庭圈形成兄弟群体（即纯雄性群体），一个紧密团结的猎人团体，而那位专制的成年雄性则待在家中守护它的女人。

在狒狒社会里，以及在弗洛伊德所设想的原始部落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组织中的双层结构：一方面是在单雄性生育单位中，占统治地位的雄性发挥其专制的权力守护它的雌性群体；另一方面，还要把那些年轻的雄性——它的儿子们赶出它

的“卧室”和它的王国，迫使它们不得不在外面游荡，最后形成亲密联合的合作型狩猎觅食的单位。这种双层结构是弑父的基础，当兄弟群体对于女人的性需要变得无法抵抗，而除掉那位暴君是唯一能够得到女人的途径的时候，弑父就发生了。

7. 原始公社

吉拉达狒狒的妻妾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成员的心理特点，在很多方面都与受俄狄浦斯情结支配的人类的心理特点相似。表现为显著的不信任和焦虑，经常在打斗中爆发出明显的攻击性，经常由嫉妒引起暴怒。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必须不断以攻击方式来确定其权威，要常常与年轻的雄性打斗，尽管一直没有得到关于弑父行为的报告，但是一旦它老了，敌不过年轻的雄性时，它就不得不放弃它的统治地位。年轻雄性之间仪式性的较量之后就可以确定新领袖的诞生。虽然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文明化的意识已经压抑了很多情绪，现代人依然具有很多类似于狒狒的情绪特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生活在更新世时期的祖先的社会就必然与这些狒狒的社会结构相似，他们必然为俄狄浦斯情结所支配。事实上，人类祖先生活中存在着大量重要的环境因素，这些使得他们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群体结构。

p122

把年轻男性排除在父亲支配的群体之外，包括驱赶他们离开洞穴和生活中心的炉床的保护和安全，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很难在严酷的气候中，在凶猛的大型食肉动物的包围中生存下来。占据支配地位的男性的敌意，女性的拒绝态度将会改变洞穴的形象，使之从温暖的和性愉悦的象征转变成拒绝和焦虑的符号。如果在他从外面残酷的世界回来时，被剥夺了迎接他的温暖和亲切的家，他很可能会死于寒冷和焦虑。因此对于他而言，在冰川纪的大型动物狩猎活动中，要保证其心中拥有

一种团体归属感、一种凝聚力和相互的情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也是狩猎活动的领袖，这要求他必须参加狩猎探索活动，并且必须去教授和鼓舞群体中的年轻成员。他要成为纯雄性狩猎者群体的一员，作为他们的领袖要与他们建立起亲密的情感纽带，并且要激励他们与他建立一种认同感。因此他必须避免纯雄性群体和单雄性群体之间的冲突；儿子们必须与占据统治地位的男性建立认同，这样就不必忍受因为其敌意和嫉妒而造成的焦虑，也不必害怕遭到群体中女性的拒绝。这就意味着，如同现在的大猩猩群体，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对于年轻雄性的性需要持有一种非常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分享雌性所表现出来的性吸引，由此强化家庭和群体的温馨和团结。

p123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可以显著降低俄狄浦斯情结的动机，那就是原始人的性延迟很短，没什么潜伏期。现代人五六岁时的第一次发身期与十三四岁时的第二次发身期之间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上的成熟延迟导致的。精神分析的调查表明，潜伏期是一段性压抑时期，在她能养活自己并且为男性群体认可为成熟成员之前，她必须获得其文化中的技能和知识，并做好生育和承担一个家庭的准备。她必须等待八年左右的时间，通过接受培训和学习来简要学习民族文化成就。这八年的时间代表了浓缩的人类千百万年的收获，这期间他要学会读、写、用数字思考，掌握劳动技能，了解物质对象的特点和行为，了解本民族的历史和地理环境，并且掌握本民族文化的仪式和礼节。

在这段时间里，为了从成年男性——师长——那里学到知识，为了能够成为其中一员并且为他们所接受，男孩不得不服从并认同他们。在这段与成年男性认同的过程中，他的异性恋需要被压抑了，男性关系的同性恋模式表现为认同和内摄男性模式。

直立人需要学习的新技能和知识还是相对较少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相对”一词，因为对于年幼的直立人而言，学习当时所有的技能和知识所需要的努力一定已经相当有难度了），文化上的成熟与身体成熟之间的间隔较短。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潜伏期的长短来测量一种文化的复杂性和先进性。文化越高级越复杂，潜伏期越长，性压抑时间也就越延长越强烈。直立人性压抑的成分还很少出现，首先是因为早期性冲动在群体内部具有凝聚作用，因此得到鼓励或认可；其次是因为成熟期延迟并不是他们发展的主要因素。技能习得以及与成年男性的认同过程是不需要性压抑的。换言之，年轻男性达到性成熟时不必离开卧室——家（卧室和家是一个概念），当他学习其文化中的技能时，他也不必压抑他的性渴望。

8. 神话、上帝和道德

一种很迷人的说法是，当上帝向人类展示他自己，人开始意识到他的存在时，道德第一次出现了。

我们已经讨论过，先人的鬼魂和领袖及导师的灵魂，作为好的行为榜样，吸引和鼓舞着心理高级能力获取新的技能。而当他们所呈现出的形象不是使这个世界成为如今这般的一种存在，那么，他们在社会精神中的存在就会是不朽的。他们并未被看作是宇宙的创始人。另一个方面，上帝，既是导师又是万能的造物主。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智慧和能力超越了我们的理解，他的精神范围是无边无际的。然而，在人类历史中，我们一直在不间断地尝试为他勾画出一个可视的形象。许多神话和宗教将他描述成人的形象，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巴比伦、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文明之中。这些各种各样神的形象都有一种性格、个性和一个自我，我们将我们自己的愿望、渴望、希望和恐惧、爱与恨、战争与和平都投射到了这个自我上。

诸神与其被看作是运动感觉的外化，倒不如说是自我的各种心境和特征的外化。人的心理投射到一个外部生命，他在我们之外，在一个不同的王国，却能够控制、教诲和惩罚我们。就如同自我必须解释和判断来自于头脑较老区域的各种形式的本能驱力和冲动，上帝或诸神表现了我们内心世界的统一，也表现了周围世界的统一，并按照他们的目的和计划赋予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以意义。这样说或许有些冒昧，但我们的确可以把上帝称作一个心理工具，他创造了一个浅显易懂的宇宙，解释了我们所感知和遇到的各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如果我们不顺从他，不对他顶礼膜拜，他就会发怒；他强迫我们进行宗教仪式，而且必须严格遵守，否则就让我们内疚和害怕。然而，受到某个生命的庇护毕竟还是令人宽慰的，而且他无所不知，控制着生和死、疾病和健康、贫穷和富有，我们与他的关系是完全暧昧的。

p125

他使我们怀疑我们罪孽深重的本性，而我们又怀疑那些不崇拜他的人——这“另外的那些”代表了我们自己的不顺从——我们会视他们为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压抑我们自己的罪恶欲望，并与之斗争。

这于是成了困扰人类存在的一个问题，它把人变成既是天使又是魔鬼。然而，与其向上帝和神圣天国询求人的心理注定分裂的解释，还不如我们实际一点，回到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去寻找答案。

9. 拜神和赎罪仪式

最早需要向逝去的先人和杀死的动物赎罪的“征兆”可以追溯到出现于十一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他们的工具大部分都是从石核上敲下来的燧石薄片，将其打磨成箭头、刀子和刮器。凭借其敲击薄片和削边的新方法，尼安德

特人发起了一场工具制造工艺的革命。他成为了最高效的猎人，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技术上，他们都很好地适应了最后冰河期的北极环境，他们大量散布在地球的许多地区。

p126 大约是九万年前第四次冰川期或所谓的玉木冰川期，尼安德特人已经确立其作为主要人种的地位，从欧洲一直延伸到东、中亚和中国。关于这个时期的记录表明，人类具有超常的适应能力，以及在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超常的生存能力。事实上，最后的冰川期可能是整个更新世时代气候条件最为严酷的时候。冰袭击了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并且一路席卷了阿尔卑斯山，然后越过它进入阿尔卑斯山区南部区域。这样就把整个中部欧洲变成了冰雪的世界。

然而，由于冰吸收了很多水，这种极度寒冷的气候条件却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大海和河川的水位，显露出大量的山洞，尼安德特人充分运用了这些山洞。因为他们具有轻松生火的能力，并且拥有高效的武器，他们占有了洞穴来保护他们免受凶猛动物的攻击，同时努力获得某种程度的舒服和安全感。这些暴露出来的悬崖和洞穴为他们制造工具和建立庇护所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他们所制造的工具也使得他们能够用动物的皮毛和皮革制造衣服。但是如果不储存食物和燃料，生存也还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储存和积攒财产的需要对人类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主要作用。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直立人是我们真正的祖先；他们为我们人性特征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为他们存在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大概超过了六十万年，我们必定有许多他们的特质，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的心理生物系统中，尼安德特人奠定了宗教崇拜的基础。

在尼安德特人洞穴中除了发现惊人的工具宝库之外，洞穴的布置和“家具”可以说是更加引人注目，因为这表明，在尼安德特人的生活中，文化和宗教仪式已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石板铺成的地面，工作台、长凳、祭坛，还有丧葬的地

方，放着他们自制的仪式器具。人类已经开始直面死亡的神秘了，无论是关于在狩猎过程中杀死的动物还是死去的祖先。他举行丧葬仪式，相信个体死亡后会依然存在，他希望确保逝者都能够进入供应齐全的新的生活。与吃掉先人的大脑与其鬼魂产生认同的仪式不同的是，尼安德特人在想像中与先人认同，给死者准备工具、武器和其他财产以及食物等，以便他们在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的旅程中享用，保证他们能够进入另外一个精神的永恒世界。

p127

在尼安德特人居住的山洞里发现了很多丧葬遗址，这些遗址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证明了他们对于死后生活的关注。在穆斯特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大约十五六岁的男孩被埋葬在那里。一堆燧石放在他的头下形成了一个石枕头的样子，在他手边放着一把制作精美的石斧。遗迹中有一些野牛骨头，很多都已经被烧焦了，这些烤肉的遗骸大概是被用来保证他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里的食物供应。大概是在六万年前的一个春天，他的家人到山野里为他采撷了很多的野花，在地上铺成了一个花床作他的安息之地。其他的野花可能放在他的坟头，似乎还有一些花用松枝之类的东西穿在一起做成了花环。

野花和那些工具表达了他们对于死者的爱，埋葬在坟墓里的食物和工具确保死者的安全。

这种对死者的关怀，表明了尼安德特人的心理有了一个重大的飞跃。他已经发展了一种精神能力，这归功于他的脑量（介于1200毫升到1600毫升之间），特别是用于想像的顶叶和枕叶的显著增长。

在法国南部多尔多涅省的拉·费拉西（La Ferrassie）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两个成年尼安德特人和两个孩子被隆重地埋葬在这里。其中一个年长者，可能是个女人，以一种蜷缩或者折曲的姿势被放入地上挖出的洞里，腿蜷缩着，双臂抱在胸前，这种姿势只可能是在尸体僵硬之前用皮带紧紧捆绑所致

的。另外一个成年人，可能是个男人，头和肩膀有几块石板保护着。两个孩子也是仰卧着，躺在较浅的坟墓里，附近的洞里放着一头野牛的骨头和余灰，这便是用来维持他们“征程”的食物。

p128 在这些丧葬仪式中存在着矛盾的情感，对此我们不应该忽视。在拉费拉西山洞中把下肢折曲的方式——这种方式很可能是用皮带把下肢捆绑起来导致的——在尼安德特人的做法中是非常常见的，甚至远在克里米亚的基伊克-科巴以及巴勒斯坦的卡尔迈勒山上都有发现。对此有不同推测，有人认为这种做法可能表明了象征胎儿姿势的愿望，有人认为以此来避免死者回来纠缠活着的人们。不过我们可以假定，用皮带捆绑下肢是一种防御机制——是一种阻止死者回来的需要。他们一方面关心死者未来的旅程以及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安全问题，同时也害怕他的鬼魂回来。阿伊努人的丧葬仪式是这样结尾的：“等到主持者对死者讲述完他的指引语和保证之后，棺材不是从门口抬出去，而是把房子的一边拆掉，在送葬者回来之前重新修好，这样鬼魂就不知道该从哪里回来了。等所有的丧葬仪式完成后，送葬者倒退着离开坟墓，如果转身的话，他们就会被死者的鬼魂缠住；同时他们手里紧握着武器——女人拿着棍子，男人攥着剑——他们前后挥舞这些武器来保护自己。”[约瑟夫·坎贝尔 (Joseph Campbell): 《上帝的面具：远古神话》(The Masks of God: Primitive Mythology), 1973]

对死者去另一个世界的旅程安全的关注与对他可能回来纠缠生者的担心之间存在的矛盾情感说明，他们不仅有永生意识，也已经有了负罪概念。也就是说，仪式中对他安全的安慰和祈祷是为了确保他对生者的善意，这样他应该对生者表示感激并且对他们持有好感，而不会心怀憎恨，不再回来惩罚他们。

在确保死者将来生活的仪式上，送葬者通过与死者灵魂共

同的认同，参与了他持续的存在，并由此保证了整个群体有了一种不朽的感觉。这个群体，即祭拜死者的团体，获得了死者的永生，而通过表现出他们对死者的爱与关怀，确保了死者对他们的善意与爱。先人的灵魂会对我们非常友好而且没有怨恨，一旦他发怒，他会令整个团体感觉不安，会产生集体的焦虑、紧张、恐慌和忧惧。所以，我们尊敬他，让他感受到我们的爱，这是为了换得他的爱让我们心安。

p129

这些早期的丧葬仪式既显示出人们对同伴的关心又表现出了对罪恶感的安抚。通过丧葬仪式保证了死者未来的生活，追悼死者的人们也参与了他持续的存在，因此也缓和了因为他的离去而造成的震撼，同时也克服了某种担心他可能会回来惩罚那些曾经诅咒过他的人们的恐惧心理。

对邪恶的和善良的鬼魂的矛盾心理、投射过程以及赎罪和补偿，在后来普遍流行的动物牺牲仪式和原始图腾崇拜仪式中，得到进一步表现。这些仪式是尼安德特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这种崇拜有着丰富的记录证据。在尼安德特人作为图腾崇拜的动物中，最常看到的是洞熊（cave-bear）。尼安德特人在搬进山洞之前必须把这些动物赶出山洞；它们被成百成百地杀死吃掉。实际上它们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它们可能被看作是洞穴原来的居民，是洞穴原来的主人，所以洞穴里应该保留一些熊的灵魂。在奥地利东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地窖，里面存放着七具熊颅骨，全部朝向洞穴入口的方向；而在法国南部勒古东附近一处遗址发现了已知最为精致的熊崇拜埋藏。其中包括一具骸骨，一些石头排水沟，一个重达一吨的石板盖着的长方形地坑和近二十头熊的遗骸。德国靠近凡尔登的彼得舍赫勒的一处山洞（挖掘工作开展于1916年到1922年）的墙里嵌有一些壁橱似的壁龛，每个壁龛里摆放着五具熊颅骨和一些腿骨。我们在这里看到祭坛似的结构上摆放着洞熊的遗骸，似乎是以某种方式来崇拜它们，或者至少是保

留下来作为对它们持续存在的纪念。对被猎杀吃掉的动物一定要进行赎罪仪式，这样它的愤怒就不会侵入猎人的心中。然而如果熊被杀死吃掉了，它善良的灵魂还会保持，依旧会占据着猎场和洞穴。人们邀请它回来并且给它设立祭坛，它的灵魂会遍及整个洞穴，并且会保佑洞穴的居住者。

人类依赖那些被猎杀的动物，它们在人类的想像中占据重要地位。动物是重要的，人们想要它们，甚至爱它们，因为它们供给人类食物。为了获得食物就必须猎杀动物，但是这些食物不能含有动物的愤怒和痛苦，要确保它善良的力比多的存在。它必须是好的食物，不能是愤怒的食物。被杀死动物的灵魂必须得到抚慰，使它爱猎手，并且作为好的灵魂进入猎手体内。人必须确保体内的物体是好的，而不是愤怒的，是被认可和可以接受的。我们不仅吃动物的肉体，也吃它的灵魂、它的心理状态；如果我们摄入了一个愤怒的动物——不好的食物——我们或许会有罪恶感、肠胃溃疡，或是感到紧张和焦虑。（精神分析提供了很多这样的实例，不快乐或拒绝母亲喂养孩子，会使孩子产生不快和冲突）。另外，人类要确保吃掉死去的动物后，动物不会消失，而是永远存在。通过对死亡动物的灵魂进行仪式化表征，使动物得以永生，并且永远提供安全保障。动物会同时处于人类的体内体外，在确定了其特殊地位之后，它将会变成好的具有保护作用的灵魂。

尼安德特人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人造崇拜的遗迹，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假定，在他们进行赎罪仪式的时候，同时伴有礼仪性的歌舞。因为他们还不会雕刻形象或绘画出形象来，所以他们很可能把熊的脑颅和骨头按照某种仪式性的方式加以摆放，然后围着这些骨头跳舞，也许同时还会进行一些礼仪式的吟唱，用这种方式来确保自己得到动物美好的祝愿，并且以此来确保它能够永久长存。

毕竟，对已故先人和被宰杀动物的膜拜并不意味着就有了

一个创造万物的上帝的概念，这个上帝以他的意志和万能力量按他自己的想像创造世界。尼安德特人虽然是装备精良和高效率的猎人，却不是发明者和创造者。他能够进行万物有灵论的思考，藉此自然界的物体都获得了灵魂和活生生的感觉。另一方面，他毕竟还没有能力履行塑造无生命物体的任务，他还不会雕塑和绘画。他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尝试新的可能性。

p131

如果我们研究典型尼安德特人的脑颅骨，我们就会发现其大脑前区要比智人的大脑前区小很多；但是顶叶和枕叶却相当大，实际上与智人的一样大，如果不比智人的更大的话。我们前面已经讨论过，大脑皮层的额叶和前额叶区主要掌管智力活动，预测、规划、预期、目标定位、进行试验等能力以及与抽象观念相关的规则概念等，而顶叶和枕叶区掌管感觉输入和输出的协调控制、视觉想像、身体感觉和身体意识等。

我们因此可以推测，尼安德特人思考抽象观念的能力，预先制定计划和进行试验的能力，都是非常有限的。他的技能只能依赖于他对物体对象的实际经验，他还没有得到灵感获得一般规律的概念，也没有悟出抽象的观念支配着事物的运行。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代（François Bodes）对尼安德特人的工具进行了分类，其工作的细致程度别的研究者无人能及，他不仅为尼安德特人的手艺所震惊，而且也惊奇地发现尼安德特人的手工匠们用一种几乎自动的方式工作，仿佛他们已经把他们的技巧发展到完美极致，然后便停止了创新。

至于上帝形象和形而上学的出现，特别是普遍道德观念的产生，我们必须研究智人和农业的发明。

有趣的是，采集和狩猎文化没有产生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形象，而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神明和精灵，他们象征着自然界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某些方面，能够激起强烈的情感。得到灵魂的物体有着或善良或邪恶的魔力，人们通过哀悼仪式、咒语、歌唱和跳舞与他们认同，感化他们去帮助人们。这些仪式

p132

化活动本身也得到了神秘感。能够感化神明，唤起他们的善意或是转移他们的愤怒的人获得了神奇的力量。

随着智人的出现，神奇的力量在雕刻和绘画中被表现出来；以可视的方式重现了表象，如同我们能够在岩洞壁画那些非凡的、令人畏惧的祭仪中看到的。若想获得更多的早期智人文化的详细资料，请参阅我的《心灵考古》（*Archaeology of the Mind*，Open Gate Press）。

在欧洲，被赋予智人属这一术语的最早的代表是克罗马农人，是根据1875年在莱埃济（Les Eyzies）附近的克罗马农山洞的发现地命名的。随后发现了很多其他的遗址，都属于这个人种的早期代表，尤其是在孔布-夏珀勒、莱埃济以及多尔多涅山谷也有很多发现。莱埃济曾被誉为欧洲的史前之都，因为这里是这个地区的中心，尤以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的遗址和人工制品为多。在玉木冰川期温暖的间歇时段里，威泽尔（Vézère）河流域和多尔多涅地区是狩猎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长满云杉、橡树和白蜡树的森林，还有一段段狭长的植物带环绕着森林，吸引了很多的驯鹿、野牛、大量的啮齿类动物及羊群。这里有足够充足的猎物供应，充足的水源，还有森林可以提供大量木材，而这些新的人类已经懂得怎样用那些锋利斧头砍倒这些树木了。

克罗马农人被描述为高大英俊，棱角分明，前额高耸，下颌突出，牙齿很小，面部骨骼纤细，不再有尼安德特人及以前人所特有的发达宽大的眉脊。毫无疑问，他属于高加索人。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关于这个人种现在已知的唯一的一幅画作的话——这是位于盎格鲁-索-郎林（Angles-sur-l'Anglin）的一件小型浅浮雕，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该人种与早期人种之间存在明显断代。那笔直高耸的前额，不再突出的眉骨，挺直而窄窄的鼻子，白皮肤、黑头发、黑胡须，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现代白人的形象。他的工具和器具代表着一场技术革命；这些

工具说明，制造者能够从石核上敲下碎片，做成刀刃；这些刀刃惊人的精细，他们制作的刀子细薄而且锋利，他们制作的矛头都是按照一种模型精确打造的，表达了对称的概念，即便是现在，我们依然认为那些矛头和箭头的制作是十分完美的。他们把石头压缩打击，制作成异常锋利和细薄的矛、刀片、刀子、刮削器和磨光的斧头，是任何旧石器文化都无法媲美的。此外，他们用野马和牡鹿的骨头和猛犸的象牙来制作尖锐的钻子、箭头和针。这种新的工具制造文化被称为奥瑞纳（Aurignacian）文化，它不仅是对旧的工具制造的改进，而且也是工具质量上的一次革命性的飞跃。奥瑞纳人在矛头上打个孔，用皮带将矛头固定到矛杆上。他可以随身携带很多矛头，这样可以猎杀很多动物而不必回家去取新的武器。

p133

也许他们最重要的技术发明是一种叫作鏊刀的工具，这是一种特殊的用于镌刻的工具，能够对骨头、琥珀和象牙进行非常细致高效的加工，这种水平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的人类。鏊刀是一个制造工具的工具，其基本的形状和原则现在依然应用于机器工具中的切割刀。它是所有机器工具的原型。鏊刀还促进了用石头和骨头制作大量家用器具的发展，针和尖锐的钻子这两种工具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用动物皮毛制造衣服和小棚屋的技艺。这样人类史上第一次可以人工建造永久的家，以此来代替洞穴，为人类提供温暖和保护。

10. 母权制：智人的原始文化

克罗马农人除了取得奥瑞纳文化的技术进步，同时也在人类文明中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他用象牙和石头雕刻出了大量的雕像，多数代表女性形象；并且他不仅雕刻现实的形象模型，也雕刻抽象的观念模型。这时候就产生了一种把符号概念具体化的崭新的能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艺术。毫无疑问，

p134

这种新的符号表征维度是受到一种新型的心理能力的激发，并且得到了新技术的帮助。鐮刀不仅使得人们大大提高了工具的精确性和效率，也同时促使他们可以制作精确细致的雕版和雕刻。

雕像描绘的多数是女性，并且常常过分夸张其性特征，毫无疑问最初它们都是一些崇拜雕像。有趣的是，它们通常没有脚，腿的末端是一个尖。这说明它们最初是被放置在家中的神龛之类的地方，被插入地里的。它们不是象征某个女性，因为雕像的脸部是有意做成空白的，但它们可以用来象征肥沃、安全和丰富等符号概念。根据大量几乎无一例外的女性雕像，以及与近年所发现的母权文明很相似的营地建筑结构，我们可以肯定地做出推断，现在我们讨论的是母权文化。智人所引入的不仅是技术的革命和人工住所的发明，而且还有母权制的社会和心理结构。

在新的聚居地，女人开始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她们变得更加富有生产力。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女人拥有了更加广泛的活动范围，她们能够接管更大领域的必要的社会工作，包括种植水果和蔬菜——她们是园艺学最早的创始人。随着狩猎工具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男人们会向更远的地方探索，可能会长期在外，女人们留在营地里，不仅仅是照顾小孩和等待男人们回来，还要制作各种各样的器具。针的发明使得她们能够用动物皮毛缝制衣服，制作棚屋的屋顶等。这些活动会突出女性在生产活动中的重要性。

p135 定居点里有相当多的茅屋环绕着一个开放的庭院，随着聚居地的不断扩大，社会生活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女人们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从事多种不同的活动，这样孩子们就发现母亲的注意力不再完全专注于他们身上了。智人公社中的新女性凭借自身的权利成为独立的个体，可以说是一个单独的人；她不再像过去在山洞时那样只是一个母亲了，她也是一个对社会负有

责任的个人。村社型社会吸收她参与更多的责任活动，孩子和丈夫必须与那些完全陌生的人们分享她的时间。智人利用他的新技术——他的“生产方式”——所取得非凡成就创造了一个别样的环境，也使得在他的情感期望中产生了一个危机。他必须要面对他自己制造的新环境。这样，希望得到母亲全部的力比多和关注包围的自恋需要便会遭遇分离和不安全的创伤。这种分离的创伤记忆会一直保留在成年的智人心里。当他狩猎归来时，他再也不会受到洞穴之家——弥漫着女人的力比多并象征着她的拥抱——的专一的迎接，相反他会看到女人在忙碌活跃地组织着村社聚居区人们的生活，从事不同的工作，被女人群体所吸收，在男人们不在的时候组织村社的生活。

于是，无论是孩子、男人，还是男人心中的孩子情结，都会充满重建失去她的爱与她的陪伴的魔力欲望，他会建立起她的形象，让这些形象所代表她的力比多围绕在他身边。用这种方式，母亲的精神重新变得无所不在，会一直守护着这个家。在洞穴群体生活中所得到的固定的与女性的亲密结合感，在更大更复杂的聚居世界和村社群体中遗失了，因此不得不通过符号化表征加以重新创造。智人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特别强调性特征，是为了确保他们能够永远拥有女性的力比多。同时，因为人们已经失去了在洞穴亲近的关系圈中所得到的亲密本能的自我认同感，以及母亲自发的毋庸置疑的认可，他制作自我符号，以此来满足自我的自恋的需要；他把自己的身体涂上各种颜色和各種抽象的图像，以表明他个人的特征，也表明自己属于新的公社。他把自己装饰起来，给自己涂上新的肤色，以此来弥补其被剥夺的自恋力比多。克罗马农人已经开始使用化妆品，并且制造了已知最早的珠宝。他们穿着饰以一串串彩珠的衣服，佩戴着象牙手镯和穿孔的牙齿与鱼椎骨制成的项链。这些制作精美的装饰与社会复杂程度总体增加有关，也与大型集体狩猎方式的兴起有关。根据约翰·E. 法伊弗观察结论，珠

宝可能不只是为了美化，可能当群体太大，个体难以通过容貌或名字来识别彼此时，还有助于确认人们的家族及其地位。

由许多家庭组成的村社群体具有部落的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说，部落试图恢复在洞穴生活时的那种紧密的圈子。失去了母亲主导的洞穴中封闭的安全感之后，人们在想像中复制了这种安全感。他在周围划出一个圈，不仅包括新的聚居地，也包括外面狩猎者的世界，而新的聚居地因此变成了新的受到母亲保护的公社。因此，整个知觉到的自然界、天空和地平线以及大地，还有大地上生长存活的万物，都为母亲的力比多和她的存在所围绕。大地上所生发出来的植物和树木、花朵与河流等等都是一个崭新的延伸的家庭，他们都是母亲的孩子，充分展现着母亲的生命力和力比多。这个世界便会充满了仙女、鬼怪、精灵和守护神等；阳光和春夏时节的郁郁葱葱会被认为表达了母亲喜悦的情绪，而严寒和雪，无边无际的冰和冷酷的寂静，毫无疑问地被认为表达了母亲孤独平静的神秘。

奥瑞纳的壁画尽管毫不粗糙，也不是做得不好，但都是直线，有时甚至有些僵硬，可是绝大多数的骨头、象牙和石头塑像却都是极其精美的。从比利牛斯山穿过欧洲，一直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一带，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塑像作品，说明这些地区具有共同的母神文化，并且这些作品在制作技术上惊人地相似。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维伦多夫的维纳斯——一件石头雕像，发现于奥地利格拉维特时期的一处遗址。作品上残存的涂抹痕迹表明雕像原来覆盖过一层红赭石。对头发的精确刻画与脸部的缺失成鲜明对比。

很多古生物学家把史前艺术分成家庭艺术和洞穴艺术（又称壁画艺术）两类，也就是说一种是放置在家中的雕像、雕刻和绘画等，另外一种绘画和雕刻作品在本质上是洞穴的一部分。上面提到的雕像和刻画都应该属于家庭艺术，因为它们

是村社群体生活的一部分。

就这样，建立在家庭或是扩展的家庭基础之上的洞穴原始社会，让位给了新的文化符号聚集起来的复杂的社会组织。人类发展了各种偶像，即各种各样的雕刻和绘画，这些偶像具有神圣的象征意义，是崇拜的对象。他的文化属于一种母权秩序，其公共的组织建立在女性权威的基础上。

对于早期智人的分类主要是根据其工具制造技术进行的，分成下列几个重要的文化时期，后面的时间是在欧洲大致延续的时段：

佩里戈尔文化——根据包括莱埃济在内的地区命名，约35 000—22 000年前。

奥瑞纳文化——根据比利牛斯山脉的奥瑞纳遗址命名，约35 000—20 000年前。

梭鲁特文化——根据法国中东部地区的梭鲁特村附近广阔的露天遗址命名，20 000—17 000年前。

马格德林文化——根据距莱埃济大约三英里外的马德林岩壁命名，17 000—12 000年前。

11. 洞穴神殿的艺术与文化

从家庭艺术（即摆放在表面或雕刻到石头墙上作为神祇的视觉表征的雕像、浮雕和绘画等）到洞穴艺术的转变发生在大约一万八千年前，即玉木冰川期的寒冷天气再次出现的时候。这时候洞穴再次成为安全庇护的中心，但是这一次有所不同的是，人类掌握了在棚屋聚居地的生活能力，同时他把他的女神摆放在洞穴之中，于是洞穴就成为了女神的圣堂和祭坛。

智人在技术和文化方面，以及大规模狩猎的方法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尽管有些人某些时候还会偶尔住洞穴，但多数情况下，他们还是居住在精心建造的棚屋组成的人造聚居地。这种棚屋与现在西伯利亚猎手，北美爱斯基摩人所使用的小屋非常

相似。事实上，克罗马农人的聚居地、小屋和衣服等都与现在的极地的猎人们很相似。在大型洞穴的壁龛里人们绘制出狩猎的景象和动物，那些伟大的容纳着他们的艺术和宗教的神庙常常还有人居住，但是放置着人们杰作的主要殿堂已经变成了不可妄入的神圣殿堂，这部分建筑是与日常生活世俗的居住之处分隔开的。

在洞穴中创造这些绘画和雕刻的艺术家表现出相当的多才多艺，考虑到他们所能够使用的方法，他们所达到的成果就已经是极为卓越的高水平了。绘画是通过把手指或者是某种刷子，或是一束羽毛或动物皮毛浸泡颜料制作的，或者通过管子吹颜料来完成的。现存的唯一颜料就是一些矿物质，如用赭石来制成红色、棕色和黄色，用锰做黑色。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曾经迷惑了几代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现象。在西欧马格德林文化中，绝大多数洞穴彩绘和雕刻不仅位于洞穴很深的洞室里，而且进入的通道常常都是艰难而且曲折的。是什么动机导致了他们的这种做法，又是什么样的心理与文化进程使得马格德林的艺术家们要把他们的杰作画在深得几乎不得入内的地方呢？

p139 如果我们把马格德林文化中的神秘礼仪看作是表达补偿过程的话，这个问题可能就会相对清晰一些了。通过给母亲提供她最想要的物体，这样她就会满意，就会充满爱心，然后会乐意保护男人。这说明，马格德林人在他们与母神的关系中已经开始体验到一种负罪感和焦虑感，一种与母神的隔离感和疏远感，这种感觉超过了前所已有的所有文化。母亲与孩子、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紧张一定是在日渐增强——大概是在一万八千年前，这激发了马格德林人创造出伟大的艺术作品来表明对她的虔诚，这也是一种对母权超我（maternal superego）的补偿活动。

在法国尼欧洞（Niaux）发现最早的洞窟艺术的痕迹，位

于入口 500 码远的地方。在该地区发现的其他洞窟艺术的代表有的深达 1120 码。

在阿西 - 索 - 库尔一个相对较小的洞穴，必须穿过一个长达 100 码的管道样的隧道才能进入，隧道仅容得下一个人爬进去。一个人必须先把头探进去，然后在泥泞的地面上像蝓蝓那样蠕动着前进。因为四面都是坚硬的岩石，并且脸距离泥水只有一英寸左右，甚至有时候脸就贴在泥里，所以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伟大的史前艺术的探索者之一，考古学家亨利·步日耶 (Henry Breuil) 曾经被卡在这个洞里，不得不通过别人的拖拉和推进才通过。这是他探索过的最后的洞穴之一。] 所以你可以想像，马格德林的艺术家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工作需要面临多大的困难。他们常常把他们的杰作画在一些不仅难以进入，而且非常狭窄的地方，这迫使他们以一种非常别扭的姿势工作，或者挤在狭窄束手束脚的角落里，或者是在深坑上方的狭窄的平台边缘，要么就是在坑底工作，需要攀登才能出去。

类似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引人注意的是，要进入这些地方，都必须经过一条长长的而且通常都是曲曲折折的通道。虽然这一现象一直被看作是史前史中最令人迷惑的一个方面，但是同时，它可能也提供了理解这些洞穴圣殿的象征意义的钥匙。它们的深度隐秘性与狭窄的通道结合起来，创造了母亲的子宫与通向子宫的阴道形象。男性必须迂回曲折地通过女神的阴道通路，才能到达她神圣的子宫并献出他的种子；他要向她贡献出自己的热情以及这热情的产物，这样母神就会把它变成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从针对个体的分析了解到，通过阴道进入母亲身体的幻想在很多男人的无意识心理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如果母亲没有完全承认他们的男性特征，这会让他觉得自己的生殖器机能不全，这种幻想就更加明显。如果母亲对于他而言是

庞大的、难以亲近的、冷淡的，并且他的男性身份也不为她所认可的话，那么整个身体就会转变成为阴茎符号；而他就变成了阴茎体。阴茎进入阴道的幻想就转变成了整个身体进入母亲身体的幻想，用这种方式来获得母亲彻底的接受和器官上的满足。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自恋心理和生殖器性欲的结合。

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窟、拉斯科（Lascaux）洞窟、尼欧洞窟、佩舍默勒（Pech Merle）洞窟、泰伊贾特（Teyjat）洞窟、哥摩（Font de Gaume）洞窟以及其他许多洞窟都画着狩猎动物：红鹿、野牛、披毛犀、红色雌鹿、毛象驯鹿以及野山羊等。这些动物绘画显然是猎手们最渴望得到的东西的表征。我们全能的想像力使它真实，它的灵魂存在于我们的力量之中，并服从我们的意愿。因此，艺术和巫术结合便实现了我们的渴望，驱除了我们的恐惧。但是巫术需要得到神的认可才能神化，因为自我的力量是能够被摧毁的，如果超我，即神或女神不保佑自我，自我的愿望就无从实现。所以巫术行为必须得到万能的神的同意，实际上，这些巫术行动必须贡献给他或她，因为造物的力量和实现愿望的力量都在神那里。

我们不能不问，这些被放置在如此隐秘深藏的圣堂里的杰作，还有它们符号化的祭礼是如何为公社所知道的呢？如果只有艺术家-巫师能够看到这些杰作，能够体会到这些杰作的力量的话，那么他代表公社进行如此精心的巫术活动又有什么意义呢？

可能如许多作家提出的，这些洞穴是用来举行成年仪式（initiation rites）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当这个艺术家在代表群体向母神表露愿望，或者说向她坦白灵魂的时候，群体中每个成员都以某种方式参与了他的努力。即便人们都会把圣堂看作是神圣而且隐秘的，但他们应该知道这个地方，可能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个关键时刻，尤其是在成年仪式上，他们要进入神庙。在成年仪式时，年轻人很有可能也要体验一次艺术家

进入母神秘密住所的勇敢，也要体验一下与母神接触时的迷醉状态，从而证明他已是成人，值得她的保佑，再回到地面公社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完全成熟的人了。

12. 母权制的危机：女神变成女巫

马格德林时代快结束的时候，绘画和雕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些作品开始变得棱角分明而且模式化，马格德林中期盛行的绘画中的圆形轮廓，以及抽象雕刻中环形波浪的形式，让位于更加生硬的形式：用线条来代表刺杀动物的矛、箭和标枪，直线、正方形和三角形代替了早期更为协调的符号。原来的艺术意象的感觉现在变成了紧张、侵略和不安的混合情绪。其中所刻画动物被矛枪扎在身上，伤口张裂着流着血。猎人只是个骨瘦的人形，没有血肉和颜色。猎人与动物之间安详共生的图画已经为进攻型—施虐型的图画所代替。（同时期艺术的相似性是明确无误的）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形象象征着一个从呵护备至、充满爱意的母性形象向一个愤怒的母亲神像的转变；她变得恶毒和易怒，在男人们中激起了焦虑、紧张和阴茎攻击驱力。

伟大的马格德林文化很快地从世界上消失了，但是愤怒的母亲神却得到了普及，她的统治遍及其他的文化和种族。那种把具有保护性并赋予生命的母亲变成巫婆似的神的条件在智人的社会中依然普遍存在，因此导致了我们的文化被血腥的牺牲仪式所支配着。

我们应该有理由这样推测，母神形象的这种戏剧化转变一定是根源于对现实母亲的态度转变。

聚居地越来越大，女人在聚居地中的权力不断增强，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新的活动和责任，狩猎武器的效率也大大增强，因此男人远离村社聚居地而滞留在外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有

这些综合的结果不仅造成了男女两性之间的分离感，而且也导致了两性之间的疏远。男女两性之间双向的感情不再是融合群体的凝聚力和纽带了；事实上，群体的组织结构瓦解了这些感情纽带，其结果导致女人一方面在村社中拥有了更多的权力，另一方面会有更强的受挫感，也更加充满敌意。感觉到女人这种前意识愤怒的男人们就会迫使自己更加独立于他们的女人，因此会在猎手的男性群体中寻找同性恋纽带，慢慢地这种男性群体就会变得更加自给自足。反过来又促使女人们变得更加愤怒和妒忌，直到最后，她们在男人的想像中变成了巫婆形象，形成一个充满憎恨和复仇欲望的女神形象。她因此变成了愤怒的母权超我的形象。然而虽然母亲的温暖和关于女性精神力量的概念依然支配着男人的头脑，但是他们开始害怕女性的愤怒，而她控制生死的权力因此就变得危险而且恐怖。

在世界很多地方的古老民族中间，有很多关于仁慈的母神转变成危险巫婆的传说和神话；这些传说和神话很常见，而且流传广泛，是不能忽视的，它们清晰地反映了史前时代的一个心理-文化事件，一个重要的转变。卢卡斯·布里奇斯（Lucas Bridges）这样描述了在火地岛上的奥纳人中这个心理-文化转变：

“男人们生活在恐惧和屈从之下。他们当然也问自己：他们的武器在对抗巫术和疾病时有什么用处？女人们有特别的小屋，没有哪个男人敢靠近那座小屋。当年轻姑娘快长成女人的时候，会有人教导她们学习魔法，学会如何使那些让她们不高兴的人们罹患疾病甚至死亡。女人的专制开始变本加厉，越来越严酷。终于，男人们意识到，死去的巫婆会比活着的好些。这个传说讲述了男人如何密谋要杀死所有的女人；紧接着是一场大屠杀，没有一个女人能逃此劫。即便是刚刚开始学习巫术的年轻姑娘也一并被杀死了。”

同样在雅甘人中间也存在类似的传说，雅甘人是位于奥纳

南部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他们的传说中也认为，最先是女人通过巫术和狡诈伎俩来控制整个民族的。“根据他们的传说，”布里奇斯先生说，“男人们掌握权力的时间还没有多久。”（约瑟夫·坎贝尔：《上帝的面具：远古神话》，1973）

在纪录女神古老的统治的时候，简·埃伦·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发现，“在希腊节日和神秘崇拜中保留了很多前荷马神话的痕迹，那荣耀之地不是由阳光灿烂的奥林匹亚山上万神殿中的男性诸神掌管，而是由一个象征着阴暗不祥的女神掌管，她有时化身为一个、两个、三个或很多女神出现，她是生命和死亡之母。她的配偶一般被描写为阴险的人；她的祭奠仪式不是本着快乐的精神：体育运动、人文艺术、社交愉悦、盛宴和剧院演出等，现代人通常会把这些活动与古典希腊联系起来，其祭奠形式是本着黑暗和恐怖的精神。供献的祭品不是用花环装饰的母牛，而是猪和人类；不是举头向上迎着阳光，而是低头垂首向地；也不是在彩霞满天的清晨祭献在光滑的大理石庙堂上，而是在黎明将至前的树丛中或野地里，在深沟之上祭献，那牺牲的鲜血直流入无底深渊。这里被崇拜的不是具有理性和人性的遵守律法的神，而是一种模糊的、无理性的并且多数怀有恶意的鬼魂和妖魔，它们还没有被明确地表达为属于神的范围。[简·埃伦·哈里森：《希腊宗教研究绪论》（*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普林斯顿，1991]

第五章 上帝诞生于人的心灵

1. 对母权制的反抗和农业的起源

在最后一次冰河晚期，马格德林人追随着后退的冰川以及他们所狩猎的动物迁移到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总称——中译者注）、不列颠群岛（当时还与欧洲大陆接壤）、德国北部、斯堪的纳维亚以及俄国大片连绵的半极地区域，直到乌拉尔山及其山外的地域。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人则向南迁移，与在北非生活了几千年的当地居民混合而居。这两个不同方向的移民在随后的千年里慢慢形成了西方文明的主要文化。

北部移民发展了高度复杂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主要是石刻艺术和巨石文化，其顶峰表现为日耳曼和斯拉夫的神话。我们前面说到，在晚期马格德林文化和阿兹利安文化中能够见到很多骨瘦人形，人物形象刻画得精瘦，常常是用直线来表示。而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石刻中，我们也看到了同样的人物雕刻，尤其是男性人像多数有着又长又细的腿，身体画的像个圆环，常有四根辐条连接着圆环，使之看起来像车轮，长着山羊的头，生殖器挺立着，挥动着一把带着长长手柄的锤子。这里所表现的显然是战斗中的人的形象，是北欧传奇神话埃达（Edda，古冰岛文学集）的前身，埃达描述了伟大的雷神托尔，他挥舞着他的锤子和轮子一样的身躯。这些绘画中特别突出了

生殖器特点，把斧头或锤子长长的手柄看作是生殖武器，进一步强化了生殖器特点。

p145

瑞典法苏姆（Fassum）的石刻中全面表现了从事大量不同活动的人的形象，有的挥舞锤子，有的投掷矛枪，有的拉弓射箭，有的吹喇叭，所有人的生殖器都挺立着，还包括战船和太阳符号。这些艺术作品以及其他类似作品跨越了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显然都表现的是男性的胜利。

在人类后冰川期的居住和迁移到南方时期，我们发现了大量在某种程度上有些与北方地区类似的艺术人形。尽管该地区的艺术表现出来的是早期北非文化和土生土长的西南欧洲文化的混合产物。他们的身体都是瘦长的，但是非常强调腿部，比北部地区的人物要胖些。这是一种岩画和雕刻艺术，刻画的是栩栩如生的小人像、正在狩猎和捕鱼的弓箭手、仪式和献祭的情景、舞者和专心于某项活动的成群的女人等人物形象生动活泼的画面。在这里那骨瘦的人形得到了精彩生动的发展和改进，人物开始表现出活泼紧张的活动。

马格德林洞穴艺术中所表现的是神圣的动物无始无终的氛围，表现的是在深层密室里演绎着创造之谜的永恒的母神，而在这些作品中我们感觉到的是地面上的生活，是活生生的社群礼仪活动。强调的重点是人类追求的热情；猎人通过弓箭来拉伸自己的躯体，并且追随着箭和矛，仿佛那是他们自身的延伸。他们表现出脱离了永恒的母神而获取了解放，表现出将力比多转向对人类力量的自我肯定——人类可以掌握环境。

这种新的艺术风格的中心之地是北非的草原，今天这里只剩下沙漠了，但是在古老年代里，这块土地却曾经是一片广阔的草原，到处都是猎物。标志性的地方是卡普萨（Capsia）[即今天的突尼斯（Tunisia）]，这里的人们就被称为卡普萨人。除了岩画中表现的大象、长颈鹿、犀牛、奔跑的鸵鸟以及长着豺头或驴头的巨大人物形象之外，我们已经发现了崖壁上

被太阳照亮的狮子符号，人们以崇拜的姿势高举着胳膊，站在巨大的公牛或公羊前，公羊的双角之间可见一轮日轮的标志。

p146 (这些图案比它们出现在埃及神话中要早五千年)

虽然多数考古学家说，他们对于这种文化的早期历史一无所知，但是这种文化最初的形式，即所谓的低级卡普萨文化，大致可以回溯到奥瑞纳文化时期。卡普萨人很有可能是八万年到五万年之前从中东向西迁到北非肥沃草原上的早期智人的后裔；而其他智人则在四万年前在欧洲安顿了下来。在冰河世纪末期，很多欧洲智人北迁而创造了大范围的日耳曼和斯拉夫文化，另一些人南迁到非洲海岸，加入了南部智人支，成为卡普萨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一些证据能证明卡普萨人的确不断向东转移，并且创造了新石器文化，这一文化主要集中在巴勒斯坦 (Palestine)、苏美尔王国、亚述帝国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以及南部土耳其——这个肥沃的新月地带，那时野小麦在这一带长势非常旺盛。他们被称为纳图夫人。

不久他们就开始利用了他们发现的野麦，建立了生产农作物的农场，由此建立了农业文明。

但是在有组织的农业生产成为可能之前，男人们必须从妇女们那里接管社群的组织权和领导权。毫无疑问，大概在一万或一万一千年前出现于中东的有组织的农业劳作——即我们所理解的农业——是一种由男人组织和完成的活动，不同于此前千百年间妇女们在村社周围开垦的蔬菜地和小农田作业。从事农业的人们在对大自然节奏和规律的观察中建立了新的神话和科学，农业日渐成为主要的食物供应来源和经济文化的中心，男人在社会生活中也获得了支配性角色。但是男人这种支配地位不能简单地用农业的出现来解释。男人试图获得高于女人和母性的权力，试图穿入她的身体，使她屈服于他，接受他的种子。男人这种对生殖器肯定性的内驱力是农业出现的心理基础。

2. 父权制的出现

在农业中，种子——这是男人对生命的特殊贡献——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活跃的起源性原则；的确是男人激活了大地母亲，使她肥沃丰产；母亲需要依靠他们才能发挥其孕育生命的潜能。事实上，不是对大地的崇拜支配了农业时代的人们的想像力和仪式，而是男人的支配作用——男人在大地上播种——使得大地能够孕育出生命。的确是他激起了她的热情和她的繁殖力量，这种繁殖力量的真正实现还要依靠他。

一个普遍的推测是，在母权制文化中人们通常忽视性交与繁殖生育的关系，因此掩盖了男人作为父亲的意识，从而使得父亲的角色对于孩子而言是相对次要的。孩子的舅舅，也就是母亲的兄弟承担起养育保护孩子的义务。而在父权制度下，父亲角色最终变得相当清楚，而且特别加以强调。

在农业开始之初，男人开始挑战母亲的继承权，他们通过后代要求实现自我永生的权力；他们强调其在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中的重要性。巴霍芬（J. J. Bachofen）称之为人类发展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阶段（Dionysian stage）：“这个阶段的神话是关于天顶上的太阳神，表现为公牛两角之间的日轮或是神和他的使徒头上的光环。狄俄尼索斯式的父亲一直寻找着具有接受能力的物质并唤起它的生命。”[巴霍芬：《神话、宗教和母权》（*Myth, Religion and Mother Right*），Routledge, 1968]

突然出现的父权文化中最重要方面之一，也是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具有最为深刻影响的方面，是财产所有的概念和权力主义的等级制度的出现，这些都是远非母权制社会所能够经历的。男人们通过使大地丰产的劳作宣称大地为他们所占有，把大地变成他们自己的了——大地变成了他们的财产。而在母权制社会中，猎人提供营养和食物，女人们则拥有村社、棚屋和

p148 她们自己生产的家用器皿。猎人因给家人和村社提供食物而受到欢迎，得到温暖、安全感和性的满足，但是他并不拥有对他的妻儿、家以及家所在土地的所有权。他在村社中没有权威地位，也无法通过后代使自己的姓氏延续。只有当大地必须被开垦，必须被播种才能生产食物，开始依靠农夫的活动时，男人才真正成为他们所支配土地的主人，也才同时获得对于家庭和村社的权力和权威。他们变成了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大地和女人都依赖他们。这样，父权家庭就意味着男人对于他所掌握和种植的土地拥有了所有权，同时还意味着对于他的妻子及其所生育的后代拥有所有权——他的财产标记着他的名字。现在是男人拥抱女人的时候，是男人用他的双臂环抱女人并且保护她的时代。

现代考古一个最为惊人的发现就是，几乎在农业聚居地建立起来的同时，它们就有防御工事，并发展成一个个城堡。对早期新石器时代人的最重要的发现是，最早的聚居地不是村庄，而是城市。在耶利哥有一座大约建于公元前八千年的古城，城市拥有能够建筑大型防护墙的市民组织，并且已经发展了培育小麦和大麦的技术。农业，不仅仅是所有的谷类食物，而且是其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基础。

纳图夫文化大概在公元前九千年到达中东，主要是巴勒斯坦。有趣的是，在纳图夫人与此前在那里居住的克巴然人（Kebaran）之间没有发现直接的种系关系。那么这能否说明，纳图夫人实际就是从西南欧洲迁移来的马格德林人和从北非迁移到中东的卡普萨人？不管是否如此，纳图夫人与耶利哥（Jericho）人一样，在一片俯瞰着湖泊沼泽或者靠近神奇泉水的开阔地上安家落户了。镰刀、镰刀刃、磨石、臼和杵等的发现说明，那时候已经开始收割、加工和储藏谷物了。用粘土衬里的粮仓说明他们已经开始保存多余的食物。因为这种文化主要依靠收割和采集野生小麦和大麦，所以被称作前新石器

p149

(Proto - Neolithic) 文化；另外所发现的同时期的工具和武器也清楚地说明，狩猎和捕鱼依然是人们营养和食物的重要来源。

耶利哥遗址中最早期的纳图夫人居住遗址，与大概起于公元前八千年的新城之间没有中断。因此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推测说，耶利哥城在不到一千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一个高筑城墙的城市是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生产与保存剩余食物的能力的发展。新城中有一些建在石基上的泥砖砌成的圆形房子；地板低于外面的地面，入口通过门和木质门柱，然后再向下走几个台阶。[梅拉尔特 (J. Mellaart)：《近东的早期文明》(*Earliest Civilisations of the Near East*)，Thames & Hudson，1978；《近东的新石器时代》(*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Thames & Hudson，1975]

耶利哥周围的城墙是一种坚实的独立结构，是利用半英里之外的河床上取来的巨石建成的。城墙基部厚达六英尺六英寸，稳固地建筑在基岩上。城墙之外，史前的建筑者们从坚硬的岩石中挖出了一条大型的水沟，二十七英尺宽，九英尺深。关于他们是如何在耶利哥的酷热中完成这种开凿工作的一直是个迷。在一万年前，耶利哥城只有十英亩大小，居民不会超过两千人或三千人。但是，比这些城墙和护城河更加引人注目的，就是发现了一处坚实的石头结构，这一建筑非常高大，足以与法国一些伟大的中世纪城堡相媲美。

这个城楼基部的直径超过三十英尺，即便是今天，它的遗迹还高达三十英尺。中心部分精心修建了一段楼梯，可以直接下到靠近基座岩石的一条水平通道。这条通道通向城楼东面的一个门。一条水渠可将水从顶部送入城楼北边一些围起来的场地。有一块相似的围场很可能曾被用来储存谷物。这样这个城楼就综合了两项职能，一是从井里抽水，供应城镇的人们饮水和浇灌附近田地，还用于储存谷物；一是作为瞭望塔，用于战

p150 斗，同时也是储存系统的中心部分。

除了是农业区的中心，这个城市之所以这样富饶还因为它控制着死海里的资源：盐、沥青和硫磺——在早期社会，所有这些都是有用的产品，所以贸易一定也是其经济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在该城楼的遗迹中，还发现了来自安纳托利亚的黑曜岩、软玉及其他绿岩，以及来自埃及西奈半岛的绿松石，此外还发现了其他金属。毫无疑问，这里一定曾经有过很多作坊，把这些金属制成各种各样的工具器皿；同时，还应该有很多存储金属并进行金属交易的五金店。

这个城市促进了大量不同技能的发展，它的人员组成变得更加复杂了。除了农夫、牧羊人和渔夫之外，许多其他的手工业者也进入了这个城市，对它的存在做出各自的贡献：矿工、金属制造者、画家、雕刻匠、樵夫以及织布者等等。从这些起源于村社的职业中又发展了新的职业群体：士兵、商人、货币买卖者、邮差和职员。因此新的城市生存方式使大量的技能互相协调，使得人类的能力在各个方向得到极大的拓展。然而，所有这些活动都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在积累了超过人们即时需要的多余产品的基础上，建立在财产概念以及为了贸易和交换的目的而特意生产多余商品的基础上。为了使这些活动成为可能，需要建立一套价值体系，对每种商品赋予直接用途之外的价值；必须制定贸易和管理规则。这种规则的制定和执行需要权威存在，他的决定能够被普遍接受。

要建筑大型的防御工事以及其他公共活动，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意味着一定存在着某种中央机构，能够规划、组织和指导大多数人，同时还要有富余的经济来支付中央机构。

城市不仅使更多的人、更多的陌生人走到一起来，并对他们的活动、技能和责任作了不同的分工，而且它也创造了一种新的权威概念，并创建了新的机构来代表权威。统治者或国王

p151 能够要求大批人为之服务，可以组织他们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

模的集体劳作。皇家命令人民为他们建造了石头或砖头的人造山、金字塔以及金字形神塔（ziggurats）等建筑；整个景象用它们严格的边界和几何形状，负荷着人类不屈的意志。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种对于他们国王新形式的服从，如果没有人们为国王心甘情愿地贡献他们的劳动甚至他们的生命的话，我们的文明是不可能进化发展的。

城市的发明同时也带来了性质和规模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战争。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建立城市的第一天开始，乌尔和乌鲁克（Ur and Uruk）之间，埃瑞都和拉格什（Eridu and Lagash）之间就一直战争不断，为领土而战，为领导权而战，为控制贸易路线而战。最早的帝国冒险行为——阿卡德王萨尔贡（Sargon of Akkad）的冒险行为——为军事力量和武装冲突增加了一个新维度，对此我们有全面的纪录。

现在我们开始讨论已经为我们所了解的领域；历史从这里开始是我们所熟悉的了。但是我们必须追问，到底是什么促使人类服从于一个中央权威机构，服从统治者、神父和国王呢？我们自身心理本质中的什么因素使得我们去遵从战争、纪律和自我牺牲的要求呢？

3. 国王的神性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导致父权制形成以及父权超我出现的所有因素：男人逃离了母亲的威胁，投到了父爱里，在没有性欲的、经过升华的同性爱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超我，与强大的父亲形象认同。

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解答这个问题：拥有强大权力的人象征着每位父权制下的男人对于全能的幻想，并且充分表达了这些幻想。人们把他们对权力和财产的渴望投射到某个特定的个体身上，把他们当作国王来歌颂，为他们服务，与他们产生认

p152 同，由此来分享他们的荣耀。这代表着一种投射和认同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每个人都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拥有权力和财产的人，另一方面，他们都乐意为那加诸在国王身上的全能形象做出牺牲，或是奴役自己。那些汗流浹背建筑防御工事的劳动者，那些在国王的战争中牺牲了自身健康和生命的士兵们，都把他们的关于荣耀的幻想分离出去了，并且投射到了那“伟大的当权者”身上，而这位当权者的荣耀则又最终体现在那些为之服务的市民身上。

因此父亲的权威就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家庭中的权威，另一方面是对国王和上帝的服从。通过对国王和神的服从，父亲与他们产生了认同，并代表了他们的权力。同样我们也发现，父权社群的统治者不仅通过其个人的影响力或能力来实施其权力，而且还要借助于他与精灵和神的世界之间的特殊关系而加诸在他身上的感召力。他本人正是神性的对象，他臣服于它，通过这样做，他获得了神力量并内摄了这种力量。因此，这种父亲角色与超级力量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为同时体现在三个层面：

- (1) 每个男性都是其后代的父亲，是一个家庭的当权者；
- (2) 他服从于他的国王，通过服从来分享国王的力量；
- (3) 国王与那种最终代表着全能形象的神奇的精神有着特殊的关系。这样，每个男性都分享了全能精神的力量，与它产生认同，从而实现了他那躁狂的阴茎 - 自恋的幻想。

上帝的无所不包性除了生育的力量之外，也表现出躁狂 - 自恋因素，上帝充满了天堂，“从天涯到海角”地覆盖了地球，他的力量和潜能是没有界限的，完全不受凡人所受到的限制和压抑。

显然正是这种不受压抑的自由是新的神最主要的特点，但是当然不会每个社群成员都能被这样选中，手足之间相互竞争，产生一个幸运儿，每个人都想得到神的偏爱的希望被投射

到某个特定的个体身上，因此他就成了所有男人前意识中满足性与自恋幻想的化身。对他特别的赞扬不仅赋予了他支配母亲及家庭的权力，同时也赋予了他支配社群中男人的权力。服从他的命令，遵从他的意愿成为了父权制道德中的至上美德。

p153

4. 俄狄浦斯情结文化：父权制的偏执狂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新型统治者的出现，他更接近狒狒群体中占有统治地位的雄性，他压迫年轻的雄性，恐吓他们使他们服从，要求掌握独自占有雌性的权力。在城堡中享有特权、财富和神授权力的国王，一方面被人们看作是其集体幻想的代表而加以赞美，同时他也激起了他们的妒忌和憎恨。他们妒忌他被认定的身份和他的财富，憎恨他统治他们的权力。这种对于国王又爱又恨的矛盾情绪，不仅造成了俄狄浦斯情结深刻的冲突，同时也造成了社会中阶级划分的结构。

他们希望杀死他，再重新获得那种他们交给他的权力感和尊贵感，但是同时他们又必须保护他不受这种弑君欲望的伤害；他们煞费苦心地发展出复杂的仪式，来恢复并赞美他们在幻想中杀死的国王，并给予他惩罚他们、要求他们牺牲的权力。对国王和国家的服务以及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自我牺牲，便成了一种补偿行为，这些行为使人们从坏良心中解脱出来，向他们的统治者保证他们不仅不想杀害他，而且爱戴他。因为他代表着他们，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代表他们为自己建筑了宫殿、庙宇和坟墓；他通过征战来扩大他的疆土，使他的臣民享有更大的荣耀。

国王与超我最重要的心理与政治防御之一就是替换过程，即把原来针对他们的攻击欲望转向国外的国王与诸神或其他社群的统治者，这样这些人物就慢慢代表了可以被攻击的对象。己方的超我鼓励着公民把他们的攻击与敌对欲望发泄到“其

p154

他”的、“陌生”的超我上去，通过这种方式来确保己方权力的延续。杀死敌人就变成了发泄被禁止的杀父或弑君的欲望，因此是一种美德；每杀死一个敌人就是一次效忠行为，也再次确认了对己方统治者或国王的爱戴。“我的国王，我的国家”。这样爱恨冲动的冲突就被转变成为己方部落与他方部落之间的冲突，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冲突。但是正如同被压制的性欲与攻击驱力会不断进入意识领域，对自我造成威胁，成为一种焦虑来源，陌生部落及其神（我们将被压抑欲望投射到他们身上）代表着对我们的部落和神的持久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超我，免受“他人”的攻击。上帝及其地球上的代表——国王和统治者必须受到保护，使之免受外部敌人的攻击；他们必须被赋予越来越多的荣耀和权利，不能受到敌人伤害。所有的精神力量、意志和信仰的力量，文明所能调用的所有物质力量，以及技术所提供的所有武器装备，都必须致力于这一任务，这种做法必须得到颂扬和肯定，不管这种文明自称为是民主的或是神权的或是任何别的性质。正如同被压抑的本我冲动努力要进入自我水平，造成突破自我防御的威胁，同样代表着那些本我冲动的敌人的超我也会不断努力侵入我们部落或国家的防御，企图控制我们部落或国家的灵魂和疆土。因此，部落会常常感觉到敌人的威胁，无可避免地会变得偏执妄想。因此，“部落偏执狂”是父权制一种普遍的状况。

正如同人们必须保护父 - 神及其地球上的代表——统治者、国王或政党，使之免受外部敌人的攻击，他们还必须保护上帝，即天父来避免内部敌人的攻击，即灵魂中原罪思想和邪恶的攻击：“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诗篇》51.3）我们请求全能的上帝赦免我们的罪和我们的邪恶行为，我们赞美他，把我们自己贡献给他，以使他感到欣喜，并且相信我们忏悔的心：“求主掩面莫看我的罪孽，涂抹我的一切过犯。”（同上 9）“我们虽违悖我主天主……主却常

p155

发慈悲，赦免我们的罪。”（《但以理书》9.9）“天主啊，求你从宽惩治我，不要在你的怒中惩治我，恐怕使我归于无有。”（《耶利米书》10.24）“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日用的粮食，求父今天赐给我们，又求饶恕我们的罪。如同我们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保佑我们不遇试探，拯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都是父的，永世无尽。阿门。”（《主祷文》）（所有译文引自1915年铅印中文本《公祷文，附诗篇》——中译者注）

但是我们这些父权制下的罪人仅仅在祈祷中祈求上帝的宽恕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保护他不受外部敌人的进攻，要武装起来对付那些异教徒和没有信仰的人们，他们一直都下定决心要摧毁我们的上帝及其地球上的代表。十字架与剑的联合，对于上帝的服从，以及面对敌人时不屈不挠的勇气，是父权制度下的人们所渴望的双重特点，这些被他们看作是最高的美德和毋庸置疑的责任。

我们现在可以定义父权文化及其道德概念演化过程中的一些重要阶段：

(1) 母神统治和女权政治统治，将母亲的后代团结在一个团体中，并给予团体明确的身份。母神转变成了愤怒的巫婆。

(2) 为了支配这个巫婆，使她再次献出生命和爱而强调阴茎 - 攻击的重要性。

(3) 农业出现，赞美并神化国王和全能的上帝，上帝创造了生命——男性力量的化身。

(4) 修筑防御工事的城镇、出现财产所有制和社会阶级结构。

对父亲 - 上帝的爱恨交织的情绪出现，俄狄浦斯情结伴随着神话、宗教和父权制偏执狂的政治发展。

5. 一神论的产生

在大约一万年到两千年之前，从土耳其南部的加泰土丘（Catal Hüyük）到埃及，在欧洲大陆和中东地区大量不同的族长式文化出现了。然而，大约在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关于宇宙的神——人类和世界的创造者的观念第一次出现了，由亚伯拉罕（Abraham）创始的犹太教说明了上帝的意愿和造人的目的，这些神的意愿由摩西（Moses）编辑成典，经先知们详细描述。一神论不论在神学上还是在政治思想方面都是一个巨大的、具有重要意义的进步，而希腊对人的理想化，从与神认同的需要中解放出来，使哲学的产生成为可能。犹太教的一神论和希腊哲学代表了父权制的巩固，这种文化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西方文明不仅仅继承了他们的抱负，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他们的冲突。

犹太人关于上帝的概念代表了一种相当高级的抽象思维。尽管是希伯来人发明了一神论，但是他们的神并不是一种神人同形同性的形象。他并不是一种有知觉、有形体的形式，而是一种宇宙精神，充满了意志、目的和智慧，通过他的先知传播他的言语和戒律向人类展示自己。他的永恒和全能超越了人类的知觉和理解所无法超越的时空的限制。借用康德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他不受人理解力和知觉的范畴影响，即不受时间、空间、物质和因果律的影响。他是宇宙万物的因，但是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释他的发生，因此他不会受到因果律的影响。他存在但是无法被感知，他不同于宙斯（Zeus），他不会受到任何诸如命运等其他力量的影响，因为他就是命运。他既是存在也是本质，他既是唯一也是众多，因为所有的存在都是从他而来。这个存在实体的世界是他的意愿和思想的体现。他不是现象而是本体，那全部的现象，那所有存在着的、可以知

觉的事物，包括人类，都是他心灵的表达和具体体现。他的意志和目的赋予了万物以意义，人类的生活反映了他的意图。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朝向上帝设计好的目标，人的灵魂并非被限制在一个孤立、有限的个体中，而是通过他与永恒的生命成为一体；接受上帝的律法，人就会从罪恶中解脱出来并得到上帝的保护和爱。基本上来说，犹太人上帝的形象与他们自身的形象交织在一起，他们完完全全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孩子，他们的编年史反映了上帝对他们的看法。他们所有伟大的作品揭示的都是上帝如何看待他们及对他们的感受，他们和上帝的关系，他们的缺点，他们的痛苦、考验和成功都在上帝的注视之下。尽管上帝的精神是人类无法理解的，他将自己通过刻写在石板上的训诫展示给人类——他的最新的最高级的创造物。

p157

犹太人所构想出来的上帝，是第一位真正的宇宙的上帝，是一位创造了所有生命的全能的父，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和毁灭整个宇宙。所有的人类都是他的孩子，是他的神圣统治之下的兄弟姐妹。他的目的和律法渗透了整个宇宙，但是他却赋予人类智慧和意愿，使得他们能够理解世界，能够做出选择，能够不断学习来完善自己。人类的历史是人类努力去实现上帝的期望的一个时期，但是因为人类还不理解上帝真实的本质，上帝于是赐予他们经文来指导他们，派遣先知来启发他们。到了历史的后期，当人类达到上帝所满意的完美程度的时候，上帝就会亲自出现在人类面前，于是弥赛亚的救世主时代就开始了。这需要人类已经足够成熟的时候——也就是能够发挥他们真正的潜能的时候。到时也将预告着俄狄浦斯冲突的解决，到时候将会如同《旧约》最后一句话所写的那样，“以利亚(Elijah)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那些构想出这一上帝和历史远景的人们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头生子女，是被选中来宣扬他的存在和荣耀，是要他们去向人类宣扬他的目的的。他们自认为是祭司和导师的国家，肩负

p158 着为其他国家树立正直榜样的崇高责任，要按照上帝的方式去指引和教导他们。

但他们同时也知道这项任务的艰巨和沉重。他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有着对上帝正反两面的感情，他们知道那些他们试图教化的人对此怨恨颇深。他们一再发现自己肩上的任务是多么艰巨，但当他们试图丢弃上帝给予他们的职责时，他们神性的超我，内心深处上帝的声音不会让他们这样做。他们对上帝这些不明确的感情，他们的爱和叛逆，他们对伟大的渴望和固执，都记载在他们的圣经里。

但上帝，出于一些我们只能猜测的原因，决定给予他的特殊造物——人类在善良和邪恶之间自由选择的权力，他们可以选择服从上帝的意图或是反抗它。同他创造的其他生物不同，他没有赋予人类设计好的本能系统来控制他们的行动和思维，而是给予人类一个机会，一个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达到完美的机会。他赋予了人类潜在的理性、智慧和道德完美，但人们必须自己学会去发掘。他创造的不是被无知或罪恶束缚的人性，而是一个可以变得完美的人性，人们必须找到超越局限的方法，从而达到上帝的期望。与一个人对家庭成员的关心不同，家庭成员是由一个共同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而要把所有的人当作上帝的孩子去爱不是件容易的事。戒律，“爱你的邻居就像爱自己一样”，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家庭，对于自己真正的兄弟姐妹甚至对自己部落中的成员持有这种感情不是件难事，但如果对象是整个人类，要遵循这样一条道德训诫确实是难上加难。但这仍是上帝摆放在人类面前最终的一条戒命。

6. 哲学的诞生

在寻求一个对所有人来说是普遍的道德观念这方面，人们找到了另外一条道路，它完全独立于对万能的神的信仰。犹太

人的一神论代表着一个在神学和道德思想方面巨大的进步，而在希腊，人们在统一道德观念的探求中开始提倡运用理性，这使哲学的产生成为可能。

古典时期的希腊人早已忘掉了他们克利特岛文明的女权制祖先，但在他们的神话中为争夺霸权的战争一直在继续着。这些战争并不是在真正的军事和政治事件中，而主要是在描写关于父权制心理冲突的神话中被回忆。赫西奥德（Hesiod）、荷马（Homer）、泰奥格尼斯（Theognis）这些伟大的诗人，为希腊文化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基础，他们用史诗来庆祝希腊文化的出现，这些史诗的内容详尽描绘了他们神的考验和胜利。他们当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赫西奥德，他的史诗试图为神的诞生和成长提供连贯一体的编年史，因此成为了希腊人自我形象的“正式”版本和他们的万神殿——希腊宗教的圣经。赫西奥德在其《神谱》（*Theogony*）中追溯了从远古混沌时代一直到宙斯成为了万神之王的历史。这部史诗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因为它将个人的精神发展投射到宇宙进程上：婴儿最初的多形态力比多、与对象有关的力比多和爱的出现，以及尚未经自我协调的口唇-撕咬和攻击驱力、孩子对母亲的依赖以及恶魔般俄狄浦斯情结的斗争，一直到占统治地位的男性个性的出现，给世界带来了法律和制度，表达并制服了性欲。宙斯被描述为起初受控于我们称之为无意识的野性激情，他必须再一次对抗并击败古老母神，再一次对抗并击败他的儿子们的俄狄浦斯情结，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地、常常是痛苦地显现出成熟男人的样子。

赫西奥德的《神谱》大约是在公元前八世纪，古典时期的初期阶段撰写而成，与荷马的史诗基本上是一个时间。他们的作品都创作于贵族政权统治时期，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特点。但当这些政体让位于城邦政治的时候，当公民个体全面承担起管理整个社会的

p160 责任的时候，神便失去了他们的权力。人类自己成为所有事件的开创者和参与者。但是，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聪明才智，必然也会被用来重新理解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再不是由诸神代表和决定的世界了。即使在雅典文化的全盛时期，奥林匹亚神话依然活跃着，但是那些知识分子认为对神的崇拜只不过是一种宗教习俗，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理性判断。他们抱着一种怀疑态度看待神，神的动机和行为在这些知识分子眼里都是非常粗野古怪的，那些智者不会太在意诸神的言行。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公元前六世纪，一场理性的革命出现了，而雅典是这场革命的发源地和中心，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现象：海洋、雷电、地震、风雨、日月食、地球和天堂，还有四季的交替，所有这些都不再是某种人格化的神了；必须发现所有现象的成因，以便能够理解这些现象，从而使一切都可预测。可以这样说，公元前六世纪时爱奥尼亚的哲学家们做出了人类最早有意识地去了解认识自然力量的尝试，他们因此被称为自然哲学家：像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和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es）。然而有趣的是，如果不是亚里士多德对这些科学思考的先驱的作品产生极大的兴趣，恐怕今天我们就不会知道有这样的作品存在了。既然是人类的心理和他们的理性能力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条件和他们理解自然过程的能力，他们于是开始钻研心理的本质。于是，关于自然的哲学、对心理运作方式的追问、认识论和辩证法都应运而生。

神隐退的时候，理性必须取代它们的地位；宗教终结的时候，哲学就诞生了。

数千年后，当人们将他们自恋的幻想投射到神的身上，希腊人却创造了自由和完美的人类形象并将自恋的感情转移到自我之上。身体和精神一样都是美好的，值得崇拜的，同时他们创造了一套理论让人们相信没有理由不去崇拜强健的体魄。事

实上，雅典人那喀索斯（Narcissus），将杰出的运动能力和优秀的辩论才能推崇为崇拜的核心，成为美的理想，超过了女性的吸引力。男人开始承认和尊重自我，认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生气勃勃的、智慧的、决断的个体，是现实的动因和创造者。在此，男性达到了最高的荣誉：儿子们接管了以前属于神性超我的权力。他们能言善辩，论据充足，他们宣布有自由思考和言论的权利。

“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如是宣称；而“人啊，了解你自己”则可能是希腊哲学最为重要的座右铭了。关于知识的理论形成了，专心致力于对理性自身的理性研究。随着知识分子对传统的思维方式变得越来越怀疑，他们开始努力去确立正确运用认知过程的稳固的基础。智者学派已经创建了许多新的学校来促进理解，加强人们更正确地使用他们的推理能力。他们教授与人争论的技巧，以及如何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以利于这些争论技巧的发挥；他们乐意向人们展示如何支持某个观点，或者是如何反对某个观点，以及如何穷追不舍地追问一个论点，一直追究到最后自然引出的结论上去。他们主要的价值就在于他们的博学，他们促使人们掌握所有对于其目的有用的知识；还有他们的艺术鉴别力，使得他们能够恰当选题，并且能够以一种富有魅力的方式加以阐述。

然而，由于对某个论点或命题逻辑上的过分追求，他们在辩论的过程中渐渐只是强调单纯的艺术鉴别力，最终造成了某种意义上政治和道德方面的玩世不恭的犬儒主义。尽管智者学派的哲学家们都是天资聪颖的，但是上述做法最终形成了一种理念，即唯有成功才能指导智慧的生活。他们追求合乎逻辑陈述的真理，而完全忽略了所有道德上的考虑，这常常把他们引向怀疑主义，他们随时准备充分运用他们的知识，只要能够取得上风。这种做法不仅遭到绝大多数普通人的非难，很多哲学家也对此深表憎恶，而柏拉图就是这些哲学家的急先锋。然

p162 而，贝特朗·罗素却支持智者学派反对柏拉图及其后继者；他认为追求真理就必须抛弃道德方面的考虑，责备柏拉图，因为他总是热心宣扬那些足以使人们变成他所认为有德的样子见解。罗素更喜欢智者们在思想上的诚实，因为他们绝不会根据道德的后果来判断逻辑过程。[贝特朗·罗素：《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Routledge, 1991]

不过，很显然正是智者们日渐强化的玩世不恭，甚至有些轻浮无聊的行为（心理状态和我们现在有很多相似之处），以及他们随时准备支持各种事业或利益而毫不顾及其道德目的的做法，才引起了苏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图强烈的谴责和不满。也正是因为缺乏道德信仰，或者甚至可以说正是他们有意地否定道德信仰，才导致柏拉图以一种理性思维的方式去思考道德概念的重要性和意义。对他而言，真和善的概念相互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理性的两个代表。而柏拉图哲学的焦点就是善的思想、合乎道德的行为以及对真理本质的探求。

在伯里克利（Pericles）之后，公民大会的领袖几乎都是从那些成功的商人中间挑选出来的，他们可能很有能力，却是机会主义者；由于其天性及所受的训练，他们往往会受制于自身的利益形成片面看法；他们热切需要诡辩术这种功利性的工具为其野心服务。到公元前五世纪末期，已经无人可以非常确定地谈论永恒的真理了：那些聪明的人们已经把所有的事情完全颠倒了，而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只会觉得他们已经落伍了。如果你要谈论美德，就会得到这样的答复：“这完全看你说的**美德**是什么。”而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美德**到底是什么。尽管在那些能言善辩措辞巧妙的言论中，雅典人获得了巨大的乐趣；尽管智者学派所创造出来的那些精细复杂的风格和机敏的辩论，让他们为之惊叹，但是正如克里昂（Cleon）所告诉他们的那样，他们已经变成了专家和鉴赏家，而不再是雅典的公

民；与此同时，那些在辩论中失败的平常人，那些在诉讼案中败诉的普通人，则深深不满于那已经堕落的公正。

正是在这种传统宗教价值观、诡辩术的价值不再受到尊重的时候，柏拉图要建立理性的原则。他开始寻求关于真理和道德的通用标准，寻求能够成功取代那些已经失去其确定性的标准。哲学对于他而言是去发现理智生活的新形式，是通过严格地运用理性的方式去寻求与社会相关并能应用于社会中的真理。狄奥尼西奥斯（Dionysius）曾经两次任命他为社会组织方面事务的顾问，而他两次都失败了。

p163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是这样一种人，一方面他超然世外，杜绝了所有感官限制的诱惑，超越了拘束心灵的界限，超越了所有的表面现象；但是同时，他确实又是立法者和政治家，他完成了抽象世界的旅行之后，就把他的聪明智慧奉献给了社会，成为社会的先锋人物。虽然他发现了严谨的逻辑并且大加宣扬，但他的生命依然充满了爱神激发的热情，依然会发现所有美好的事物。柏拉图把洋溢的热情和神秘的沉思所表达出来的爱的辩证法引入了理性的讨论之中。他提出了代表人类认识的基本形式的哲学方法：综合过程和分析过程。分析过程是把现象的已知概念细分成其具体的组成部分，而综合过程则是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使之同类相关，目的是在大脑中形成一个整体概念。正是通过追求这两种思维方法——分与合的方法，哲学才能够最终求得关于世界本质的真实概念，也才能够最终求得确实可靠性。尤其是通过综合过程，我们才能够理解普遍原则。

存在的核心，即所谓的“一”或者“绝对”，是纷纭复杂的表象之流中永恒的一点，这不只是从心理结构中形成的假说，也是从爱神——那生命自身的主要动力——那里流传给人类的。根据柏拉图的学说，存在一种永恒的本质，这种本质是感官知觉所无法理解的。

尽管原来所有的思考都是把永恒的品质和绝对的现实投射到了神身上，但是柏拉图又重新把这些品质投射到人类身上。人类的心灵，他永恒的理念（Idea），先天的真理和美的观念，表征了事物的真正本质。柏拉图在阐述永恒的理念的时候，使用的不是神的语言，而是人类的语言，比如说善、普遍的目的、真理等，如果人类的智慧得到恰当地运用，这些都是可以再发现的。然而，柏拉图遭遇了一个悖论：美和正义是心灵生来具有的呢还是必须后天学习的呢？到底能不能通过对人类的爱来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呢，还是需要通过遵守那些理性确立的规则才能建立呢？这个悖论至今仍困惑着我们。他的《理想国》（*Republic*）和他的《法律篇》（*Laws*）虽然是人类理性最崇高的表现，但是在以后的世纪中都是高压政治的象征。对激情和爱情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崇拜，曾经启发了年轻时代和成年早期的柏拉图，而到了晚年，柏拉图最终在一种悲观绝望的心情中放弃了这一信条，但是对激情和爱的崇尚却在希腊一直存在着，成为一种地下文化。

在柏拉图之后，理性思索的水平有所降低。然而，依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卓越人物——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的这位弟子对于人类的理性深表骄傲。但是他不再像柏拉图那样，完全相信单纯的思考了。不过，正是由于他对于把理性推理应用于感官知觉加工过的经验上的信心，他才最终创立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叔本华总结了两位大家的区别，柏拉图是一个思考深刻的哲学家，而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个涉猎广泛的哲学家。“给我那科学家——那大自然的观察者——所搜集到的结果，我将会协调所有的结果，建立一套理论体系，来揭示整个世界的真理。”亚里士多德这样宣称道。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天才种子要等待两千年才能够成熟；从牛顿的天才开始开花，而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是康德第一次把柏拉图的天才变成现实，从而奠定了现代哲学的基础。

第六章 理性道德之路

1. 一些基本问题

在一次以“第三条道路 (third way)”为主题的西方强国首脑会议上，意大利总理马西莫·达莱马 (Massimo D'Alema) 说，人们不应该害怕“社会主义”这个字眼。

在苏联东欧发生剧变之后，人们已不再关心关于共产主义的合理性问题的讨论。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以“人性化的面孔”继续主张自由企业的不变法则：对利益的追求会使国家的财富增长而使整个社会受益。且一旦资本主义进入落后的国家打破资本主义前的反民主的制度，他们亦将会感受到西方先进国家的优越处。企业的自由性，作为民主和自由的同义词，使人类创造能力释放出来以生产出新的商品和机器，而这些都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福利和幸福所必需的。

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认为，在人类本性中占重要地位的猎取的快感，如今在财富和名望的争夺中得到了合法的满足，这种满足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和分享。如果有人指出资本主义的通病：大量的穷人和严重的剥削，以及机会的不平等，他们会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计算机信息时代的来临和普及，每个人都会有机会加入这场财富的掠夺。由此人性不会停止发展，社会经济结构亦不须发生变化，资本主义会越来越人性化。所以正如一些作家

所宣称的，我们终将面临政治的消亡，将道德和意识形态的渴望变得无关紧要；未来是事物本来的样子，在生产和分配的现行系统下社会将会不断进步，资本主义就是一切乌托邦的答案，历史的发展到此为止。但是像这种使得其他任何愿景的选择都变得陈旧的宏大的理论，一旦经过事实的检验，就会发现仅仅是一个幻想而已。

在他们的人类本性的观念中，对财富的无情追求是合理的，但他们忽略了人类智力的主要特征，即预测和远见的能力和需要，知道自己行为和信仰的后果。他们视而不见自由企业对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且固执地认为我们对资源索取越多就越富有，全然不考虑如果我们凭借先进的技术提供的有效设备进行掠夺，被掠夺者和自然资源会有什么后果。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们目前将动物杀害灭绝；用工业排放物将河流海洋污染；破坏生物圈，污染我们呼吸的空气，耗尽了臭氧层，而臭氧层的破坏有可能对这个星球上的生物造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但是，为满足个人贪欲而冷酷地追求财富，不顾他人的需要，对权力和自我扩张着魔，这是否真正表达了“人类的本性”？难道人类没有被赋予一个道德上的标尺让我们去关怀去考虑我们周围的人和动物？难道对这些情感的否定不是大脑高级皮层区域被忽视，继而形成功能障碍所造成的吗？难道没有必要去抑制这些原始的、自恋的、侵略性的驱力？难道利他感不是人性最重要的一个特征，不应铭刻于各种政体和文明中吗？

显而易见，这些问题迫在眉睫，因为它们与人类的生存有着紧密的关系，进一步来说，使我们关注人类心理将如何发展，因为如果我们停止使用脑的前叶区，甚至否定它们的重要性，我们将会退到更为原始的驱力，允许其统治我们的思维和行动。我们在前面曾指出，由于我们不再相信启蒙运动的重要

观念，不再相信各种宗教的形而上学概念，又没有能力找到新的替代品，造成了“被压抑的欲望突破了防线”，造成市民暴力和群体攻击。从我在本书的前些章节中写过这些事到现在，野蛮行为和贪婪的事件暴增，媒体上有关的报道空前耸人听闻。在此，我不想再多举例，因为毋庸置疑，每个人都应耳闻目睹甚至是经历过这些事情。

不仅仅是这些先前被压抑的驱力的爆发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生活，同时对我们智力和理性的能力来说还有一种危险，西奥多·阿多诺在评论“组织资本主义”中将其描述为一种麻木化的过程。通常这种危险被称为“沉默”，媒体的焦点大都放在暴力和侵犯事件上，名人和富人占据了电视的黄金时段和报纸的主要版面，特别是周末增刊。为了他们的产品占取大的市场份额，他们诉诸“最小公约数原则”^{〔1〕}，认为这样才符合大众的口味。

人类是多层面的生物，大脑中有无数的驱力、本能和幻想，每一种都想要支配心灵。我们知道社会的组成是千丝万缕的，同时精神分析告诉我们，每一个个体都存在着很多驱力和强迫观念，而这些驱力和强迫观念通常是相互矛盾的。我们可以说在每个人和每个社会中，心理过程都是多样性的，大多数过程都被压抑到意识之外，但是它们并没有被消灭，有可能爆发出来，支配自我或支配一种文化。自我会挑选那些肯定生命，促进生命的驱力，可称作厄洛斯或生命力；同样自我也会识别出那些威胁生命的驱力，尽管有时它们会带来暂时的满足感。美和善良，精神和灵魂，不再被认为是上帝的作品，人类的一切优秀品质，道德能力和审美能力，爱情和创造力，不再

p168

〔1〕 所谓“最小公约数原则”（Lowest Common Denominator）是指面向不同经验、认识水平、个人修养、志趣的大众时，只取其公共重合部分，亦即最少的经验、最低的认识水平、最低的个人修养，而不再考虑个人更高层次的要求。——中译者注

是某个超人或是超自然的力量作品。它们是人性中确实存在的东西，是愚笨、贪婪和残暴的对立面。现在，我们不得不去问是什么造成了暴力、贪婪、毁灭欲、虐待狂和受虐狂，这些表现在国家行为中所谓的灵魂的黑暗一面。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都试图了解这些人性中破坏的一面，精神分析在研究这些神经和精神的症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人当被分成无数个独立的部分，且看不到生命的意义和未来，自我就失去了其调整功能，先前被压抑原始的冲动自动爆发，它要求即时的满足，即此时此地的满足。在如今这个电子计算机化的年代，太多的信息，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跟着社会前进而没有时间反省应该如何评价它。任何利益和事业都有信息资源来保障其成功。信息不仅仅有助于改善产品，优化生产，在市场上击败竞争对手，同时帮助我们知道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买些什么，说服我们那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买和卖，我们对财产、对轻松赚取利润和财富、对健康和美貌的永无休止的欲望的情绪唤起，充斥了我们的心理，妄用了我们的智力。表面上看来好像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能够让我们满足和幸福的东西，事实上我们早已成了花言巧语的推销术的剥削对象。周围的一切都在飞速发展，没有时间或心情去考虑现实之外的，更广、更远的问题。

2. 道德的需要

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当我们的祖先作为人类出现在世界上，他们不得不面对缺乏本能的事实，正因为缺乏本能，他们才能根据生存环境的需要做出选择和调整；比起其他生物，他们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这是地球上生命最重要的一次改变和适应。但为此而产生的不确定性是他们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因为没有人能知道一个选择、一个新的适应是对还是错。他们需

要向导师教导他们。事实上，他们变得善于学习，不仅仅是通过条件反射学习，也通过形成如何行动、如何思考的规则学习。我们都知道在直立人中，当人们去一个陌生危险的环境中狩猎并将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带回给他们居住在洞穴中的女人和孩子的時候，年长的男性会充当领导者和老师的角色。年轻的狩猎者必须学习那些必要的狩猎探险技能，长者不仅参与捕猎，还要教导年轻人。他们做示范并成为行为榜样。由于我前面解释的原因，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冲突没有发生。他不仅通过传授技能，也通过对部落及成员的关爱，代表了道德精神。

正如我们会永远记得一个好的老师，狩猎的领袖深深地刻入了年轻人的记忆中，他们学习领袖狩猎的技能，也采纳他的道德观念。他成了一个有声有色的榜样，不是一个陌生人、一个严厉的父亲人物或暴君，而是一个受人钦佩和爱戴的朋友。领袖的精神成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永世不忘，继而向外投射——外化，作为永恒的精神指导着他们的生活。家庭和部落中的长者向他们讲述历史和传统，过去和现在便联系起来，告诉他们每日经历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从而启发他们对未来的想像，由此，连续感、永恒感得以强化。这样，一个道德观念，一个普遍的目标，为他们提供了个人和集体的认同感和责任感、义务感，他们不是天生有罪的，而是为了履行作为社会一分子的职责来到这个世界，每个人都会感受到关爱，都会有归属感。毫无疑问，他们认为自己关于人生的看法是永恒的、可靠的，它取代了本能支配的行为（或者冠以任何时髦的名称，如基因编码）。他们把自己的目标感投射到所有事物上，认为它们和自己一样，也有灵魂，有生命，有感情和情绪。

p170

甚至不久以前，卡拉哈里沙漠人在砍倒一棵树前，要举行一个仪式，表达对树遭受痛楚的歉意。原始人设法让他们不得不杀死的动物的灵魂回归，祈求它们对自己和善，不要对自己生气，而要成为自己的同盟。

如果某人承认自己看待事物是用一种简化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他的世界观是形而上学的，这种世界观将人们的许多技能、活动以及道德责任调整成一个统一的意象，即人类在世界上的目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但人类文化的基础仍被灌输进我们的灵魂，并引起我们的共鸣。爱神将每个人联系在一起，而那些原始的攻击驱力向外指向敌意的，往往是危险的环境。服务于爱神和生命的正是攻击性，不光服务于个体的生命，还有他的群体的生命，这是良性攻击，正如埃里克·弗罗姆（Fromm Erich）所称。然而，进化带来的工作技能和工具的极大丰富，破坏了相对简单的基础文化。在工具的使用生产及对世界的认识方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专业人士。专业人士致力于自身领域的深造，于是他们逐渐远离了其他的专业知识，对本民族的知识只知道其中一部分。我们致力于自己的特定活动及相关的利益，对其他领域的专家，他们的技能和知识来说，成了门外汉。但是，从人类心灵和精神的本质上，对于周围的外部现实世界和自己的内心的现实世界，人类需要一个统一的概念。“联系是永恒的，”歌德如是说；自我说：“将无数的印象和感觉协调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p171

有件有趣的事值得一提，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劳工部门，由于威胁到人们的认同感而遭到了手艺人同业协会的抵触，手艺人同业协会给会员们制造出一种具有传统感和认同感的氛围，甚至有时会员有权选举或审查国王。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随着手艺人成为劳工，由工业巨商雇用或解雇，同业协会丧失了权力，技艺遭到破坏。卡尔·马克思致力于恢复工人阶级的尊严和权力，他宣称阶级斗争的形而上学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工人阶级则是推动向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发展的中坚力量。这并不奇怪，毕竟马克思作为犹太拉比的后裔，按照拉比的要求，他想要解放自己，将犹太人是上帝意图的代言人的角色投射到工人阶级身上，而 he 自己是工人阶级的先知。这与耶稣的

教导有很多相同之处：耶稣也与受压迫的贫民百姓认同，对抗这个世界的特权阶级、牧师和统治者，宣称那些被有权有势者欺凌的人最后将会是上帝王国的继承人。然而，基督教会宣扬怜悯和慈善，并尽量不破坏现状。马克思的形而上学的想像却被一个夸大狂的精神病患者利用，用来为他的暴政辩护，而工人阶级则不再相信社会的革命性转变。生产过程的一再细化，使那些真正生产产品的人淹没在统计数字中，默默无闻，技艺的地位在市场导向的社会中，在对利益追求的大潮中越来越被贬低。

p172

对社会主义变革失去了信心，人们所关心的只剩下了薪水的增加和工作环境的改善。政党领袖害怕涉及意识形态，理念被一些经不起理性检验的口号标语所代替，这些口号往往与他们想要追求的目标正好相反。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用他们的智慧，用他们关于好社会的构想来引导政治家们，而现在哲学家们分崩离析，互相攻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退缩到对句法和词义的吹毛求疵的分析，回避伟大的思想，并声称伟大的思想是被科学精神所谴责的。这样，我们大脑中最“人性”的部分——综合功能被否定了，而那些原始的区域开始占据了优势，不仅支配了个体的思想和行为，而且支配了我们的文化。对宗教和启蒙运动包括一切思想的误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人们对其极端的不信任。现在终于到了我们重新恢复心理的综合统一加工的时间了，同时也要检验它们理性及心理上的价值。

在此我要再一次提及康德，他比其他现代哲学家（现代指的是笛卡尔之后）都更多地致力于分析我们心理的先天能力，包括认知和道德两个方面。通过对人类心理特性严谨而又透彻的研究，他发现人类所有的知觉和理解都来自于外部刺激作用于我们的感官，因此必然存在着一种能将感觉变为对事物的知觉和理解的心理能力。我们心理的这种先天能力，康德冠以

“先验”一词——在经验之前——并把此归类于他的认知范畴中。除了这些作为理论和经验推理之基础的范畴以外，他认为道德的先天范畴是道德概念的框架，他称为“绝对律令”。正如他在《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的导言中所说：“吾人之一切知识虽以经验始，但并不因之即以为一切知识皆自经验发生。盖即吾人之经验的知识，亦殆由吾人所受之于印象者及吾人之知识能力（感性印象仅为其机缘）自身所赋予二者所成。”他宣称，在决定人类先验知识的可能性、原则和范围方面，哲学替代了对科学的需要。我们所经历、所知觉和所了解的都依赖于我们所拥有的用于体验和心理器官。

康德最基本的和独创的思想贡献是：我们不是仅仅遇到并经历各种事物，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先天特质使得经验和知识成为可能。我们已经从脑结构和功能中找到了相关的证据：前额叶将各种各样的冲动和感觉调整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和表象（德语 *Vorstellung* 的意思是置于我们的头脑前方——德语表达得更为简洁）。而且，它也符合精神分析学关于自我的功能的概念：其任务是将大量的欲望和本能统一成为一个协调的整体，并提供“我在体验”，“我在思考”这样的感觉。

康德用我们心中的先天概念（它们使得感知和理解成为可能）定义了我们的认知过程，这些概念他称为空间和时间、因果、质量、广延、整体和统一等范畴。

3. 康德的认识范畴

(1) 空间

空间不是一个从外部经验得来的概念或表象，而是先于外部经验的。因为某种感觉与在我之外的某物有关，即彼此分处于不同的地方，则空间的内部表征必定早已存在。故对一个外

部对象的感知，只有通过我们心中已有的先前的空间表征，才能成为可能。

p174

(2) 时间

时间乃我们在外部世界所经历的一切现象之先验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时间的概念没有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我们就不能感知共存，也不能感知相继；而有了它，我们既能知觉到事物存在于同一个时候，也能知觉到事物存在于前后相继的不同时间。所有事物都是在空间—时间现实中被知觉，空间—时间是经验的首要条件。因此时间范畴是过去、现在和未来感觉的架构，以及事物变化、发展方式的基础，一个事物如何从另一个事物产生出来，事物之间如何接续，并且为因果关系提供了必然的基础。我们周围世界中的所有现象都在空间里，并根据它们的空间位置相互联系。我们还可以说，所有知觉为真实的对象都在时间里，必然与某段时间相联系。所以说，世界的空间—时间性质的先验概念是所有现象的先验条件，不仅是我们对它们知觉的前提，而且还关乎我们对事物变化发展方式的理解。

(3) 因果关系

时间范畴是我们构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必要架构，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式以及导致事物发生的原因则提供了因果关系概念的必要基础。无论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所有我们认识到和体验到的现象、历史感，以及事物变化的方式都将我们引导至一个不可避免的想法：任何存在的事物必定有一个起因。因果关系的概念作为充分条件句已经被许多哲学家阐述过：每个事物必定有其存在的理由——*Nihil est sine ratione cur potius sit, quam non sit*——叔本华将“为什么”的问题称之为所有科学之母。

我们思维中普遍的先验条件表现在神的形象中，这些神被看作各种自然现象或心理状态的原因，发展到最高峰是一神论

p175 的上帝，他是万物的创始者和原因——首因。不论这些论述如何精致，现代思想却要将上帝赶出科学的圣坛，宇宙的起因被追溯到约一百四十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即使那些坚持因果关系原则的科学家也不会将这个原则运用于基本粒子水平，而物理世界是由这些基本粒子构成。此外，毫无疑问的是，因果关系概念激发了人们的好奇心，去探究是什么使事物以它们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外部世界，存在于人们的心灵中，以及脑本身又是如何成为它现在的样子。

(4) 质量和广延

如果我们谈及构成我们所知世界的现象，我们还必须要涉及质量和广延的范畴。任何被感知到或被想到的事物都具有质量和广延，因为如果没有它们，即使借助最复杂的显微镜，我们也不会感知到事物。即使非常微小，广延也同样意味着每一件物体都占据了一部分空间。如果空间是本能的先验原则，那么每个物体都具有空间特性，因为如果没有的话，物体便无法使我们觉察。量子物理学的确假设出整个系列的亚原子粒子，它们是不能被直接观察到的——不过也没有人真正见到或是触摸到一个基本粒子，但是它的存在是可以通过它对物理世界极小的或是极大范围的影响推断出来。我们可以说亚原子粒子是波或是能量，但我们既不能直接观察到它们，又无法理解它们运作的方式。一个无条件的假说认为，每一个存在的物体都是可称和可量的，因它的质量，它必有一些重量，因为它的广延性，它必定要占据一定的空间，可以被测量，无论它有多小。正如尼尔斯·波尔（Niels Bohr）所说：“任何一个认为他懂得量子力学的人都不真正懂得它。”我们或许知道一些作为自然世界的基础的亚原子粒子难以置信的复杂性，但是我们既不能理解又无法想像它们。没有人曾称过或者量过它们；它们只能通过它们的作用被认识；它们的存在和特征只能通过数学和统计计算的方法推论出来。事实上，它们是在理解和知觉的范畴

p176

以外的，我们这里进入的似乎是一个自然的领域，它有着实体的特性，或者如康德所说的“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事物本身”，超越了我们理解事物的方式。这非但没有反驳，反而是证明了康德的主张。（这个题目需要详尽透彻的研究，超出了本书的范围，我希望能在另外的书中论述。）

（5）整体和统一

知识的先验范畴这个领域遵循着统一的原则。将所有先验的知识条件联系起来的是统一的概念，借助这一概念，大量的感觉和印象被脑的前额叶区联系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统一或整体，如我曾提到的，多数情况下作为统一。将大量的感觉、印象、情感、驱力，以及本能欲望结合成一个统一的、包罗万象的生命形象，这是基本的人类需求，它体现为一个万能的神，或是物理、历史的法则，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以及其他的形而上学概念。可以说，我们都认为我们处于宇宙的中心，但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身在其中，并在这个世界上选择一个位置。然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心中需要有一个这个世界的图像或是理念。将所有不同的印象统一为一个有意义的整体，是理解的前提，我们不能仅通过对现象的观察而获得理解。没有统一或综合的过程，我们就不能认识或理解一个物体的特性或形态。

统一或整体的概念产生于先验综合，主张任何存在的事物都遵循着一个普遍法则；如果我们能发现支配着经验世界的法则，我们就能理解现象单一的、特殊的性质。例如，三百年前，伽利略用望远镜观察天体，他注意到木星有若干卫星围绕着它运转。这一观察如同一声棒喝，粉碎了托勒密（Ptolemy）和教会支持的地球中心说，他们把地心说看作是上帝的意愿。牛顿对行星运动的研究表明，万有引力法则可以解释行星是如何运行的，而宇宙被看作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太阳吸引着地球朝向它，而地球围绕太阳运行，使得离心力与引力平衡。据我

们今天所知，成百上千万的恒星存在于我们的银河系中，而银河系又是我们所知的宇宙中成千上万个星系中的一个。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对所有物体理解的两种必要形式：先验分析和先验综合。

先验分析和先验综合

任何分析都是从检验整体开始达到整体中的部分，如康德所说，部分存在于包含在在整体中的一个分析的概念，我们通过区分法达到整体中的部分。在我们谈及科学时，这一主张是逻辑分析和时空研究的基础。例如，关于主项和一个谓项之关系的判断有两种可能性：其一，谓项 B 从属于主项 A，就像包含在 A 中的某个事物；其二，B 在主项之外，但与主项有联系。前者称为分析判断，后者叫作综合判断。

在判断句“雨天是湿天”中，谓项“湿天”包含在主项“雨天”中，所以这个判断是分析的。因此，谓项这一概念在研究中有助于将主项分解成那些一直被认为在其中的组成部分；正方形包括矩形，或者说，正方形的要素是等边和矩形。所以，判断句“所有的正方形都是矩形”中的谓项可以说是从原本包含在主项中的东西中分析出来的。还有一个例子：
p178 “一个森林由许多树木组成”这一命题便是先验分析，因为“许多树木”是原本就在森林中的，否定这个命题将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主项联想到一个或是更多的特征，而这些联想使这个主项与其他有类似特征的主项联系起来，那么这就是一个先验综合判断。例如，命题“所有的树都由木头构成”就是综合判断，因为木头的普遍要素对每一棵树来说都是共同的，无论树在何处。

各种印象的联系或统一是统一化过程的结果，是主动理解的结果。康德坚持认为，所有的联系，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

它，都是理解的根基，我们可以用通用的词称之为综合。

4. 认识范畴和道德范畴的相当之处

读者或许想知道，为什么在一篇关于道德的专题论述中，我要介绍康德知识哲学的复杂论点，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认识的基础可以应用于道德的概念。如果我们能够证实认识的范畴是我们理解现象世界的基础，那么我们也能认为它们支配着我们的道德观念。这使我们能够达到对道德命题的正确评估，而且可以判断它们是有根据的还是荒谬的，是自相矛盾的还是受到破坏性或攻击性驱力激发的，如我们在宗教或是意识形态的信念中常见的，他们所宣称的道德只服务于不道德的目标。例如，如果我们视统一的范畴为理性的和经验主义思考的最高原则，我们可以将它应用于道德的理念，这些理念不仅与所有的人有关，还以各种方式与一切有生命的事物有关。同样，对分析和综合的阐述将逻辑法则引入了道德命题中。

p179

(1) 空间和时间

空间意味着广延性以及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关系。个体存在于世界中，他如何与世界打交道，世界如何对他产生影响，以及他在世界的行为，代表了他的实在。人不是一个孤立的实体，而是一直与真实世界的事件相互作用，不仅在认识的层面，还在情感和道德的层面上。他受到世界的评判，他也评判着世界；他的兴趣、驱力、愿望、野心和希望都在他的世界这个公开的舞台上被付诸行动——他处于世上，海德格尔想要提醒我们。

时间意味着人们的行动、态度和判断皆与过去有关。世界有它的历史，在当代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发展方式中，历史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时间与将来有关，我们将我们的目标和渴望投射到将来；我们的现在的价值观不光

受到过去回忆的影响，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我们对未来的憧憬的影响。例如，工人阶级的意识和他们的政治目标总是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过去所忍受的艰难和困苦联系到一起。他们想要在将来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这激发着他们为社会公正而斗争，也影响着他们对社会现状的判断。

过去的时间和将来的时间在一种文化的意识和个体的道德意识中都存在着。如果考虑到精神分析发现的现象，我们当然可以扩展过去时间和将来时间的概念，我们发现，神经症状以及一个人的性格——他的价值观和知觉——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早期，虽然大部分被遗忘或者被压抑了，却影响着他的现在的判断和价值观。病人寻求治疗是为了解除将来的干扰。

(2) 质量和广延

p180 现象呈现到我们的感官，被我们知觉为可以被称重和测量（取得经验数据）的对象，而心理状态的数据则是由我们的主观经验所提供的。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各种各样的精神活动、冲动、心理冲突、欲望和驱力，这些都能在他们的行为中找到表达方式。通过他们的行为方式，人可以被看作是对象，对他们的行为可以进行经验描述。我们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可以从内部或外部进行观察。因此我们或许有理由将质量解释为人的心理实质，解释为投入到心理过程、思考和想法中的能量。

虽然一个人的脑的大小和重量可以进行试验观察，但它的重量或大小并不能揭示人的心理过程，而引起我们兴趣的是他的智力和思想强度。康德的脑，被誉为是所观察到的最大的脑，激起神经学家们的兴趣和我们好奇心，而康德的思想和他的智慧能量，已经并将持续不断地放射到世间，影响人们的思想。所有的能量和理念都能传播。爱因斯坦在物理世界中揭示出的质量和能量之间可互相转换，在精神世界中也能看到这个现象。我们也可以说质量代表心理过程的能量，它的广延便是理念和思维的范围。

所有的能量都能传播，但是有好的能量和坏的能量——有促进生命和毁灭生命之分。有爱便有恨；有对生命的肯定，也有对生命的否定和毁灭。谁能怀疑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破坏性能量与那些传播爱和善意的肯定生命的人是不同的？然而，精神的世界是没有广延和重量的，因此不能被称重或测量，我们的行为是经验世界的一部分，有广延的特性，在空间里有明显的形式。人不能称量一个人的灵魂；但如人们所说，人可以通过一个人的性格、价值观和态度来评估他。

所以说，人类既是主体又是客体，可以作为物质实体观察他们的外部——他们的身体，他们化学上、解剖学上以及生理上的特征，包括他们遗传的天赋和外显的行为；也可以观察他们的内部，即他们的精神和情感体验，以及他们的价值观、目标和判断，无论是在意识还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上。经验主义定向的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和医生以他们的科学方法为荣，他们只信任那些能够被观察到的东西，无论对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疾病，他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于器官障碍或动作障碍。

p181

(3) 因果关系

如果我们认为心灵和精神有能力影响身体，影响生理、化学和新陈代谢方面的功能，我们或许会倾向于认为我们不仅受制于原因，而且还成为我们自己的原因。人类创造他们自己的环境，而经常没有意识到他们在这么做，他们不得不适应他们自己制造的环境。我们借助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意志、我们宗教的或意识形态的信念，以及技术与科学，获得了改变自然环境的能力。但是我们的能力，常常倾向于回避脑皮层所赋予的，对我们的信仰和行动结果的前瞻和预测，这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

我已经提到过质量范畴是物质，是人的第四维度。对人类来说，他们的本质在他们的主观性中，为了对人类本性有一个理性的判断，我们必须分析他们的主观本质和客观实在，这意

意味着对于理性的智力来说，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此外，我们还发现，他的主观性是他所创造并生活的客观世界的动因。

尽管在存在的层面上，人遇到他所处的环境并做出反应，可以被实际经验观察到，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他的外显行为本身是由他的精神，即他“本质的”自己引起的。然而我们还不得不问，又是什么造成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成为现在的样子？不过，这就是精神分析学的任务了，为了理解它，他们不是从外部，而是从内部，把人自己的精神体验当作有效材料进行研究。

p182

(4) 自由意志

如我们已经了解的，人脑的高级皮层功能使人能够自由创建他自己的行动方针。事实上，意志的自由是道德的前提。因为如果意志取决于本能驱力、反射或是条件反射，那么就不会有选择的自由，也就不会有道德观念的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个悖论：人能够受到偏执的和攻击性幻想和驱力的驱动，无视理性和事实，他们宣称是道德职责的也会服务于不道德的目标。因此，当对别人爱和关怀的本能被否定，并让给了恐惧和仇恨时，人们就成为高压政权的奴隶，不敢实践他们的道德能力——对同伴的利他主义和体谅的情感。由此我们可以说有好的意志和坏的意志。然而当道德的情感植根于接受爱和给予爱的需求时，仍然需要确保它具有理性的正确性，因为不这样的话，它就太容易被腐化或变得荒唐，于是，统一的范畴在道德观念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5) 统一的范畴

我前面提过关于先验综合的问题，说的是，我们对事情真相进行思考（包括科学的思维）时，一个综合的观念便会起作用，因为如果没有它，就不会有统一规律的意识，无从决定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关系；就只能是无秩序无意义的印象流。我们所认为的世界的永久特征，可能不过是暂时的或错误

的。与先验分析概念不同，综合概念可以改变，我们对支配事物的规律的_{基本想法}不得不改变。然而，尽管规律的内容可能改变，但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普遍规律的统一概念，这个需要不会改变。

康德的统一范畴是理论推理的根本的和最重要的方面，他关于统一的绝对诫命（categorical imperative）是所有道德思考的必要基础：“只按照你认为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需要好的意愿作为创造性的动因使之成为可能。在追求至善（summum bonum）时，即使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困难重重，这仍然是最重要的力量。没有好的意愿，绝对诫命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规律，不会对人的行动，他的信仰，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产生真正的影响；它非但不会提升人类的道德目标，反而会被自己的、家庭的、国家的、民族的、宗教的或阶级的利益的要求所击败，反对他人、外人、敌人。统一全人类所共享的目标将会被视为一种妄想，诗人或哲学家的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罗曼蒂克的梦想，与现实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对于统一的绝对诫命，不能只根据其逻辑的或理性的意义，或其必要性对其进行评判，还要根据它的可能性来判断。

p183

绝对诫命

康德只阐述了一个绝对诫命，如他所说，这个绝对诫命符合统一规律，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是必要的。下面我要详述包含在普遍规律中，根据普遍规律得出的一系列道德命令，我相信这会使我们更进一步理解绝对诫命是如何被应用到现实世界中的。

(1) 康德对统一诫命的阐述如同绝对诫命的阐述：“只按照你认为同时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这样一来，“你的行为证实了道德的通用法则，并与之保持一致”，而且

推动它的实现。

(2) 自由和人类尊严的诫命：“决不要把一个人当作服务于你的目的的手段，而永远把他当作一个目的。”

(3) 善意的诫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既然我们不希望别人伤害或无视我们的情感，这就意味着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照顾到我们同胞的情感。

(4) 一致性诫命：要使你的行为所产生的事实与你的目标概念一致。

(5) 诚实的诫命：你设定的道德目标应是你自己和其他人能够做到的。考虑包含了全人类所有人性的普遍道德是否可能。

我们可以补充说明的是，诚实的诫命还需要我们考虑一个普遍道德的主张是否表达了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能否诚实地说我们渴望和期待它们的实现；我们是否真正想要在生命和社会中发生由绝对诫命所拟定的转变，以及我们是否真的欢迎它所需要的智力和情感的定位。

5. 重建上帝

我们必定要再一次努力倾听来自老导师、神灵、超我、上帝的声音，他用他的存在和不朽创建了一个统一的感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觉，以及他的臣民中的凝聚力和归属感。而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经验和我们现在的条件，重新评价他的启示和指令。因为文明的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一个充满爱意的上帝，一个关爱着他的孩子们，容忍他们的缺点并准备原谅他们，总是提供帮助的上帝，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变成一个好战的上帝，鼓励他的信徒们对那些被认为是他们苦难根源的人们进行报复。当他对幸福和繁荣的承诺没有实现时，他便谴责那些不信的人和异教徒造成他的子民们失

望。历史上的神与王始终都会运用这样的老策略，将他们的失败和人民的愤怒投射到敌人头上，如此一来，人们便需要上帝的保护并为了确保胜利而对他顶礼膜拜。如果上帝和国王失败了，为了保证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并维护他们的权力，他们需要一个敌人来责难。

p185

一神论的至高无上的上帝想要人类——他最终的杰作——报偿他，表达对他的感恩之情，感谢他所做的一切，还要人们去揭示他的创造即地球上的生命的奇迹，以及宇宙的神秘，而最重要的是，去实现他的目标并乞求他的承认。如康德所说：“我们不可能在拥有道德上的纯粹倾向的同时，没有想到这些倾向与上帝相关。”因为上帝知道我们如何思考和行动，因此道德的观念与他的期望有关，而我们的行为皆为他所知，并接受他的评判。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选择与某个真实的或设想的判断相联系，并借助其评价我们的行动或意图。在精神分析学中，我们称之为超我，他是内在的守卫者，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他或谴责或表扬，让我们觉得有罪或是被赞许，是我们意识的根基，无论是善的还是恶的。弗洛伊德从父权制社会的角度出发，认为作为父亲形象的超我按照他的期望和计划评判着我们，对那些与他的意图相悖或是威胁到他的权威的冲动或行动，他设置了禁忌。

在弗洛伊德认为很普遍的，受俄狄浦斯情结支配的文化中，男孩和女孩的性冲动或是自恋式自我肯定是避讳的，因为这是反抗父亲的，会导致他们的邪念，父权制宗教认为这是人的原罪状态，只能通过屈从于天父，乞求他的原谅，才能得以克服。所以既有善和爱的超我，又有恶与怒的超我。弗洛伊德坚持认为，强加给人们的禁忌和对社会权威的屈从，是各种形式的文明的普遍基础，是文明人的神经过敏症和不满的原因。实际上，大多数的文明社会都赞成一种相当悲观的人性观点，但是人们却不停地祈求上帝帮助他克服他的邪念，他们请求上

帝原谅他们的罪过，他们拍打着胸脯，向上帝俯首，用歌声和祈祷赞美他，希望能激发他的好意，重建他对人类的爱。我们祈祷和平，却在彼此间无休止地发起战争；我们对我们的同伴实施暴政、压迫和剥削，并威胁到这个星球的生命。但是我们仍然相信上帝对人类怀着好意和爱心，并乞求他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罪恶的本性。

上帝不再回应我们的恳求。他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尽管我们还能从那些我们不理解的先知书里读到他的话。然而我们必须提醒上帝，他许诺过我们，在某个时候，我们将会谈话，我们能够“一起讨论”。现在，在这个可怕的二十世纪，数百万人死于战壕，死于大屠杀的暴行，而狂怒和暴力不断光顾芸芸众生……这个时候，不就是与上帝谈话，询问他为何抛弃我们的时候吗？

当我们同他交谈时，他回答我们说，我爱过你们而且依然爱着，我想要为我赋予了理性和道德的物种感到骄傲，然而你们抛弃了我。无论你们把我看作是上帝还是生命力，抑或是宇宙的能量，对你们来说没有什么区别，这只是你们以你们所理解的形式来看我。但是我曾给予你们的爱和你们心中的爱却似乎被原始的攻击驱力打败了，被破坏性和虐待狂，以及它们带给你们的快感打败了。你们的心灵已经被这些变态的东西所占据，我帮不了你们，你们必须展示出你们的善意和战胜它们的决心。现在需要你们来发挥你们的理性才能，去弄明白这些变态行为的根源；你们一定要省察，为什么爱神，我的使者，会不断地被他的对手死神打败。如果你们还想生存下去，现在是给爱神——生命力——表现胜利机会的时候了。

唔，听到上帝的声音真不错，他是我们用来代表生命力的形象，鼓励我们去肯定他。

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者，我明白他所说的我们内部天生的爱是什么意思，因为在我的工作中，我发现人们不是天生愤怒

或仇恨的，他们并非生来就恶而是生来需要爱。但是，是什么把爱转变成攻击，对同伴的不信任、猜疑、嫉妒、对权力的狂躁需求或是消极绝望；又是什么让他们觉得不合时宜，不被承认，忧惧生活，成为妄想狂或精神错乱的罪犯？虽然在以前的书中，我曾经描写过爱转变成多种形式的恨和破坏性的过程，p187但在这里我还是要对这些过程进行一个简短的回顾。

6. 死神的起源

首先我要说的是以不同的方式支配个体和社会生活的消极品质，是拒绝爱而产生的副作用。从最早的婴儿期开始，个体便在寻求爱、温暖和注意。它的嘴唇高度敏感，充满渴望，这个用来定向和探索的器官很快让婴儿意识到妈妈的反应。婴儿在世界上最早接触的是母亲的乳房。天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信号系统，用各种形式的快感来进行爱的交流。我们探求温暖和爱，通过愉快的感觉意识到它。如果我们感到首要的对象——母亲——对婴儿来说是宇宙的具体体现——对我们的渴望给以快乐的回应，那么我们的欲望便是好的，我们便是重要的、为世界所需要的。深情的母亲的愉悦感会唤起大范围的性欲情感，常伴有阴道兴奋；而我们也能够在男性婴儿中观察到生殖器激动，甚至是勃起。

然而，这一基本的过程可能会受到很多干扰，尤其是来自于母亲的，她遭受性欲禁忌和不同程度的愉悦焦虑。这反过来会影响母亲与婴儿的力比多沟通，她的乳头和身体接触会缺乏快乐的感觉，没有力比多和温暖。她会显得冷漠和谨慎，她的身体紧张、焦虑，像穿了盔甲，婴儿会感受到这些而变得非常害怕。一个女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她与丈夫的关系，他们之间的爱或冷漠，她不被需要的感觉或是反过来她不需要同伴，都会极大地影响她给予温暖和爱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孩子最渴

p188

望的。她自己童年被抚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她给予她的孩子爱的能力。除此之外，一种文化对性爱和性愉悦的普遍态度——它是肯定和准许人类的性爱需要还是谴责这样的需要，视其为罪恶——也有很大的影响。

孩子在与母亲的接触中体验到社会对性欲的禁忌后，就会变得害怕和失望。他对这个世界和披着盔甲的乳房的反应便是想要攻击乳房，以便刺穿拒绝给予的护甲，一直到达它下面的力比多。还有一点必须要了解的是乳汁的品质，乳汁的化学成分会受到母亲普遍的性欲态度尤其是对孩子的性欲态度的影响。乳汁的味道或是酸、苦、难以接受甚至是有毒的，或是甘甜、令人愉快的，反映了母亲对孩子以及对她自己的态度。如果感觉不好，孩子的嘴唇和下颚会紧张起来，以至于整个身体都紧张，喉咙、胃和生殖器、四肢、呼吸和消化系统都会绷紧，呈一种防御的和拒绝的体态。孩子焦虑时（结果常常变成恐惧）会开始踢、叫喊、憋气以及大量与平时完全不同的反应形式，每个母亲都可能见过但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小孩不能讲出他的需要和情感，他会用身体来交流。在口唇水平，他的下颚肌肉紧张表明害怕和生气，他会攻击或咬，部分是为了紧张的缓解，而更多的是为了刺穿母亲的护甲，释放出她隐藏或拒绝的力比多。因此，他变得有攻击性是很自然的，否则他就会孤立，感到不被需要、不被爱，他的存在不被承认。如果他不进攻，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什么也不会进行，而他也就不再存在了。力比多的死亡意味着一个人的死亡，这对婴儿来说是完全真实的，对成人也是一样，我们可以理解有些人变得好斗是为了减轻他们的焦虑。然而，如果母亲感觉到了孩子的需要，允许她自己对之做出回应，他的气愤便会回撤或只保持一部分，对感知到的忽视做出敏感的反应，又从爱得到安抚。但是，如果母亲不能做出回应，而孩子也感到不能使她做出反应，那么他会感到无助，生气会变成愤怒，如我们所

说，无助伴随着盲目的愤怒，具有破坏性。通俗地讲，如果我们被囚禁在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包围的地方，我们又无法让它消失，那我们就只有用尽我们全部的力气攻击和摧毁它。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许多年轻的男女身上，他们感到世界忽视他们，不回应他们的需求，不关心他们的存在，于是他们报以愤怒，与他们周围的世界为敌。这种情况经常导致虐待狂，导致追求虐待本身作为目的所提供的快感。他们觉得无助，对改变他们的状况一筹莫展，虐待狂是他们的需求得到承认的唯一出路。暴力罪犯和精神病患者都在很大程度上固着在这种反应形式上，它支配着许多民族或部落的思维和行动，驱使他们犯下最为残忍的罪行。

一个个体在发展的最初时刻、最初几个月和最初几年的原始环境，对他的心理具有决定性影响，会影响到他爱他自己和被他所生活的周围环境和所爱的自恋需求，或作为一个人他的需求被承认。如果他作为一个年轻人或是成人，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与周围人建立起积极的关系，那么他就能抑制或是净化他在最初年月里的创伤。他自恋恢复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从事的工作，以及他为了赢得承认和奖励所制造的东西。在他建设性的工作中，他将自己认同于他所生产的东西；他再造他自己，从他制造出的东西中认识自己。他的工作不单纯是一种手段，在很多方面工作本身就是目的。他对这个世界、对文化、对他的社会有所贡献，他赢得了尊重和承认。所以说，命令——决不要把你的同伴和他的工作当作服务于你的目的的手段，而要把他本身当作一个目的是正确的，因为如果人们的劳动变成只是一种手段，那么劳动就剥夺了一个人的自尊，他就不再把自己当作一个独特的人而赏识自己、肯定自己；他会成为一个奴隶或机器人。

我们或许会说，没有成千上万的奴隶，我们就不会建造出金字塔；没有大量的劳动力，就不会有大教堂和宫殿；即使他

p190 们当中的一些人具有高超的技能，作为市民他们也屈从于牧师和国王的强权，遭受剥削，不被当作人来看待。用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使自己远离了手工业者行会和社会文化的管辖，从而可以自由地为他们的货品探索和开发潜在市场，毫无疑问，他们生产出丰富的产品，发展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但是这么做，他奴役他的工人旨在服务于他的目标，他强迫他们成为工业化大规模生产中的无名小卒。这就是为什么工人阶级有时会被集体的愤怒淹没，想要摧毁制约着他们生活的体制。甚至在近代，革命的狂暴往往主要被摧毁资本主义的渴望所推动，但却不知拿什么来替代它。

具有深远意义的是，犹太人通过反抗奴役他们的埃及人，重拾了他们的身份感，并作为一个民族开始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接受了上帝授给摩西的十诫，并得到了一个为他们提供了目标和未来远景的道德架构。有了上帝的指引，他们不再感觉无助。另一群人——受压迫和贫穷的工人阶级——的先知，提出了包含一切历史和自然规律的普遍阶级斗争的看法，指出了工人们战胜压迫者的胜利，并给予了他们意义和目标感，将他们的愤怒转变成革命的意识形态。他们不必再感到无助，他们的怒火会被引导到一个有组织的斗争中，在必将到来的无阶级社会中，克服他们的去个性化。

尽管马克思鼓励工人们行动起来，夺回他们的人性，但他在许多至关重要的地方是错误的。他的理论，他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是有缺陷的。我们也可以问，上帝关于人类和犹太人的做法是不是错误的？他对人类目标普遍统一的期望是不是也有瑕疵？或许他没有充分预想到，他的道德命令对人类来说遵守起来过于困难了，会不断被他们的心理冲突和固着打败。难怪上帝自己有时也会变得愤怒，对他所选择的人们大失所望，用破坏来威胁他们，并不断指示他的先知警告他们。但是他的意愿是好的，他爱他们，他一遍一遍地试图将他们引入正途。

p191

《圣经》中讲述了上帝的期望之间相互矛盾的故事，不单是关于他所选择的人，还有他选择的用来理解和追随他的目标的物种，以及他们在实现他的目标时所经历的困难。因此，他明智地要求我们寻找是什么阻止了我们，并要求我们克服我们的逆反和倔强。在我作为一名临床医学家的工作中，我有大量的机会观察困扰人们灵魂的矛盾，并在若干书中将它们写了出来。我们必须认识到，上帝是生命力和爱神的化身，他正确地要求我们理解和改造我们自己，以使我们能够遵从他的意图。

在这里，我要简单地提及人们的心理冲突的另一个方面，它对社会和文化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肛门力比多代表了力比多发展和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类作为肉食者，排出的粪便是有毒的，对粪便的感知也是发臭和肮脏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我曾经提过的，它又是他们身体的产物，是他们灵魂的表现之一。起初，这种物质被孩子看作是鲜明的、活生生的、金黄的，他想为他所制造的东西感到自豪，并展示给他的母亲，然而他会不同程度地体验到母亲的嫌弃和排斥。

如果她的厌恶过于强烈地表达出来，便会使他感到自己被拒绝，自己是肮脏的和令人讨厌的，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肮脏的人。如果，相反的，母亲的反应是同情的并表现出宽容和持续的爱，但却表明玩耍或者往自己身上涂抹粪便、把粪便放进嘴里是普遍的禁忌，他会将他被禁止的快乐升华，将粪便换成其他材料。他学会把弄东西，把它们塑造成可识别的形状，赋予它们以他灵魂中的形象。他学会从工作和制造东西中得到乐趣，并把这种快乐奉献给他的同伴。但是，如果早期他因为肮脏而遭遇到母亲的排斥，而这种被排斥感过于强烈，并成为一种固着时，他会变成排便拖延、固执，而且经常被强迫性地清洁自己。仪式性的清洗成为神经性强迫症状，并成为宗教仪式重要的内容。

清洁和肮脏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和文化的等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王侯和贵族们是干净的，他们的身边充满了气味愉悦的芳香，他们看起来被精心清洗和修饰过；而平民、工人们，在工作中把自己弄得很脏，被看作是污秽和下等的。特权阶级们的合乎礼仪的、整洁的衣服象征着他们的优越，而平民百姓们不拘礼仪的、不整洁的衣服加上他们不洁的习惯则被看作是下等的。那些把自己修饰得一尘不染的牧师，他们的任务便是用净化仪式来清洗人们，他们把人们浸入圣水中或是将圣水洒到人们身上。正统的犹太教徒，上帝律令的忠诚拥护者，将上帝的道德戒律误解为对仪式的强迫执行。

有趣的是，在一个试图表现对传统等级观念的反抗的文化中，许多人会故意地用工人劳动时那样的步伐走路，或是流浪；而女人们则会不满她们顺从和矜持的传统角色，凭借性感撩人的穿着和外表，盛气凌人的宣称她们的平等或优越。对父权制所强加的性禁忌的反叛，能够在性自由放荡不羁的表现中找到表达方式，将乱交视为一种美德，而女权主义者——女性自由的劝诱者——会认为家庭是过时的，甚至认为男性不仅对她们自己，而且对她们的后代来说，都是多余的。我们一定记得，许久以来，与性有关的事都被冠以污秽，而女人也被认为是不洁的。所以我们遭遇的，是对强烈反对这些传统观念的反应形式。因此，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文化历史的时刻，我们发现反叛和攻击在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中，就像一种标准的行为模式，但是对于用什么来替换我们想要摧毁的东西，我们却毫无想法。反叛于是成了目的本身，并激发大量以前曾被压抑的原始驱力浮出水面。

p193

理解我们的愤怒和狂暴、攻击和虐待狂的潜意识根源，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们像分裂一个个体的灵魂一样分裂人类，但只认识这一点还远远不够。

是重新构造老导师和上帝的时候了，让他与人类对话，将

他们带入当今的时代，这样，我们就能认可他们的含义和他们对于我们所处时代的适用性；我们便可以教会父亲们如何与他们的孩子融洽相处，以及如何教导孩子们。而孩子们必须要加以教诲，树立他们能够认同学习的榜样，不通过发怒而是通过爱和情感的方式；孩子可以自由发问，讨论他们的问题，不仅要他们知道父亲在想什么，而且要让父亲知道他的孩子们在想什么。

第七章 理想社会之路

我们要达到怎样的道德目标？我将提出一些主张或座右铭，尽力给道德的目标下一个定义，我相信这些警句对人类都适用。如果一个道德目标的定义是普遍正确的，它应当既符合道德标准的原则，又符合事实。符合了以上两个条件，才可以被认为是正确的。如果仅仅符合了前者，即绝对诫命原则，可认为它是部分正确的；但如果两者皆不符合，则必定是错误的。我之所以称之为座右铭，是因为尽管我认为它们是普遍正确的，但在它们能够被称为定律之前，进一步讨论并达成一致仍是必要的。然而，如果用我以上定义的方法来判断，它们仍然被证明是正确的话，那么它们就应被看作是我们的职责，或至少是我们的志向。

1. 道德目标的座右铭

(1) 享受爱与被爱的感觉，不要畏惧这种感觉，也不必在同他人的交往中掩饰它。

(2) 对他人的感情要做出反应，同情他人遭受的悲伤和痛楚，也感受他人的快乐和幸福。

(3) 享受自己和他人的性感觉，不要有焦躁和负罪感，但决不要不顾他人的愿望和感受而把他人当作性满足的工具。决不要逼迫他人屈服于你的欲望，决不要使用暴力去获取

满足。

p195

(4) 和他人一起参与快乐的、有创造性的活动，不要觉得自己高人一等，伤害他人的自尊。

(5) 在工作和建设性的活动中，在技能的实践中珍爱自己的乐趣，在自己生产的东西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通过创造和为他人做出贡献来感受自我实现和尊严。

(6) 学会并养成对自己的行为和追求的目标负责任，作为社会的积极一员，为自己能够履行职责而深感骄傲和满足。

(7) 培养你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对一些说法和指令要随时进行检验，看它们是否合理，是否是道德的，并预测它们的后果，这样才能确保你的自由和自治。

(8) 对自己观点的逻辑性和价值进行检验，评价其内在的因素，最重要的一点，不要把你的强迫观念和偏见作为真理提出来。决不能为了证明你自己的信仰而捏造事实。

(9) 对那些以权威的名义提出的言论和要求，在没有检验其价值和逻辑性之前，决不要屈从。注意培养那些对人性的发展有益的观念和行为，发掘自己的人性优点。

(10) 识别出那些次要的驱力：侵略性、虐待、贪婪、占有欲、渴望统治他人的权力、嫉妒和报复；不要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而采取一种固执的自以为是的态度，也不要把这种强迫性冲动投射到他人身上，而发展成妄想狂的恐惧，这种恐惧常常控制个人和社交关系。

(11) 努力发扬博爱、同情和相互信任等美德，并把它们作为生活的好品质，良好愿望的源泉，并以在社会上发扬这些美德为己任。

发扬这些座右铭的社会可称得上是一个美好的社会，那些尽力去培养这些美德的个体有着良好的愿望。

p196

这些座右铭涉及个体的心理状态和价值观，涉及自由和责任，涉及爱、美、真理和公正等最高目标，这时我们立刻想到

的问题是，这样的—个理想社会应是什么样子。

我们可能会说，详尽解释道德的原则固然很好，但问题是如何将此应用于现实的世界中，在政治、立法、当前的经济体系及生产模式和人际关系中，以及如何在不同的国家、种族和宗教中确保和平和善意。

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应为大众和社会机构扮演一个向导的角色，引导他们去了解现实和存在的真谛，重新发掘他们关于美和善良的先天知识，并进一步确立它们的存在。当柏拉图被问及为何在他年事如此高之际还要长途跋涉去狄奥尼西奥斯二世（Dionysius II）的宫廷作顾问时，他回答道，这是他必须做的事情，否则他将被看作是一个只会说空话的人。雪莱亦主张诗人为人类思想的幕后立法者。

因此，如何将道德原则应用于我们的社会，我要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2. 工作是一种创造

好的工作带来满足感，它不仅仅是一种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工作本身是一个目的；好的工作生产出好的产品，同时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带来了满足感。什么样的社会将再次以技巧和手艺为荣，鼓励人们与他们生产的东两认同，将自己的产品看作是自己灵魂的镜子，那西索斯（Narcissus）^{〔1〕}在劳动产品中重生？

“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不必徒然劳动。”（以赛亚书 65：21）

〔1〕【希神】那西索斯是一名美少年，因自恋水中的美影以致憔悴而死化为水仙花。——中译者注

如果劳动者不被赏识或不被认识——在我们的脑海中没有位置，消费者就不会对劳动者有任何感激之情。机器人和电脑生产的大量商品充斥了商店，使生产者同他的产品疏远，没有人会知道谁是生产者。

毫无疑问，工作是维持和改善生命的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没有工作我们会挨饿，就会有令我们痛苦的失败感。这个规则以不同的形式适用于所有的生物。对人类而言，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自我生存，也是为了自我实现，因为在个人技巧的实践中，我们看到自己投射在劳动成果中，因此我们感到了个人尊严，同时对他人福利的贡献使我们有一种满足感。（第五条座右铭）然而如今的社会，工业计算机控制着大规模生产，有时被称为后工业社会，这一条座右铭在实践中与现实相抵触而被抛到一边。生产者被迫服务于高科技的机器人，从而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机器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统计学中的一个数字，工厂服务于工业集团的财政利益，而工业集团依靠银行、金融企业和投资公司，这些金融机构全都在证券交易上争名夺利。

随着推销专业——广告、公关和媒体——的迅猛壮大和加强，进一步减少了消费者与真正生产者的直接联系，致使生产过程中个性丧失的影响更为深远。与生产者一样，产品也是非个人的，不能使消费者感到这些产品是为自己生产的。

几乎没有孩子，事实上也包括成人，能够说出超市中陈列的食品从何而来。他们从未见过一只真正的奶牛或是一只猪，也没有见过农夫挤奶和饲养猪，小麦是如何种植，如何变为他们每天要吃的面包。他们也不知道商店中摆放的，电视、互联网和报纸中广告的无数的商品是怎么做出来的，是谁做的。因为在产品和产品制造者之间看起来没有任何的关联，我们不知道感谢谁为我们提供需要的商品，如果我们感觉不到感激之情，我们就得不到满足。

我们已经看到婴儿的健康成长不仅仅需要身体上的营养，也需要母亲的好力比多，才能感觉愉快。如果母亲在她给予的行为中没有传达出她的爱和愉悦，孩子就会感到不满足，感到自己是多余的，有一种被拒绝的感觉。这些最初的体验在成年人当中以一种潜意识的方式继续起作用。他要知道至少会想像是谁提供了这些商品，这样，消费的行为就是一种特别的经历，使他感到自己也是特别的，这种感觉不是短暂的，而是一种持续的感觉，并渗入他的性格。否则的话，他会疯狂地寻求满足，无法填满他的欲望，就像患有易饿病的人一样狼吞虎咽，直至胃里再放不下一点东西，然后吐出所有的东西后，又继续狼吞虎咽，始终没有满足感。我们可以说，在我们的大规模生产文化中发生了集体易饿病，公民不断膨胀的欲望看来永远得不到满足。

如果消费的商品缺乏爱和感情，这就会让消费者感到空虚，无论他得到并使用多少这样的商品，他都将想要抵制它们，清除它们，把它扔出去，然后寻找另外一个消费目标，寻找他所渴求的特殊体验。清除象征着呕吐，为新的功能更强的大量商品腾出空间。这是一个拒绝和抛弃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是为了长远而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当前，例如时装工厂为我们提供了可有可无的服装，它们象征着垃圾，它们蔑视我们天生对美的想像，事实上，越是让人无法容忍的就越好。他们的产品中有一种内在的退化，而这恰恰在当今不断追求新异，追求与众不同的市场上增加了他们的销量。

p199 如果说我在夸大事实，那么请看一下报纸及彩色增刊上的那些不计其数的照片，T型台上的模特，关于时装设计师和时装业大亨的充满激情的报道。模特们的表情也值得一提，他们表演时没有一丝的愉快的表情，看起来他们讨厌自己所穿的衣服，讨厌人们愚蠢到去买这样的衣服。很多模特看起来患有厌食症，易饿病的另一面，都是拒绝型综合征的表现。他们

精心设计出的性感是撩人的，但是不快乐。

人们开始提出质疑：为什么如今的社会如此崇尚消费主义？如今社会上的富人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为什么总是觉得社会前途暗淡，这是一种临近于精神忧郁症的清醒，或可以称为愁苦主义。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怎样才能将自豪感和乐趣融入生产的行为中从而使工作成为一种真正的有创造力的活动呢？

3. 培训和教育

毋庸置疑，每一个工人都应该有能力获取他所从事的行业的技能，这样他可以享受作为一个商品创造者所有的自豪和愉悦感，以及对商品质量的满足感。不仅仅是商品生产者，每一个人在他长大成人之时，不论他选择了哪个领域来发展都必须学会必需的技巧，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利国利民的有价值且受人尊重的人。一个好的社会应确保每个公民都具有一定的技能，根据每人不同的才能而获取不同的学位，不应该有缺乏技能，丧失自尊和谋求适当生存能力的人存在。人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才能，但有些才能更为突出，突出的才能决定了一个人在生活中想要扮演的角色。

赞誉一个孩子的才能应当在教育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教师应鼓励孩子们交流他们长大以后想要做什么，尽管儿童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关于以后要做什么的想法。很重要的一点是使他们知道，社会重视他们的感受，对他们的未来抱有期望。对孩子能力和才能应当进行更准确的评估，这样有助于引导教育者和孩子们自己去选择最恰当的职业，这是一种积极的推动，鼓励他们发挥最好的能力，而不是当前在能力倾向测验中流行的消极强化，这种消极的测验强调孩子的不足之处，将他们排斥出“最好的职业”，给人一种歧视那些孩子的感觉。

重视并发展每个公民的能力，赏识他们的才干，这对整个社会是有利的，许多人因为自己的才能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而变得不满，甚至充满了敌意，社会因此流失了大量人才而受到损害。必须鼓励那些喜欢在制造实际物品中施展自己技能的人成为行业中的师傅^[1]，在他们成为手工艺人的过程中，应该有学徒期，接受培训。不应该强迫他们待在学校里的时间长于所需要的时间，如果他们在教室里不再感到有趣，索然无味，但不得不长年待在教室里，会使他们感到厌恶憎恨，焦躁不安和反叛。这样的孩子，在十五岁左右应该进入作坊或工厂的工作环境当学徒，在那里他们可以学到如何成为一个称职的工匠，获取相关的文凭，最终取得行业的师傅（或硕士）资格，如果他们愿意，可以开办自己的公司或成为大型企业的管理者。

每一个作坊或工厂都应责成招收一定数量的学徒并支付一定的工资。另一方面，青少年应选择进入中等专业学校或专科学校学习，接受自己所选择专业的训练。那些渴望智能含量比较高的活动的孩子应该在中学学习更长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

商品的生产者在所属的行业中应有技工或师傅（硕士）文凭，选择其他行业领域并在其中深造的人也应该有相应的学位。所有这些学位应得到公众的承认，承认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角色中的天分和能力。这样有助于打破社会阶层中的杰出人物统治论的势利形象，只要在自己选择的行业中能胜任，每个人都应被看作是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离开学校较早的孩子，他们不想让自己头脑中充满那些看起来与自己无关的信息，应该有机会去熟悉自己文化中的智力成就和传统。至少每星期一次，他们应该去工艺学校（工艺学校在社会中的作用应该重建）或是职工大学来充实他们

[1] 师傅与硕士在英语中是同一个词，这里亦是双重意思。——中译者注

自己。

由于现代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中间人从事商品的推广和销售，真正从事商品生产的人大大地减少了。一个全新工业需要广告业、公关、市场分析、会计工作，需要所有这些领域的专家，使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数量不断膨胀的专家们为如何完成手头的任务费尽心思，而渐渐忽视了他们对整个社会有什么影响。他们不仅致力于为所服务的工业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也致力于为自己获取更多的利益，提高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获得最大利润。（第六条座右铭）我们应鼓励他们将自己的工作看作是对社会的积极贡献，看待他们的角色也应考虑这个目的。

这个进程同计算机的出现有着紧密地联系，而如今，计算机已经成为我们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 机器的人性化和人的去人性化

我们已经看到，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我们把运动感觉外化到工具和机器上，以提高我们的工作能力，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工具发展成为机器，在工业生产中控制了生产过程，机器学会了越来越多的人类的技能，而工人们由于掌握的技能越来越少，逐步成为了机器系统的奴隶。随着科技的“进步”，我们不仅将自己工作的技能外化到机器的人性化上，同时把我们的心灵也外化到机器的人性化上，这样机器不仅仅规定了生产过程，同时还规定了我们思维的方式。被称作“思维机器”的东西已经具有了许多原来是人类所独有的能力。机器不仅仅盗用了工作过程，也盗用了我们的逻辑能力，对未来的预见，做事情时区别对与错的能力。在某些特性方面，机器的程序要高明于人的思维，人们感觉到自己越来越依赖于机器的指令。

然而，尽管计算机在决策速度上高于人脑，它却不具备人

类思维最重要的特性。它们不具备常识，它们不知到雨水是湿的，母亲的年龄要比女儿的大，它们不能像人类一样将感情与现实中的事件相联系，它们不知道人为什么会高兴或是悲伤。它们所能做的仅仅是随时对提供的数量关系、数学和统计的数据信息进行呈现和演算，为会计、管理者和金融投机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事实和一些基于统计的预测，预测怎样做可能获利。计算机的世界只充斥着数字和符号，它们不会知道是什么驱策人们去寻求他们需要的信息。在一个即时信息和即时决策的世界里，没有时间去反思，去质疑我们的动机，或是考虑我们所做决定的长期后果；我们不是经过反复思考做出决定，而是立即决定。我们效仿计算机的反射方式，世界成了一个反射主导的世界。时间很短，而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为了不错过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我们强迫自己去做所有的事。即时的信息带来了即时的满足感，互联网和电子邮件带来了即时可得的商品，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无法拒绝这些即时可得的商品。贪婪和占有欲无处不在。

p203 我们的灵魂和心智，我们的身体行为，都退化到反射支配的冲动。这一点在我们文明中随处可见，艺术、歌剧、文学，还有年轻人对过得快乐的看法：咆哮、充斥着迷幻药的聚会、毒品。节制曾是文明的准则，如今被屏弃了。这是一种能量的爆发，它使得人类大脑中的初级区域得以放任，而皮层的前额叶被“短路”或遭到压制。这一点在电影、电视以及广告中那些支离破碎爆发性的图像中表现出来。计算机对于美和道德一无所知，它们提供的信息和分析从不考虑美学家品位。

政府认为好的教育应教会年轻人使用计算机的技巧，这样推崇计算机信息加工的逻辑性和速度，摧残了年轻人的心智能力；事实上，政府在推卸他们的责任，将培养下一代的责任推给了计算机。

在迅速提供信息方面，计算机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显示出超

凡的能力，譬如在紧急情况下找到一个管子工；找到你想要读的书的作者姓名；在最后一刻计算机可以为你弄到一张电影票，诸如此类的事情。这些可以认为是有用的，在道德上是中性的。但有一些其他类型的信息却有着极为深远的道德意义，他们也可以用于攻击性、毁灭性的目的，譬如如何造出杀伤力最大的化学武器；如何制造微小的具有自身繁殖能力的自动机械；如何去克隆人或者动物而不去考虑长远的后果。信息总是为目的服务的，我们必须学会去问那是什么样的目的，因为目的总有好坏之分。信息可以为我们的贪欲服务，为我们渴望财富服务，为我们贪求权力服务，帮助我们消灭那些我们认为是敌人的人；同时也可以为我们良好的意愿服务，为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出一份力量。这样，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计算机已经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我们的道德观念。我们为了什么目的需要计算机信息？信息服务于我们什么样的意愿？这些东西听起来很简单，十分显而易见；但一旦我们丧失了道德感，也就是我所称的“道德真空”，每一个冲动或是欲望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对计算机提供的信息不加选择地使用，就会发生真正的危险。

我们遇到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意识到道德命令（moral imperative），不仅仅在使用浩如烟海的信息时，也在处理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时意识到道德命令。这一点，正如我试图说明的那样，是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论对孩子还是对成人。首先，作为家长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应该教孩子懂得一些道德的基本规则，告诉他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倾听他们的声音，发现他们如何反应，并且“和他们讨论”。随后，作为家长的职责的延伸和转移，学校应承担起教育的职责，学校不仅要给孩子们提供各种有关事实的信息，更要将占社会文化主导地位的价值和道德观念展示给孩子们。与宗教学校谆谆教导其教条不同，现在相信观点自由，应教给学生人文主义的道德

价值观，将体谅、关怀我们的同胞作为我们的责任。

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由于技术的进步而实现了工业化和自动化，并将其传播到全世界，现在应该考虑在“进步”对人类生存造成实在的危害之前，停止继续“进步”。启蒙运动的观点，那些曾经孕育了科学和技术新生的观点，是不是应该重新审视一下呢？这样我们才可以重新将其应用于实践当中。对科学技术进步不加思考的追求是“盲目的进步”，我们必须睁大眼睛，看清我们想要去的地方，沉思我们的将来，问自己我们到底希望社会进化到什么样子。我们必须询问、检验并讨论，作为一个物种，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不仅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地球的命运负责，对我们所知道的生命负责。我们必须学会不停地改进自己思考和做事的方式，以避免陷入灾难。这一点不仅仅关系到未来生存的问题，更是作为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形式——人类所应具有的问题。

我已经评述了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天性中积极和消极方面的一些标志。当然还有许多危机以其他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必须要将它们联系起来，作为整体问题来面对。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因此我们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有自由选择破坏或是促进生命。

现在是创造我们大脑更高级部分的时候，发挥其所有潜力，如此人性将最终诞生。这也许不容易，但是，所有的诞生都伴随着痛苦，一旦实现了人性的诞生，那将是巨大的愉悦和欢庆的源泉。

参考书目

- Atkins, G. Douglas & Morrow, Laura, eds: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Macmillan, 1989
- Andreski, Stanislav: *Social Sciences as Sorcery*, Deutsch 1972
- Andrewes, A: *Greek Society*, Penguin, 1991
- Austin, J. L: *Sense and Sensibilia*, OUP 1962
- Ayer, A. J: *Language, Truth and Logic*, Penguin, 1990
- *The Problem of Knowledge*, Penguin, 1990
- Bachofen, J. J: *Myth, Religion and Mother Right*, Routledge, 1968
- Barthes, Roland: *The Death of the Author*, Hill & Wary, 1977
- Bell, Danie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Heinemann, 1974
- Benedict, Ruth: *Patterns of Cultur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9
- Bowra, C. M: *Ancient Greek Literature*, Butterworth, 1933
- Boyne, Roy: *Foucault and Derrida: The Other Side of Reason*, Unwin and Hyman, 1990
- Brehier, Emile: *The Hellenic 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reton, André: *Manifestoes of Surreal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 Briffault, Robert: *The Mothers*, Macmillan, 1927
- Bronowski, J. & Mazlish, B: *The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from Leonardo to Hegel*, HarperCollins, 1960
- Burckhardt, J: *The Civilisation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 Penguin, 1990
-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The*, Volumes 1 & 2, CUP, 1980

- Calvin, William H: *How Brains Thin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7
- Campbell, Joseph: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Princeton, 1968
- *The Masks of God: Primitive Mythology*, 1973
- Carnap, Rudolf: *Logical Foundations of Probabil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 *Theoretical Questions and Practical Action*
- Chadwick, Owen: *The Reformation*, Penguin History of the Church, 1970
- Chalmers, D: *The Conscious Mind*, OUP, 1996
- Childe, V.G: *Man Makes Himself*, Watts, 1936
- Clark, Grahame: *World Prehistory*, CUP, 1969
- Clark, W. E. Le Gros: *The Antecedents of Man*, Edinburgh UP, 1962
- Cohn, Norman: *Warrant for Genocide*, Serif, 1996
- Crick, Francis: *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 Pocket Books, 1995
- Crook, J. H: *Gelada Baboon Herd Structure and Movement*, Symposium Zoological Society London, 18, 1966
- Damasio, Antonio: *The Feeling of What Happens*, Heinemann, 2000
- Dart, R.A: '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 (*Nature*, London, 1925)
- *Adventures with the Missing Link*, Viking, 1961
- Derrida, Jacques: *Positions 1972*, Athlone Press, 1981
- *Structure, Sign and Play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Human Sciences in the Language of Criticism and the Sciences of Man*,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0
- Descartes, René: *'Discourse on Method' and Related Writings*, Penguin 1999
- Ditfurth, Hoimar von : *Der Geist fiel nicht vom Himmel*, Dtv, 1991
- Dobb, M: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1963
- Dobzhanski, T: *Mankind Evolvi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 'Cultural Direction of Human Evolution' (*Human Biology*, 1963)
- Dubos, R: *So Human an Animal*, Transaction Pub., 1998
- Einstein, A. & Freud, S: *Why War?* 1933
- Ellul, Jacques: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Random House, 1967
- Erikson, E. H: *Childhood and Society*, Vintage, 1995

- Farrington, B: *Francis Bacon, Philosopher of Industrial Science*, Macmillan, 1973
- Finley, M: *Early Greece*, Chatto & Windus, 1981
- Foot, Michael: *The History of Mr Wells*, Doubleday, 1995
- Fox, R: *In the Beginning – Aspects of Hominid Behavioural Evolution*, London, 1967
- Frank, Philip: *The Valid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 Beacon Press, 1955
- Frankfort, Henry: *Kingship and the Gods*, Chicago, 1948
- *The Birth of Civilisation in the Near East*, London, 1951
- Frankl, George: *The End of War or the End of Mankind*, Globe Publications, 1955
- *The Failure of the Sexual Revolution*, Kahn & Averill, 1974
-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Unconscious*, Open Gate Press, 1990
- *Archaeology of the Mind*, Open Gate Press, 1992
- *Civilisation: Utopia and Tragedy*, Open Gate Press, 1992
- *The Unknown Self*, Open Gate Press, 1993
- *Exploring the Unconscious*, Open Gate Press, 1994
- Frankl, Viktor: *The Will to Meaning*, Plume Books, 1989
- Frazer, Sir James: *The Golden Bough*, Macmillan, 1922
- *The Magic Art*, 1911
- Freud, Sigmund (see Standard Edition, Pelican Freud Library, Hogarth):
- (1905) *Three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Sexuality*
- (1913) *Totem and Taboo*
- (1915-17)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 (1921)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
- (1927) *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 (1930)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 (1933)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 Fromm, Erich: *Psychoanalysis and Religion*, Yale UP, 1950
- *The Sane Society*, Holt, 1990
- *The Crisis of Psychoanalysis*, Jonathan Cape, 1970
- *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 Pimlico, 1993
- Gimbutas, M: *The Goddesses and Gods of Old Europe*, Thames & Hudson, 1974
- Goldman, Lucien: *The Human Sciences and Psychology*, Jonathan Cape, 1969
- Goodheart, Eugene: *The Sceptical Dispos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 Gould, Stephen Jay: *Ontogeny and Phylogeny*, Harvard UP, 1985
- Guittari, Félix: *Chaosmosis: 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Hammond, N. G. L: *The History of Greece to 332 BC*, OUP, 1959
- Harrison, J. E: *Prolegomena to the Study of Greek Religion*,
Princeton, 1991
- Harth, Erich: *Windows on the Mind: Reflections on the Principal
Basis of Consciousness*, Harvester Press, 1982
- Helbaek, H: 'First Impressions of the Çatal Hüyük Husbandry'
(*Anatolian Studies XIV*, 1964)
- Hilton, Anthony: Article from *Evening Standard*, 3.4.96
- Howells, William: *Mankind in the Making*, Secker & Warburg,
1961
- Hudson, Christopher: Article from *Evening Standard*, 14.5.96
- Hudson, Liam: *The Cult of the Fact*, Jonathan Cape, 1972
- Hutton, Will: Article from *The Observer*, 12.12.99
- Irigaray, Luce: 'A Chance for Life': in *Sexes and Genealog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James, E. O: *The Cult of the Mother Goddess*, London, 1959
- Johnson, Paul: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Weidenfeld, 1976
-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Everyman, 1993
-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1788)*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ed. Mary J. Gregor, CUP 1999
-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ory (1784)* in *On History*, Indianapolis
1963
-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1797)* in *Practical Philosophy*, ed.
Mary J. Gregor, CUP 1999
- Kerényi, C: *The Gods of the Greeks*, Thames & Hudson, 1982
- Kitto, H. D. F: *The Greeks* Pelican, 1972
- Klapp, Orinn E: *Collective Search for Identity*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 Kristeva, Julia: *Desire in Languag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French edition 1974),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Jacques Lacan: *Écrits*, Routledge, 1990
- Larousse Encyclopaedia of Mythology*, Paul Hamlyn
- Lasch, Christopher: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Norton, 1991
- Leakey, L. S. B: *Adam's Ancestors*, Harper & Row, 1960

- LeDoux, Joseph: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8
- Leroi-Gourhan, A: *The Art of Prehistoric Man in Western Europe*, Thames & Hudson, 1968
- Lévi-Strauss, C: *The Savage Mi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 Lodge, David and Woods, Nigel, eds: *Modern Criticism and Theory*, Addison Wesley Longman Higher Education, 1999
- Mach, Ernst: *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s*, Thoemmes Press, 1999
- Malcolm, Norman: *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 OUP, 1984
- Malinowski, B: *Sex and Repression in Savage Society*, Routledge, 1960
- *Sex, Culture and Myth*, Mayflower-Dell, 1967
- Mandel, C. W. K: *A Critique of Linguistic Philosophy*, 2nd edition, 1979
- Marcuse, Herbert: *One-Dimensional Man*, Routledge, 1991
- Marx, Karl and Engels, Friedrich: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Penguin, 1985
- Mead, Margaret: *Coming of Age in Samoa*, William Morrow, 1961
- Mellaart, J: *Catal Hüyük: A Neolithic Town in Anatolia*, Thames & Hudson, 1967
- *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 Thames & Hudson, 1975.
- *Earliest Civilisations of the Near East*, Thames & Hudson 1978
- Midgley, M: *The Ethical Primate*, Routledge, 1994
- Mitchell, J & Rose, J: *Jacques Lacan & the École Freudienne: Feminine Sexuality*, Macmillan, 1985
- Mumford, Lewis: *The Myth of the Machine*, Harvest Books, 1971
- Nagel, Ernst: *The Structure of Science*, Hackett, 1987
- Napier, J: *The Roots of Mankind*, Smithsonian Institute, 1970
- Neurath, Otto (ed.): *Foundations of the Unity of Scienc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 Newton, Isaac: *Optics*, 1755
- Nolte, John: *The Human Brain: An Introduction to its Functional Anatomy* Mosby, 1999
- Oakley, K.P: *Man the Toolmaker*, Chicago, 1961
- Oparin, A. I: *Life – Its Natur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liver & Boyd, 1961
- *The Qualitative Change from Natural to Mental Phenomena*

- Parrot, A: *Sumer*, London, 1960
- Piaget, J: *Origins of Intelligence in Childre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92
- Pilbeam, D: *The Evolution of Man*, Thames and Hudson, 1970
- Popper, Karl: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Routledge, 1969
- Pfeiffer, John E: *The Emergence of Man*, Thomas Nelson, 1970
- Reed, Bika, (ed.): *Rebel in the Soul: An Ancient Egyptian Dialogue Between a Man and His Destiny*, Inner Traditions International, 1997
- Reich, Wilhelm: *Character Analysis*, Farrar Strauss Giroux, 1980
- Reichenbach, Hans: *Modern Philosophy of Science*, Humanities Press, 1959
- Reik, Theodor: *Ritual – Psychoanalytic Studies*, Farrar, Strauss, 1957
- Rickman, H. P: *The Challenge of Philosophy: from Modernism to Deconstructionism*, Open Gate Press, 2000
- Roberts, Catherine: *The Scientific Conscience*, Open Gate Press, 2000
- Roheim, Geza: *Psychoanalysis and Anthropolog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71
- Rorvik, D: *As Man Becomes a Machine*, Souvenir Press, 1973
- Rose, Steven: *The Conscious Brain*, Penguin, 1978
- Rose, Steven, ed: *From Brains to Consciousness – Essays on the New Sciences of the Mind*, Penguin 1999
- Roszak, T: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Russell, Bertran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Routledge, 1991
- Ryle, Gilbert: *The Concept of Mind*, Penguin, 1990
- Sandars, N. K: *Prehistoric Art in Europe*, Penguin, 1968
- Schaller, George: *The Year of the Gorill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Schlick, Moritz: *Philosophical Paper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79
- Searle, J. 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Penguin, 1996
- Simmel, Georg: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Routledge, 1990
- Simmons, L. E: *The Early Relatives of Man*,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1964
- Sokal, Alan and Bricmont, Jean: *Intellectual Impostures*, Profile Books, 1998

- Strachey, A: *The Unconscious Motives of War*, Allen & Unwin, 1957
- Sweezy, P. M: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Modern Readers
Paperback, 1970
- Tawney, R. H: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Pelican, 1940
- Thomson, G: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0
- Ure, Andrew: *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 London, 1835
- Vaisey, John: *Capitalism and Society*, Weidenfield & Nicolson, 1980
- Virilio, Paul, ed. Derian, James Der: *The Virilio Reader*, Blackwell,
1998
- Washburn, S. L: *Mankind in Amnesia*, Sidgwick & Jackson, 1982
- Washburn, S. L. & Lancaster, C. S: 'The Evolution of Hunting' in *Man
the Hunter*,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8
- Weber, Max: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Routledge, 1992
- Wells, H. G: *The Mind at the End of Its Tether*, Heinemann, 1945
- Wittgenstein, Ludwi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Routledge,
1990
-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Blackwell, 1997
- *Blue and Brown Books*, HarperCollins, 1980
- Wheen, Francis: *Karl Marx*, Fourth Estate, 1999
- Yerkes, R. M. & Yerkes, A. V: *The Great Apes*, Yale, 1929
- Young, J. Z: *Doubt and Certainty in Sciences: A Biologist's
Reflection on the Brain*, OUP, 1960
- Zweig, Stefan: *The World of Yesterda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4

Stratton, A. The Economics of Money, Banking & Finance, 1987

Stewart, P. M. The Theory of Capital Development. London: Robert
 Paperback, 1970

Lawson, R. H.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London, 1940

Thompson, G. Stud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Duckworth, 1980

1980

McCloskey, D. N.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 London, 1982

Yates, John. Capitalism and Society. London: Duckworth, 1980

Millar, Paul. e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iddle East. Blackwell,
 1988

Washington, S. J.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Duckworth, 1982

Washington, S. J. & Lancaster, D. S. The Economics of Planning in Asia
 the Pacific.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8

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System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1981

Watts, H. O. The Future of the East of Asia. London: Duckworth, 1982

Wallerstein, I. Modern World-System. 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
 1980

—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Blackwell, 1987

— Asia and the World. Blackwell, 1980

Wallerstein, I. The World-System. London: Duckworth, 1980

Yates, R. M. & Yates, A. The East Asia. Blackwell, 1982

Young, J. E. Growth and Chang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Reflections on the East. G.P., 1980

Zweig, Stefan. The World of Yesterday.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4

索引

(注：词条后面的数字为该词条在原著中的页码，
请参见书中的侧页码。)

A

- a priori* 先验的 37, 44, 45, 47, 80,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3
- Abraham 亚伯拉罕 (希伯来人的始祖) 157
- Abraham, Karl 卡尔·亚伯拉罕 15
- Abrams, M. H. M·H·艾布拉姆斯 [当代美国学者 (美学)] 77
- Adorno, Theodor 西奥多·阿多诺 13, 168
- alienation 异化 20, 108
- all - male group 纯雄性群体 122, 123
- Altamira 阿尔塔米拉洞穴 (岩窟) (西班牙北部的一组岩窟, 位于桑坦德西南偏西, 洞穴里有 1879 年发现的旧石器时期艺术的宏伟的标本) 141
- altar - like edifice 祭坛似的结构 130
- Anaxagoras 阿那克萨哥拉 161
- Anaximander 阿那克西曼德 161
- Anaximenes 阿那克西米尼 161
- Anderson, Danny 丹尼·安德森 74
- Andreski, Stanislav 斯坦尼斯拉夫·安德列斯基 73, 74
- Aristotle 亚里士多德 6, 165

- Athenian culture 雅典文化 161
- Attlee, Clement 克莱门特·艾德礼 (英国政治家, 于 1945 - 1951 年任英国首相) 63
- Aurignacian culture 奥瑞纳文化 (法国旧石器时代前期) 134, 137, 138
- Aurignacian tool - making 奥瑞纳时期的 (法国旧石器时代前期) 工具制造 134
- Auschwitz 奥斯威辛 7, 8, 13
- Austin, J. L. J·L. 奥斯汀 60, 64, 65
- Australopithecus 南方古猿 108, 116

B

- Bachofen, J. J. J·J. 巴霍芬 (瑞士的人类学家、法学家) 148
- Bacon, Francis (artist) 弗朗西斯·培根 (画家) 31
- Bacon, Francis (philosopher) 弗朗西斯·培根 (哲学家) 55
- Bacon, Roger 罗杰·培根 49
- Barthes, Roland 罗兰·巴尔特 (法国批评家) 75
- Bauer, Otto 奥托·鲍尔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 56
- Bayle, P. 培尔·皮埃尔 (法国哲学家) 54
- Beethoven, Ludwig van 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13
- Beginnings of Agriculture 农业的起源 145
- behaviourism 行为主义 82
- Belsey, Catherine 凯瑟琳·贝尔西 75
- Berg, Alban 奥尔本·贝尔格 (奥地利作曲家) 29
- Berkeley, Bishop 贝克莱主教 (1685 - 1753, 爱尔兰主教及哲学家) 53
- Blair, Tony 托尼·布莱尔 (英国首相) 166
- Bohr, Niels 尼尔斯·波尔 (丹麦物理学家) 176

- Bolshevism 布尔什维克 6
- Boyne, Roy 罗伊·博伊恩 76
- Breton, André 安德烈·勃勒东 (法国诗人, 超现实主义) 28
- Breuil, Henry 亨利·步日耶 (法国最有名的史前学家) 140
- Bricmont, Jean 吉恩·布里克蒙 (比利时物理学家) 67, 69, 73
- Bridges, Lucas 卢卡斯·布里奇斯 143
- burial rites 丧葬仪式 127-131
- burin 鏃刀 134, 135
- Byron, Lord George Gordon 乔治·戈登·拜伦勋爵 13

C

- Calvin, W. H. 威廉·H. 加尔文 98
- Campbell, Joseph 约瑟夫·坎贝尔 (美国神话作者) 129, 144
- Capsian people 卡普萨人 146, 147, 149
- Capsian Culture 卡普萨文化 147
- Carnap, Rudolf 鲁道夫·卡纳普 (逻辑学家) 35, 42, 44, 59, 60
- Catal Hüyük 加泰土丘 (土耳其) 157
-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绝对诫命 (良心至上的道德观) 184
-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绝对诫命 (良心至上的道德观) 80, 173, 183, 184, 185, 195
- causa prima* 首因 53, 104, 176
- First Cause 首因 51, 52, 176
- cave - bear 洞熊 130
- Chirico, Giorgio de 乔治欧·德·基里科 (意大利画家) 29
- Christian Middle Ages 基督教的中世纪 48
- Clinton, Bill 比尔·克林顿 166

210 道德的基础

- Combe - Chapelle 法国的一个穆斯特遗址 133
- Communist 共产主义的 77
- communist Utopia 共产主义乌托邦 43
- concept of property 财产所有的概念 148, 151
- Copernicus 哥白尼 49
- Crick, Francis 弗朗西斯·克里克 (英国生物物理学家) 84
- crisis of morality 道德危机 1
- Cro - Magnon man 克罗马农人 (旧石器时代晚期在欧洲的高加索人种) 133, 134, 137, 139
- Crook, J. H. J·H·克鲁克 121, 122
- cult of cynicism 犬儒主义的信徒 11
- cultural symbol 文化符号 117, 138
- culture *passim* 文化 (文中随处可见)

D

- D'Alema, Massimo 马西莫·达莱马 (意大利总理) 166
- Dali, Salvador 萨尔瓦多·达里 29
- Damasio, Antonio 安托尼奥·达玛西奥 (神经病学权威) 102
- Darwin, Charles 查尔斯·达尔文 6, 19, 99, 107
- das Ding an sich* 物自身 177
- deconstruction 解构 66
- deconstructionism 解构主义 8, 66
- deconstructionist 解构主义者 32
- defiance of civilized virtues 对文明美德的蔑视 21
- Deleuze, Gilles 吉尔斯·德勒兹 (法国哲学家) 67
- Derrida, Jacques 雅克·德里达 (法国哲学家) 67, 76
- Descartes, René 勒奈·笛卡尔 50, 51, 53, 103
- Dewey, John 约翰·杜威 (美国哲学家) 62, 63
- Dilthey, Wilhelm 威廉·狄尔泰 (德国哲学家) 66

Dionysius II 狄奥尼西奥斯二世 (叙拉古) 164, 197

Ditfurth, Hoimar von 霍伊马·冯·迪特富特 105

divinity of kings 国王的神性 152 - 154

E

early neolithic man 早期新石器时代的人 149

ego 自我 12, 13, 14, 17, 29, 30, 33, 41, 50, 51, 52, 53, 54, 70, 79, 89, 98, 125, 136, 141, 155, 160, 169, 172

Einstein, Albert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6, 30, 36, 107

emergence of agriculture 农业出现 147, 156

Emin, Tracey 特蕾西·艾敏 (英国画家) 31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 1, 2, 7, 8, 10, 34, 35, 41, 46, 47 - 56, 61, 66, 76, 80, 168, 173, 205

—— culture of 启蒙运动文化 11, 13

Ernst, Max 马克斯·厄恩斯特 (德国艺术家) 29

Eros 爱神, 爱洛斯 10, 164, 169, 171, 187, 188, 192

eros 伊洛斯 32, 33, 114, 124, 141

Escale cave 埃斯卡勒山洞 120

evolution 进化, 发展 48, 55, 82, 83, 84, 85, 89, 94, 97, 99, 100, 103, 105, 106, 107, 108, 111 - 116, 118, 126, 134, 202

externalization 外化 108, 110, 111, 112, 117, 125

F

Fascism 法西斯主义 6

Fascist 法西斯主义者 57

Feigl, H. H. 费格尔 (逻辑经验主义者) 35, 59, 60

212 道德的基础

- Fertile Crescent 肥沃的新月地带 147
Fichte, Johann Gottlieb 约翰·高利布·费希特 55
fire 火 119 - 121, 127
Font de Gaume 法国哥摩(洞窟) 141
Frege, Gottlob 高特洛布·弗雷格(德国哲学家) 35, 38
Freud, Sigmund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6, 10, 14, 72, 122, 186
Fromm, Erich 埃里克·弗罗姆 171

G

- Galileo 伽利略 6, 177
Gauguin, Paul 保罗·高庚 27
ghost 鬼魂 117, 118, 125, 127, 129, 130, 144
ghost worship 鬼魂崇拜 117, 118
God 上帝, 神 8, 12, 3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62, 75, 104, 107, 111, 118, 125, 126, 131, 132, 153, 155, 156, 157, 169, 172, 176, 178, 185, 186, 187, 191, 192, 193, 194
—— God the Father 天父 155
god 神 1, 7, 14, 125, 132, 141
goddess 女神 138, 139, 140, 141, 142 - 144
Gödel, Kurt 科特·哥德尔 59, 72
Goethe, J. W. von J·W·冯·歌德 6, 172
Goodheart, Eugene 尤金·古德哈特(作家) 75
Gould, James and Carol 詹姆斯·古尔德和卡罗尔·古尔德 99
grand theories 宏大的理论体系 4, 45
Gregory IX, pope 教皇格列高利九世 48
Grey, John 约翰·格雷 7
Guattari, Félix 费利克斯·瓜塔瑞 67

H

- harem group 女眷群体 121
- Harrison, J. E. J. E. 哈里森 144
- Heckel, Erich 埃里希·赫克尔 27
- Hegel, G. W. F. G. W. F. 黑格尔 3, 4, 42, 55, 56, 65, 108, 111
- Heidegger, Martin 马丁·海德格尔 55, 180
- Heine, Heinrich 海因里希·海涅 111
- Hesiod 赫西奥德 (希腊诗人) 160
- Hilton, Anthony 安东尼·希尔顿 18
- Hirst, Damien 戴敏·赫斯特 (英国艺术家) 31
-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6, 56, 187
- Hobbes, Thomas 托马斯·霍布斯 (英国哲学家) 54
- Homer 荷马 160
- Homo 人类 108
- Homo erectus 直立人 112, 116, 119, 124, 127, 170
- Homo pekinensis 北京人 112, 118
- Homo pithecanthropus 爪哇人 116
- Homo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爪哇直立人 112
- Homo sapiens 智人 107, 118, 132-144, 147
- Hume, David 大卫·休谟 52, 54, 55
- Hutton, Will 威尔·赫顿 19
- hypothalamus 下丘脑 93-95

I

- id 本我 14, 17, 19, 29, 30, 33, 79, 155
- innate mental faculties 先天的心理能力 45

214 道德的基础

- Innocent III, pope 教皇英诺森三世 48
instinctual void 本能的真空 79
Irigaray, Luce 露丝·伊丽格瑞 (法国女权主义者) 67
Isaiah 以赛亚 6, 198

J

- James, William 威廉·詹姆斯 (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 机能心理学和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62
Jericho 耶利哥 149, 150
Jesus 耶稣 6, 172
Jewish concept of God 犹太人关于上帝的概念 157 - 159
Jolly, Clifford 克利弗德·乔利 121
Judaism 犹太教 157 - 159

K

- Kandinsky, Wassily 瓦西里·康定斯基 (俄国抽象派画家) 28
Kant, Immanuel 以马利·康德 6, 36, 37, 44 - 46, 52, 53, 54, 55, 79, 80, 81, 157, 165, 173 - 185, 186
Kirchner, Ernst Ludwig 厄恩斯特·路德维希·基尔希纳 (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 27
Kokoschka, Oskar 奥斯卡·考考斯卡 (奥地利表现主义画家) 27
Kounellis, Jannis 詹尼斯·库内利斯 (艺术家) 31
Kristeva, Julia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后现代派女权主义理论家) 67, 72 - 73, 74

L

- La Ferrassie 拉·费拉西 128, 129
Lacan, Jacques 雅克·拉康 (法国哲学家) 67, 68 - 72,

- 73, 74
- Laing, R. D. R. D. 莱恩 (英国作家和医生) 3
- Laplace 拉普拉斯 52
- Lascaux 拉斯科 (洞窟) 141
- Lashley, K. S. K. S. 拉什利 (心理学家) 82
- latency period 潜伏期 124
- Latour, Bruno 布鲁诺·拉图尔 67
- LeDoux, Joseph 约瑟夫·勒杜 (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教授)
99
- Le Moustier 穆斯特 128
- Lenin, V. I. V. I. 列宁 57
- Les Eyzies 莱埃济 133, 138
- Lévi - Strauss, Claude 克劳德·列维 - 斯特劳斯 (法国结构人类学家) 69
- libido 力比多 29, 38, 71, 131, 136, 137, 146, 160, 161, 188, 189, 192, 199
- linguistic analysis 语言分析 60, 71, 72
- linguistic analyst 语言分析家 32, 63, 71, 77
- linguistic phenomenology 语言现象学 64
- Locke, John 约翰·洛克 44, 54, 55
- logical empiricism 逻辑经验主义 60
- logical positivism 逻辑实证主义 35, 42, 60
- logical positivist 逻辑实证主义者 32, 42, 58, 59, 60

M

- Mach, Ernst 厄恩斯特·马赫 35, 43
- Macke, August 奥古斯特·马克 (德国艺术家) 27
- Magdalenian 马格德林时期 欧洲旧石器时代的最后期
—— art and artists 马格德林时期的艺术和艺术家 139 -

216 道德的基础

- 142, 145, 146
- culture 马格德林时期文化 138
 - people 马格德林时期的人 140, 145, 149
 - period 马格德林时期 138 - 144
- Malcolm, Norman 诺曼·马尔科姆 40, 41, 58
- Malthus 马尔萨斯 9, 11
- 'Man, know thyself' 人啊, 了解你自己 162
- Man Ray 曼·雷 (美国摄影家) 29
- Mandel, C. W. K. C·W·K. 曼德尔 63, 64
- Marcuse, Herbert 赫伯特·马库泽 (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
- 14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 4, 9, 42, 56, 108, 172, 191
- Marxism 马克思主义 72
- Marxist movements 马克思主义运动 33
- matriarchal culture 母权文化 134 - 138
- matriarchy 母权制 133 - 144
- crisis of 母权制危机 142 - 144
 - revolt against 对母权制的反抗 145, 146
- Mellaart, J. J. 梅拉尔特 150
- memory store 记忆存储 120
- Messianic Age 弥赛亚时代 158
- Middle Ages 中世纪 48, 49, 172
- Miocene 中新世的 113
- Mirandola, Pico della 皮科·德拉·米兰多拉 6
- Miro, Joan 琼·米罗 (超现实主义画家) 29
- monotheism 一神论 157, 158, 176, 184
- morality *passim* 道德 (文中随处可见)
- Moses 摩西 157, 191
- mother - goddess 母神 133 - 144, 156

- Mozart, W. A. W·A. 莫扎特 13
 Mueller, Otto 奥托·穆勒 27
 Munch, Edvard 爱德华·蒙克 (挪威艺术家) 27
 myths 神话 43, 46, 47, 117, 120, 125, 143, 145, 147,
 156, 160, 161

N

- Narcissus 那西索斯, 自恋 161, 197
 Napoleon 拿破仑 55
 Natufian 纳图夫的
 —— culture 纳图夫文化 149
 —— people 纳图夫人 147
 —— settlements 纳图夫人居住遗址 150
 Nazi 纳粹 44, 57, 59, 76, 77
 —— anti - Nazi 反纳粹 77
 Nazism 纳粹主义 6, 11, 43, 59
 Neanderthal 尼安德特人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Neurath, Otto 奥托·诺伊拉特 (奥地利哲学家) 35,
 44, 59
 Newton, Isaac 伊萨克·牛顿 6, 50, 51, 52, 165, 178
 Niaux 尼欧 (洞穴) 140, 141
 Nietzsche, Friedrich 尼采 62, 63, 76

O

- Oedipus complex 俄狄浦斯恋母情结 122, 123, 124, 154,
 156, 160, 186
 Olympic myths 奥林匹亚神话 161

- Olympic pantheon 奥林匹亚山上的万神殿 144
one - male breeding group 单雄性生育单位 122, 123
Oparin, A. I. A · I. 奥帕林 (苏联生物化学家) 82
oral - cannibalistic 口唇 - 撕咬 15

P

- Paranthropus 傍人属 108
Pascal, Blaise 布雷斯·帕斯卡 54
patriarchal 父权制的, 父权的
—— culture 父权文化 148 - 156
—— family 父权家庭 149
—— man 父权制下的男人 152
—— morality 父权制道德 155
—— religion 父权制宗教 185 - 187
—— society 父权制社会 185
patriarchal paranoia 父权制的偏执狂 154, 155, 156
patriarchy 父权制 148, 152, 155, 157, 160, 193
Patriarchy emerges 父权制的出现 148
Peche Merle 佩舍默勒 (洞窟) 141
people of the Kalahari 喀拉哈里沙漠人 171
Pericles 伯里克利 163
Perigordian culture 佩里戈尔文化 138
Pfeiffer, J. E. 约翰·E. 法伊弗 113, 137
phallic - assertive drive 对生殖器肯定性的内驱力 147
Picasso, Pablo 帕布罗·毕加索 29
Plato 柏拉图 6, 49, 50, 109, 162, 163, 164, 165, 173, 197
Pleistocene 更新世 112, 113, 114, 119, 123, 127
Popper, Karl 卡尔·波普 (英国著名哲学家) 35, 43, 44, 59

- Postmodernism 后现代主义 66
- Postmodernist 后现代主义者 32
- post - structuralism 后结构主义 66
- prefrontal lobes 前额叶 83, 87, 89, 90, 91, 94, 97, 98, 100, 101, 102, 174, 204
- Protagoras 普罗塔哥拉 (约前 480 - 前 410, 希腊哲学家) 162
- Ptolemy 托勒密 (公元 2 世纪的古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数学家, 地心说的创立者) 178

R

- Ramapithecus 腊玛古猿 108, 113 - 116
- Randell, Peter 彼得·兰德尔 91, 92, 93
- Regressive disintegration of the arts 艺术的退行性解体 26
- Renaissance 文艺复兴 49
- Rickman, H. P. H·P. 里克曼 74
- Ricoeur, Paul 保罗·里克尔 (法国哲学家) 71
- Rose, Steven 史蒂文·罗斯 (英国神经生物学家) 83, 86
- Rousseau, Jean - Jacques 让·雅各·卢梭 54
- Russell, Bertrand 伯特朗·罗素 35, 37, 38, 42, 58, 65, 162, 163

S

- Sargon of Akkad 阿卡德王萨尔贡 152
- Sartre, Jean - Paul 让 - 保尔·萨特 103
- Schaller, George 乔治·沙勒 115
- Schelling, F. W. J. von F·W·J. 冯·谢林 (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家) 66

220 道德的基础

- Schiele, Egon 埃贡·希勒 (奥地利画家) 27
-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施莱艾尔马赫 (德国哲学家) 66
- Schlick, Moritz 莫利兹·施利克 (德国哲学家) 35, 42, 44, 59
- Schopenhauer, Arthur 亚瑟·叔本华 6, 44, 56, 63, 165, 175
- Schroeder, Gerhard 格哈德·施罗德 166
- Scruton, Roger 罗杰·斯克鲁顿 7
- Shakespeare, William 威廉·莎士比亚 6, 13
- Shelley, P. B. P. B. 雪莱 13, 197
- Simmel, Georg 格奥尔格·西美尔 16
- Simmons, L. E. L. E. 西蒙斯 115
- Smith, Adam 亚当·斯密 191
- social democracy 社会民主主义 58
- socialism 社会主义 10, 11, 20, 42, 43, 166
- Socrates 苏格拉底 163
- Sokal, Alan 艾伦·索卡尔 (数学物理学教授) 67, 69, 73
- Solutrean culture 梭鲁特文化 138
- Sophist 智者; 诡辩学者 161, 162, 163
- Spinoza, Benedict de 本尼迪克特·德·斯宾诺莎 6, 50, 52
- spirit 灵魂, 精神 7, 12, 13, 47, 52, 53, 54, 75, 153, 155, 157, 173, 185
- of ancestor 先人的灵魂 129
 - of the Enlightenment 启蒙运动的精神 56
 - of father - figure 父亲人物的精神 170, 171
 - 'German' 德国精神 59
 - of modernism 现代主义精神 29
 - of the mother 母亲的精神 136
 - of morality 道德精神 170

- of totem animal 图腾动物的灵魂 131
- spiritual 精神的
- authority 精神的权威 7
- capacity 精神能力 128
- dimension of mankind 人类精神维度 101
- freedom, struggle for 追求精神自由的斗争 53
- meaning of the world 世界的精神意义 12
- power of the woman 女性精神力量 143
- Stalin, Josef 约瑟夫·斯大林 42, 43, 56, 186
- Stalinism 斯大林主义 11
- Stravinsky, Igor 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 (俄裔芭蕾舞作曲家) 29
- Strindberg, August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瑞典小说及剧作家)
29
- superego 超我 14, 15, 19, 25, 28, 32, 33, 51, 52, 53,
75, 79, 140, 141, 143, 152, 154, 155, 159, 162,
185, 186
- symbolization 符号化 110, 111
- synthetic *a priori* 先验综合 37, 45, 92, 177, 178, 183
- T**
- Tanguy, Yves 伊夫·坦圭 (法国裔美国超现实主义画家) 29
- Teyjat 泰伊贾特 (洞窟) 141
- Thales 泰勒斯 160
- Thanatos 萨纳托斯, 死神, 死亡本能 10, 187, 188
- Theognis 泰奥格尼斯 160
- tool - making 工具制造, 制造工具 107 - 111, 112, 117,
126, 134, 138
- Tribal paranoia 部落偏执狂 155

U

- universal God 宇宙的神 157, 158
universal moral concept 普遍的道德观念 159
Urmson, J. O. J·O. 厄姆森 64

V

- vegetative system 植物性神经系统 95
Vienna circle 维也纳学派 35, 41 - 47, 56 - 60
Virilio, Paul 保罗·维瑞利奥 (法国思想家) 67
Voltaire 伏尔泰 6, 54

W

- Waismann, F. F. 魏斯曼 (逻辑实证主义者, 维也纳学派成员) 35, 44, 59
Warnock, G. J. G·J. 沃诺克 64
Wedekind, F. F. 魏德金德 (德国剧作家、演员与诗人) 29
Wells, H. G. 赫·乔·威尔斯 (英国作家) 4, 5
western civilization 西方文明 5, 28, 32, 145, 157
Wittgenstein, Ludwig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奥地利裔的英国哲学家, 以其对语言和含义的分析而著名) 3, 32, 35 - 42, 44, 57, 58, 64, 65, 75
working classes 工人阶级 19, 20, 180

Z

- Zabarella, Giacomo 贾科莫·萨巴瑞拉 48
Zeus 宙斯 160
Zinjanthropus 东非人 108
Zweig, Stefan 斯蒂芬·茨威格 5, 6

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

《弗兰克尔精神分析译丛》

简介

心灵考古

——潜意识社会史（一）

在本书中，弗兰克尔运用精神分析的技巧和视角诠释了考古发现，研究了人类心灵的起源，以及旧石器时期人类大脑非同寻常的发展。我们同时了解了我们最早的祖先是怎样开始制造工具的，文化是怎样发生的，还有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土的那些实物遗物所告诉我们的早期人类的所有信息：他们的神话和宗教信仰，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概念，他们的劳作活动、家庭关系和社会组织等等。

正像个体分析中非常强调早年的经验一样，本书从源头入手研究人类文化，一直写到古希腊文化之前。弗兰克尔相信，精神分析学最重要的贡献，根本而言，并非是在个体研究中表现的深刻视角，而是在社会研究中所体现出来的洞察之见。面对着现代科学强大的力量和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战争，这种洞察显然是必要的。他的最根本的论点是，如果我们不能理解社会中存在的这些毁灭性的力量，即便我们的星球不会因此毁灭，文明也必然在劫难逃。弗兰克尔特别阐述了父权偏执狂的本质，这一人类社会的致命的痼疾曾经是，并且依然是战争的

根源。

(注：2003年，Open Gate出版社又将《心灵考古》与《文明：乌托邦与悲剧》二书合并出版了新的平装本，书名为《潜意识的社会史》，其相关的书评如下)

……这是一个对每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这是一本博学、论证严谨、内容翔实的心血之作，所有对人文学科感兴趣的人都应该阅读这本书。

——保罗·克莱恩教授 (Prof. Paul Kline)

《英国医学心理学报》(*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

学海无涯……直到今天，我才有生以来第一次了解了我的祖先。

——彼得·兰德尔博士 (Dr. Peter Randell)

获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心理学分会精神病学学位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对众多让人爱不释手的书的综合——它让人很难放下，情不自禁地从封面一直读到封底——每个医生的个人藏书中都应该有这么一本书。

——菲利普·霍普金斯博士 (Dr. Philip Hopkins)

《巴林特协会学报》(*Journal of the Balint Society*)

对弗兰克尔著作的赞誉

弗兰克尔对幼儿原始驱力——力比多做了重新定义，他不像弗洛伊德那样把力比多归结为性冲动，而是归结于先天的对爱的需要……弗兰克尔认为，人类爱与被爱的本能，在受到阻碍的时候会转变为侵犯和破坏性动机。任务就是找出……原始的爱是如何转化为侵犯的；然后，弗兰

克尔就试图去解放爱，而不是解放侵犯。同时，弗兰克尔也发展了分析社会行为的精神维度的各种策略。

——埃里希·西格尔教授 (Prof. Erich Segal)
《时代文学补遗》(The Time Literary Supplement)

文明：乌托邦与悲剧

——潜意识社会史（二）

跟着本书，我们走入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中。尽管所有的民族都有文化和文明，但是对于西方文明而言，重要的是其民主的理念、一神论的理念以及对于理性诉求的强调。这些特点一方面形成了关于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丰富多样的观点，使人类俯首臣服于神圣的权威，促使人类自由地发挥其聪明才智；另外一方面也导致了人群中大部分人的被压迫以及匮乏窘困的处境，并且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战争和流血牺牲。

没有人能够否认西方文明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否认它对人类所承担的责任，但是如果西方世界要充分履行这些责任，它必须首先克服自身存在的那些由来已久而且多数都是深藏在潜意识世界里的矛盾，这些矛盾在肆意地嘲弄着西方文明的道德和理性的雄心壮志。要消除这些矛盾，首先要理解它们。这本书正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重大贡献。

……一本让你爱不释手的书——你一旦开始读这本书，就会从头读到尾才能放得下。

——菲利普·霍普金斯博士 (Dr. Philip Hopkins)
《巴林特协会学报》(Journal of the Balint Society)

一个人能有多少机会阅读一位睿智的学者理智而渊博的思想呢？

——帕特里克·哈特伯 (Patrick Hutber)
《星期日电讯》(The Sunday Telegraph)

探索潜意识

——深层分析的新途径

《探索潜意识》一书阐述了乔治·弗兰克尔自己开发的临床治疗方法。读者被邀请进入诊疗室，去见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见证——病人是如何被引导着将他潜意识心理的秘密展现到他自己和分析师面前的。弗兰克尔的治疗方法让病人能够回忆起那些以前被隐藏起来的、幼儿时期的经历，以及他们的身体反应的形成过程，让病人实际地去重新经历那些导致他们神经症状和精神症状的创伤性事件。这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探索许多身体疾病的起源，并采用精神疗法来治疗这些疾病的新的前景。

弗兰克尔对治疗方法的这种改革，将给精神分析疗法带来新的标准。他的书为所有对身心医学感兴趣的心理健康工作者、精神分析师和精神病医师、医疗从业者提供了基本的信息。

任何人，如果想了解精神分析方法是什么，就必须读这本书。该书对帮助那些处于不幸当中的人们的精神分析过程做了开放的、挑战性的、经过很好研究的、非常令人鼓舞的揭示……非常的清楚，不带丝毫神秘味道——在这

里，你看不到行话和冗繁难解的官样文章。这确实是一种在病人的潜意识世界中，以患者为中心的治疗……弗兰克尔在阐述这些理论的时候，提供了大量的病例材料……他的作品简单而令人愉快，他的写作风格是全新的，让人着迷、令人激动、富有挑战性……希望他的书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去从事精神动力学和催眠方面的工作。采用弗兰克尔的观点和方法，会获益匪浅；世界需要更多有能力的、富有献身精神的治疗师。

——西尔维亚·加斯汀-米尔斯 (Sylvia Justice - Mills)

《心理动力辅导》(Psychodynamic Counseling)

人们认为弗兰克尔的写作富有智慧的力量，非常清晰，但是对我来说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他的慷慨和仁慈。

——伊娃·沃尔夫教授 (Prof. Eva Wolf)

维也纳大学 (Vienna University)

未知的自我

本书以弗兰克尔长达四十多年的精神分析医师经历中的观察为基础，从多方面为《探索潜意识》中所阐述的精神分析技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乔治·弗兰克尔是以我们今天称之为“古典”的精神分析模式开始他的精神分析工作的，他拓展并深化了弗洛伊德所提出的概念，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先驱者们所没有能够到达的全新的关于精神的维度。他的催眠分析方法使得病人能够回忆起并重新经历一些他们生活中被遗忘了很长时间的经历，从而拓

宽了我们对于潜意识心理的理解的范围。

《未知的自我》一书对个体从幼儿早期阶段开始的心理发展历程进行了追踪，展示了造成大范围神经冲突和精神冲突的各种原因。书中将严谨的学术知识和深刻的人文关怀结合在一起，让读者能够经历那些自我认知的、启蒙性的时刻，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儿童的变幻莫测的行为的一种全新的理解。

《未知的自我》一书非常的朴素简单，没有任何不必要的夸张和哗众取宠。我从来没有读过如此敏锐的、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

——爱德华·罗斯博士 (Dr. Edward Roth)

……深刻的洞察力，人性和热情。

——斯蒂芬·戴维 (Stephen Davy)

《牛津时报》(Oxford Time)

道德的基础

——关于道德概念的起源和目的的研究

弗兰克尔考察了道德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直指定期在社会上泛滥的个体的神经紊乱和精神紊乱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病理学。他阐明了为何道德对人类是必要的，并研究了它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起因。在本书的哲学部分，弗兰克尔试图在对人的情感需要的理解的基础上，对道德观念进行一次合理的重构。

乔治·弗兰克尔用他的博学、超群的智慧以及清楚的

说明，为人性之谜提供了一个理解之道，其重要性可以和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媲美。他所提出的事实，是给整个人类的一份重要礼物。从采用深层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道德哲学，到令人可信的、以生物学为基础的道德科学，他的成就……超越了从以前的哲学和客观科学中所获得的知识。

——彼得·兰德尔博士 (Dr. Peter Randell)

MRC 心理学系

所有关心下一代的心理健康和福利的人们，都会发现这本书是无价的。弗兰克尔博士对理性道德的迫切需求做出了最早的贡献，这种理性道德将引导社会安全地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如果另外一场大灾难能够避免的话，“人性将最终产生”。

——玛道克斯博士 (Dr. C. G. Maddox)

《精神疗法评论》(Psychotherapy Review)

性革命的失败

在本书中，乔治·弗兰克尔探讨了性革命的目的及导致其失败的因素。作者超越了放纵主义的肤浅，对性革命进行了多角度的思考，其观点明显带有欧洲激进主义的思想传统。书中阐述了社会压迫与性压抑之间的联系，解释了阶级社会如何成为压抑的心理结构的根源，以及为什么任何局部改良的企图都注定要失败。作者还阐述了性革命本身如何被市场化的社会所歪曲和利用，以及妇女性解放面临的问题，并对妇女解放运动的某些方面提出了质疑。

该书对我们时代的最重要的运动之一的性革命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指明了实现真正性自由的新方向。

《性革命的失败》被视为心理学领域的经典之作，在英国和美国都获得了很高的赞誉。

弗兰克尔的书是一本难以超越的杰作。

——《精力与性格》杂志 (*Energy and Character*)

乔治·弗兰克尔最终成了性革命的史学家。他对这一问题的每一方面的论述几乎都富有启发性。

——《星期日电讯》(*The Sunday Telegraph*)

这里有一本书……未来辩证法的丰富食粮……一部令人瞩目的著作！

——杰西·施瓦茨教授 (Prof. Jesse Schwartz)

于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 (San Diego, California)

弗兰克尔的阐述真是精彩极了。

——《生命力》杂志 (*Journal of Orgonomy*)